

声 明

本刊仅作为学术交流与出版平台,所刊载文章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刊立场。本刊坚决反对抄袭、伪造数据、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可靠性由作者全权负责。

本刊为开放获取期刊。所有发表内容均采用CC BY-NC 4.0协议许可。读者可以免费获取、阅读和非商业性分享,但使用时必须明确注明作者和出处,且不得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



出版单位: 拾华出版有限公司

总 编 辑: 王海波

总 顾 问: 胡 斌

联系地址: 香港九龙旺角亚皆老街2C号凯悦
商业大厦6楼602室

E - MAIL: jyyjx@shiharr.com

联系电话: +852-9749-5505

投稿平台: <https://ojs.shiharr.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pISSN 3080-8839

eISSN 3080-8847

发行范围: 全球公开发行

发行定价: 免费赠阅

版权许可: 

教育与教法

2025年第一期第1卷



教育与教法

EDUCATION AND TEACHING



9 773080 884006

总第1期
2025 **1**

编辑部成员

总编辑：王海波

总顾问：胡斌

【主编】

何小兰 曹一君 刘建良 郑少鑫 张畔 张辉 张钰杰

【副主编】

陈立立 全汉柏 吴津钰 刘 伟 龚晓芳 徐天成 尹晨祖 林东武 莫嘉颖
韩 明 陈 倩 张湘晗 潘雨沛 钟昌银 向丽霞 曲 雯 涂保铭 于 鑫
沈 莉 童柯臻

【编辑】

邱勋宇 吴云东 宋丽君 张歆薇 尹 航 丘圣城 姚怡欣 尹云磊 肖仲璋
杜凯伟 李 翔 刘 飞 梁煌君 申巧巧 黄家勇 周春晔 彭易宝 徐 敏
候培森 许智琪 武 冬 徐诗友 郭宇辰 郭 娟 何 徐文 佳 吕淑娟
高 涛 韦云威 周 维 程丽荃 蒋瑀宸 肖 杰 孙蒙蒙 刘 颖 周鸿璋
王镜皓 白天昊 刘金昌 廉 洁 邓舜君

【青年编辑】

唐悦 梁添骏 邓子琳 凤宝鑫 左丹 冯学优 谭辉 陈姝 刘波成 殷玥 罗美伊
庞芷月

【出版顾问】

宋云旨 力娜 张彦清 余楚宁 寇涛 包利强

出版策划：莫岚 桂军

技术编辑：范哲文 刘霜尧

装帧设计：金黛彤

目 录

高等教育与终身教育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雅：含蓄与留白 陈立立等--1
中医药文化在中级阅读课中的故事化教学与文化育人路径 张歌等-----5
传媒构建的困境迷雾：《包法利夫人》 曹一君等-----11
美国影片中反派虚拟角色的研究 徐昊颖等---14
夜灯输液报警器的研究设计与应用 崔子聪等-20

高中与职业教育

史铁生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4——2022年）艺术特色研究文献综述-----24
毅力特质、成就目标定向与高中生数学学业成绩的关联性研究-----29
基于 STEAM 教育理念的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刘泽霖等-----35

教育技术与教育政策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论证式教学中的运用——以“DNA的结构”为例 俞金礼 -----39
当镜头揭露制度：现实主义电影中的教育管理困境与伦理反思 郑少鑫-----45
天人共生与人性复归：老子与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理想的比较研究 聂慧-----52
媒介融合时代建构数字原住民的多元读写能力探究 王璐莹-----58

体育、美育与劳育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逻辑困境与范式重构路径 张辉-----63
美育嵌入心育：高中美术课堂中绘画教学的路径探析-----68

篆刻艺术与古文字在中职美术教学中的融合研究 武晓辉-----72

幼儿、小学和初中教育

新课改下小学音乐教学的改进措施 校欢欢——76
习惯养成——从课堂到生活，从刻意到自觉 贾海菊-----79

思政与德育

逻辑·困境·路径：“大思政课”视域下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三维探析 张红军-----83
初中《道德与法治》“探究与分享”栏目教学改进策略 刘建良-----87
本土文化与初中道法课同向同行的内在逻辑、现实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扬州运河文化与七年级道德与法治课的融合实践 梁添骏-91
教育社会学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师生互动模式研究 马欣悦-----96

教研教改与教育政策

银龄赋能·梯队共生：高校辅导员队伍“老中青”队伍结构重建与育人效能提升 杨贤树-101
教师赋权增能研究的文献综述：理论、现状与未来趋势 丘海湾 -----106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雅：含蓄与留白

陈立立^{1*}，曹一君¹

(¹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广东 廉江 524400)

摘要：本文通过从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角度分析中国传统审美中的“雅”，浅论雅的起源、雅的定义、雅的本质、雅的特点。及雅这一概念对传统中国美学的影响，根据雅的概念引申出的一系列美学观点，剖析了雅对中国审美文化，中国政治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乃至分析雅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与冲突。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在这漫长的文化历史中，雅这一概念不停地锤炼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意趣，研究雅的学问，有利于更深刻剖析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学。

关键词：美学概论；审美；雅；美学理论；中国美学

Elegance in China'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Implication and Blank Space

Lili Chen^{1*}, Yijun Cao¹

(¹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Lianjiang, Guangdong, 524400,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elegance" in China'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definition,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lega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elegance on traditional China aesthetics, and a series of aesthetic viewpoin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legance. Even analyze the situation and conflict of Ya in modern society.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 long cultural history. In this long cultural history, the concept of elegance has constantly tempered Chinese's thinking mode and aesthetic interest, and studying the knowledge of elegance is conducive to a deeper analysis of Chinese's social relations.

Keywords: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Aesthetics; Elegant; Aesthetic theory; China aesthetics

1. 雅的起源：雅与俗

“雅”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第一部诗歌集，即是《诗经》^[1]。众所周知，《诗经》由风、雅、颂三个部分组成，是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分类。“风”指的是西周时期各国的民间歌谣，其中大部分是民歌。“雅”则指的是周王京畿的乐歌。“颂”则是统治者祭祀时的乐歌。因此《诗经》风雅颂中的“雅”作为名词含有指周代朝廷上的乐曲，雅被认为是乐歌的典范。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中便言“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2]。

再来看看《说文》中的雅。雅最早见于金文，与牙声韵并同。《说文》中雅的本义是乌鸦，后以“鸦”为此义的正体。雅假借指正确的，规范的。《论语·述而》中写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引申为高雅，文雅^[3]。因此雅在古汉语中作为形容词的常用意义，指的是纯正的、合乎典范的，常引申为文雅、雅致。

结合此两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即雅这一词指的是较高层次之物。再从文字上结合雅的反义词——俗来分析。何为“俗”，通俗、庸俗、不特别大众化，不高雅即是俗。铜

臭满身则更是俗不可耐。

因此，“雅”的高作何解释，其一从社会关系构成上看，雅是古代社会中贵族的专属，朝廷贵族之曲方可称之为雅；其二，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上看，雅所指代之物和引申都距离经济基础非常遥远。从心理学的个人需求理论角度讲，满足了底层生存需求，跳脱在经济基础之外的人，才会脱俗，脱俗即是雅。正所谓“仓廩足而知礼节”，不为衣食住行奔波劳走，不拘与物质与生存的人，生活从目的性指向无目的性的人，才能去寻求自我表达和自我修饰，即雅的范畴。

2. 雅的美学：雅与韵、妙、空

当雅与俗的对应投射到审美的领域，俗所对应的生存需要理解作为一种目的性，在文学和艺术中体现为自我表达的出发点，即自我表达的目的性。那么雅作为一种审美的评价，中国传统美学中是如何要求达到，表达者即体现了自我表达的目的性，又不显露自我的目的性以便达到雅呢？这里就引申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即是“韵”。将自我表达的显化如文章、画作等作为一个起点，雅的评价视为终点，优秀的艺术创作者便在于将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段无限拉长，但是又必然的让读者明白，此起点必然连接彼端点，而不会引发误解和歧义。起点到终点这无限拉长的线段便是“韵”，因此称“韵味无穷”

“韵”的本义是指音韵，声韵。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写“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但我们此处提及的韵，更贴近魏晋南北朝时元气论中“气韵生动”命题的韵，因此并不是指节奏，韵律。气韵生动由谢赫提出，他在《古画品录》中评价画作要“气韵生动”，即是说为了追求妙的境界，画面要通向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也是强调从有限指向无限。

中国美学在这里提供了与西方审美相互区分的关键点，西方的审美着重于模仿和再现，注重真实具体地再现物象，而中国美学要求指向一种无限，这种无限指向整个人生宇宙自然。正如佛家所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中国美学要求艺术家创作的具体作品成为可以窥见整个宇宙的管道，要蕴含深沉的宇宙感、历史感、人生感。那么如何实现表述和所指之间无限拉长的距离以便达到韵的感受，进而达到雅的评价。翻阅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传统文论，发现其中给出的答案叫做含蓄和留白。

在传统古代社会当中，艺术表达的种类并不算多，文章是一大类，画作是一大类。含蓄对应便是著书立说一类，画作则对应留白。

南宋严羽著《沧浪诗话》中有核心诗篇《诗辩》，其中言“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引申出诗歌的“兴趣说”，推崇诗歌的含蓄空灵之美。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便是妙处^[4]。实则妙即是通过有限的表达领悟到了韵，品到韵味无穷，便觉妙不可言。即有妙不可言，则是雅。由此可见，如何达到雅的审美，严羽说“言有尽而意无穷”。通过有限的文字，拉伸文字所指代的意境，使文章显化的表达与所指之间诞生漫长的思考距离，使读者有品悟的空间，品悟便是一种韵，以有限指向无限便是雅。

在画作的领域，如何以有限指向无限呢？智慧的古人发现了留白的创作手法。有限的画纸无法画出包罗万象的世界，重复的堆砌只会让画面拥挤而失去美感。于是留白，在画面上只留下一根思考的引线，留下巧妙的空白，引导观者品悟，从而达到韵与妙，进而发出雅的赞叹。一张纸画不下千万只骆驼，一座山峦重重叠叠的小径上三三两两的骆驼却让人觉得山中会走出不可胜数的骆驼。太具体的描绘让人只看到了一座山，起承转折的灵动线条，却让观者仿佛看到千千万万座山。以有限指向无限，追求雅的审美，是中国传统山水画注重写意，而非写实的核心原因。

正是对艺术家创作“雅”的要求，导致对观者也产生了欣赏的要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关于绘画欣赏心理的要求。“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如死灰，说明审美活动是审美主体的精神高度集中，同时也是审美主体的想象的高度的活跃。通过所观察到的物象，通过直觉感性的方式，在审美活动中，和审美的对象达到高度的融合，抛弃自我的欲念、成见和逻辑，从而把握到指向无限的宇宙感、历史感和人生感。中国传统美学中要求创作者

忘我地创作出指向无限的“雅”作，同时也要求审美主体即观者拥有体味“雅”的能力，并给出了具体的指导要求，如何欣赏到“雅”——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

在对有限指向无限的追求中，古人很快引申出了“空”的哲学。“空”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中最博大精深的词，但空本身又表述一种零，空无一物，这本身就是一种精妙绝伦^[5]。空是如何诞生的呢？有限和无限如果作为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那么将这条线段折叠对应，和无穷无尽的最大值的无限对应的点，应该是有限的最有限，最少最少的持有约等于空。所以空在中国哲学里是一种最大的拥有，看起来空无一物，但与此对应的是无障碍，大自在，拥有任何所有的可能性。有所持就一定有所限，空空便是自由。空的哲学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6]。

3. 雅与正

前文说到，雅在古汉语中作为形容词的常用意义，指的是纯正的、合乎典范的。这引出雅的另一方面，要求纯正的、合乎典范的。何为纯正，何为典范？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正”的本义是“是也”即“正中；平正；不偏斜。在甲骨文用到“正”字的上下文里，用的也都是“征伐”之义。在甲骨文字形里，“正从止，从口，口像城邑之形，会征伐城邑之意，乃“征”之初文，本义是征伐”《论语·学而》：“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敏捷处事而谨慎言语，请求有道者匡正。征伐是上位者去做的事情，雅的释义中纯正的，合乎典范的，此处正更贴合正统之义。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制度中，可堪称“正”的只有天子君王，那么纯正的，合乎典范的，即是符合天子所制定的制度秩序。合乎秩序的即是雅，对雅的追求同样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西周时期，周天子制定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礼乐制度，便是定下来全社会需要遵循的法度秩序，也定下了何为所谓的“正”，在那个时期，不符合这些制度的便是不雅，孔子称“礼崩乐坏”。而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谓正统一直深刻古人的思维模式处事风格，乃至对中国的历史产生影响。多少战争力求师出有名，多少逐鹿天下者陈列证据力求证明继承权利的正当性，不正，为中国人所不耻，正，是中国人毕生所求。

正对中国士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通过儒家文化的传播得到加深。自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正在中国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国士人将成为“正人君子”作为毕生所求，如何成为君子，儒家学说重要经典《大学》中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学》中提及的三纲八目是对如何成为正人君子给出的具体方法论，八目中第一个字就是“正”。“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三纲八目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上诞生了无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人。无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人，无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人，无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士人。一生追求雅的中国人，从审美到政治，从个人抱负人生理想到家国情怀，把自我的时间和生命化作书卷上的审美客体，以有限的人生指向无限的情怀。为家园，为君主，为人民，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如果站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很难理解这种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为国家兴衰牵肠挂肚的情怀和行为，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部分，而这是“正”所衍生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构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力，指引着中国士人面对无数人生的抉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传统中国士人把家国稳定统一当做毕生夙愿，这种愿望是超越其自身生命的，对于这种理想的实现是无惧怕生死的，尽管这种愿望于自己并无什么可见的好处。

传统中国士人对三纲八目的追求具象化为对仕途的追求，仕途顺利，有利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顺利或者不顺，由此产生的情绪，悲喜交加五味杂陈，又促使诞生了中国璀璨的古代文学瑰宝，诗缘情，诗言志，感发志意，托物兴辞^[7]。“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是年少的抱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得志时的快意，因为不能拥有报效君主、造福人民的机会而哀伤，从而催生了大量的怀才不遇诗，又因为守护边疆产生的大量边塞羁旅诗^[8]。

4. 雅的今日：雅与大众文化

雅深藏在中国人的处事风格里，饭局文化里也藏着雅的逻辑。交往交流不要直接表明目的，这样太俗不雅，在杯盏之间，徐徐图之^[9]。

在古代社会，教育没有被普及的时候，受教育是上层贵族拥有的专利。封建社会中不被生活需求所累是达到雅的一种门槛，这门槛限制了大量的民众进入雅的范畴。雅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一个人可以读书，琴棋书画精通，品味艺术，需要跳脱于生存需要和经济基础之外。事实上，时至今日，雅的门槛依旧如此高。

伴随着教育普及和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工业化的社会推动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让雅的范畴相对扩张，高雅不再是少部分人的专属。但追求高效率和目的性的工业社会给雅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异变。雅本身是一种低效率，无目的性的活动，雅的范畴扩张加上工业快文化的挤压，今天的人们也把“雅”快餐化、速食化。“十日速成书法家”、“二十节课学会国画”，套路化模板化只会失去韵、失去妙、失去雅。这是对雅的一种追求，却也是对雅追求道路上的一种迷失。

人们调侃快餐爱情的今日，依旧会为“今晚的月色真美”而心动。的在时代的快与慢之间，雅在寻求一种新的生存境遇。

在道德方面，雅正依旧为大部分中国人的准则，不正为公诉良俗所不耻，先集体后自己，舍小家顾大家依旧是主流的价值观。但受到近代西方强调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雅所辐射的主流社会秩序也受到了冲击，精致利己主义者是否合理，如何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契合。当代年轻人如何把握取舍这两种价值观，以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如何引导新生代，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 [1] 周振甫. 诗经译注[M]. 中华书局, 2023.
- [2] 康桂英. 从《通志·总序》看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1(03): 55-57.
- [3] 秦学智. 论语新说[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2.
- [4] 李倩, 宋萌.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之诗论诸说[J]. 新阅读, 2024(07): 49-51.
- [5] 叶朗. 叶朗美学讲演录[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6] 龚隼, 李大华, 夏志前. 中国哲学通史[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 [7] 陳丕武, 劉海珊. 中國古代文論選譯[M].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22.
- [8] 张奎志. 从刘勰到叶燮：中国文论的体系性追求与诗性化品格[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11): 185-192.
- [9] 曹顺庆, 李天道. 雅论与雅俗之辨[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

中医药文化在中级阅读课中的故事化教学与文化育人路径研究

张歌¹, 李莹波^{1*}

(¹ 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 陕西咸阳, 712046)

摘要: 在全球中文教育日益重视语言与文化双重素养的背景下, 将中医药文化引入中级阅读课, 以故事化教学方式展开, 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文化育人融合的有效路径。本文从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价值出发, 论述了故事化教学在提升语言趣味性、促进文化认同及实现语言与价值教育融合方面的优势。通过具体案例如《扁鹊见蔡桓公》《孙思邈仁心仁术》等, 分析了适宜教学的中医药故事选材标准与教学实施路径。文章进一步提出, 将文化育人元素有机嵌入教学全过程, 结合问题引导、跨文化比较和榜样引领等策略, 可有效激发留学生的语言学习兴趣和文化认同感。研究表明, 中医药故事化教学不仅拓展了课堂教学的深度与广度, 也有助于构建具有国际传播力的中文教育新模式。最后, 文章展望了融合数字化手段与本土化改编的未来发展方向, 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切实路径。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 故事化教学; 中级阅读课; 文化育人; 国际中文教育; 文化传播

Story-Based Teaching and Cultural Education Pathway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Intermediate Chinese Reading Courses

Zhang Ge¹, Li Yingbo^{1*}

(^{1*} Sh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Xiayang, Shanxi, 712046, China)

Abstract: Amid the growing emphasis on both linguistic proficiency and cultural literacy in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into intermediate reading courses through story-based teaching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dvancing the goals of culture-oriented education. This paper begins by exploring the distinctive cultural value of TCM and elaborates on the advantages of storytelling pedagogy in enhancing language engagement, foster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instruction with value education. Drawing on representative cases such as Bian Que Visits King Cai and Sun Simiao's Benevolent Medicine, the study analyzes criteria for selecting appropriate TCM stories and outlines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ir classroom implementation.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embedding cultural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teaching process by employing strategies such as inquiry-based reflectio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and role-model exemplification. These methods effectively stimulat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Chinese and deepen their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CM-based

- 5 -

基金项目: 2022 年度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学实践创新项目《基于留学生《中医药文化》和《中华文化与传播》课程的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模式研究》(项目编号:YHJXCX22-101)

作者简介: 张歌 (1999-), 女, 陕西咸阳, 硕士, 研究方向: 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医药文化传播

通信作者: 李莹波, 通讯邮箱: 1376564600@qq.com

storytelling not only enriches the scope and depth of language instruction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shaping a new mode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stro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ve power. Finally, the paper envisions future directions combin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localized adaptations, offering practical pathways to enhance the global influence and appeal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Story-Based Teaching; Intermediate Chinese Reading Class; Cultur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引言

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正朝着语言与文化双重素养并重的方向发展。“文化育人”源于“以文教化”的理念,强调通过文化传承与教化促进个体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融入。进入新时代后,这一概念融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高校人才培养中以文化塑人、以文化启智的重要路径^[1]。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与哲学智慧。其核心理念如“天人合一”、“治未病”等,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具有普世的价值意义。将中医药文化融入中文教育,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还能深化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在国家文化传播战略的引领下,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已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故事化教学,将中医药的经典故事与文化内涵生动呈现,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育人目标。这一教学方式,既符合现代教育的需求,又有效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2]。因此,将中医药文化与文化育人相结合,不仅是中文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实现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通过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中文人才,推动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认同。

1. 中医药故事化教学的价值与意义

故事化教学是一种以“讲故事”的方式组织、设计教学内容的模式,通过叙事手法将理论知识、历史背景、社会条件等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故事,再现理论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引导学生在故事中感悟道理、明辨是非,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它强调的是用故事承载知识、以故事激发思考、通过故事引导理解和认同,不同于传统单向灌输式教学^[3]。

1.1 增强语言学习的趣味性与情境感

中医药故事拥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扁鹊见蔡桓公、孙思邈济世仁心等,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情感共鸣。在故事化教学中,学生在阅读、讨论与演绎过程中,置身于真实而富有文化色彩的语言环境,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对汉语词汇、句式、篇章结构的掌握能力,增强了语感与实际运用能力。同时,通过故事中的典型情境,学生能够更加自然地学习并应用描述、叙述、议论等多种语言技能,为进一步的语言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2 促进文化理解与价值认同

中医药故事不仅是医学知识的载体,更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承载着尊重生命、关爱他人、追求天人合一与社会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在故事化教学中,学生通过感受人物命运与情感变化,直观理解中华文化对生命伦理、社会责任和人际关系的深刻认识。通过与本国文化的对比与联结,学生能够在共鸣中深化对中医药文化及更广泛中华文化的理解,逐步建立起文化尊重与文化认同,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1.3 实现语言教育与文化育人的有机融合

中医药故事中蕴含的家国情怀、职业操守与道德理想，为文化育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契机。通过有意识地选择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如扁鹊不畏权贵坚持医者良知，孙思邈以民为本秉持大医精诚，教师可以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自然融入爱国主义精神、敬业精神、诚信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教育^[4]。

在课堂提问、讨论、写作等多种教学活动中，鼓励学生结合故事人物的精神品质反思个人价值观，促进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教育目标，全面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育人实效与社会影响力^[5]。

2.故事化教学内容与材料选择

2.1 题材选择标准

在中级阅读课中选取中医药故事作为教学材料，需要遵循以下基本标准：

文化底蕴深厚：所选故事应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理念与精神内核，如“天人合一”、“大医精诚”、“仁心仁术”等，确保学生在语言学习的同时，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情节生动曲折：故事应具有鲜明的人物形象与起伏变化的情节结构，能够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情感共鸣，提升课堂互动性和教学趣味性。

语言难度适中：文本内容应符合中级汉语学习者的认知水平，词汇和句式既具有挑战性又可理解，利于学生在实际语言运用中自然过渡与提升。

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故事应蕴含励志向善、关爱生命、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等正面价值观，便于在教学中实现语言教育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2.2 典型材料推荐

《扁鹊见蔡桓公》：医者扁鹊多次劝说蔡桓公及时治疗初病，蔡桓公拒绝，最终病入膏肓，无可救治。该故事强调疾病预防的重要性，体现中医“治未病”的核心思想，同时展现了医者坚持专业判断、尽责劝诫的职业精神，适合作为探讨责任感、专业精神与科学态度的引导案例。

《孙思邈仁心仁术》：药王孙思邈毕生致力于济世救人，不分贵贱贫富，皆以同情心和责任感对待患者，编撰《备急千金要方》广惠天下。该故事突出“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职业道德理想，是引导学生理解医德精神、社会责任和服务意识的重要材料，可在讨论环节深入挖掘其现代意义。

《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为纠正药物记载错误，历经多年实地考察和反复实验，最终完成了巨著《本草纲目》，对后世影响深远。展现了科学严谨、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与服务社会的使命感，适合作为引导学生讨论求真务实精神、科学态度与创新精神的教学素材。

《华佗与麻沸散》：医学家华佗发明麻沸散，实现外科手术中的麻醉，大大减轻了病人痛苦，但因不被理解而遭遇磨难。体现了敢于创新、关爱患者的职业理念，以及坚持信念、不畏艰难的精神风范，可作为探讨科学探索、创新精神与社会认知关系的重要话题材料。

通过上述典型中医药故事的精心选择与合理运用，能够有效激发留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语言应用能力，深化文化认知，潜移默化地实现文化育人目标，推动中级阅读课教学内容与育人功能的双向拓展^[6]。

3.故事化教学的具体实施路径

3.1 课堂教学设计

故事导入：以问题或情境设定引出故事主题，激发学生兴趣。精读分析：逐段讲解故事情节，

讲解关键词汇与句型结构，注重语言输入与文化理解同步推进。价值引导：结合故事情节，引导学生思考人物品质与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念，如责任感、诚信、仁爱等。互动拓展：设计角色扮演、情境对话、小组辩论等活动，促使学生在运用语言的同时加深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3.2 课后延伸活动

阅读展览：组织中医药故事主题阅读展，鼓励学生制作海报、手抄报展示学习成果。讲故事比赛：举办中医药故事讲述比赛，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与文化讲解能力。剧场表演：改编中医药故事为短剧，进行表演与评比，提升学生合作意识与综合运用能力。

4.文化育人元素的融入策略

在中医药文化故事化教学过程中，文化育人不应作为附加内容，而应内嵌于教学全过程中，通过问题引导、比较启发、榜样示范等方式，将价值引导、人格塑造与专业知识传授有机融合，形成“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4.1 问题引导式渗透

故事教学的核心不在于讲述结果，而在于引导学生思考过程。在中医药历史人物和典型案例的讲解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设置引发深度思考的问题，如：“扁鹊为什么要坚持三次劝说蔡桓公？”、“孙思邈强调大医精诚”，在今天还有怎样的现实意义等。这类问题不仅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人物行为背后的文化价值观，也促使其对自身信念、责任意识、专业态度等方面进行反思与构建。通过引导学生在故事中提问、思考与表达，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的转变，从而达到知识学习与价值塑造的双重目标。

4.2 跨文化比较激发认知共鸣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理念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如仁爱、敬畏生命、整体观等。这些价值理念在世界多种传统医学文化中亦有体现。教师可引导留学生结合自身文化背景进行跨文化对比^[7]，如中医讲求“医乃仁术”，而印度传统医学也强调“疗愈为爱”；通过此类比较，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感。在对比中认识差异，在共性中加深理解，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全球视野与跨文化沟通能力，为其成长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者夯实认知基础。

4.3 榜样引领激发道德情感

历史人物是文化育人的生动教材。中医药发展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典范人物，如“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医宗”李时珍等。通过讲述他们在逆境中坚守信念、无私奉献、救民于病的真实事迹，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增强故事感染力，更能树立可亲、可敬、可信的文化榜样。在人物命运与精神中，学生能够感受到真实的价值力量，唤起道德情感，引导其在潜移默化中向榜样学习，塑造专业责任感与人格品质，实现知识与品德的同步成长^[8]。

5.中级阅读课中医药故事化教学模式分析

在中级阅读课中融入中医药故事化教学，是提升语言技能、深化文化理解、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创新路径。该模式突破了传统知识传授的单向逻辑，强调“语言+故事+育人”多维融合，具有如下特点：将故事化教学与文化育人深度整合^[9]，强化学生的沉浸感与情感参与；精选中医药经典故事，并依据不同留学生的文化背景进行适度本土化改写，实现“文化翻译”的有效衔接^[10]；通过语言产出、文化理解与价值观内化三维指标，评价学生的综合成长路径。

以《孙思邈仁心仁术》为例，课程设计突出故事叙事的情境感，紧扣中医药文化精神，结合语言学习与价值引导，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跨文化教学方面,教师引导学生将中医“仁心仁术”的理念与本国医疗文化进行比较。例如,一位伊朗学生提出波斯医学同样注重“身心合一”的治疗观念,引发班级深入讨论。这种“以异衬同”的比较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共鸣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课堂设计注重文化育人的自然渗透。通过引导性提问,如“孙思邈为何强调医德重于医术?”、“你国的医生是否也强调‘医德’?”,鼓励学生联系现实社会,思考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在互动环节中,学生分组扮演孙思邈与患者角色,重现医患沟通过程,并尝试用母语重述故事核心价值,实现语言迁移与文化内化的双重目标。

在教学反馈方面,教师采用“访谈+反思日志”双重机制,收集学生的学习体验。多数学生表示,中医药故事“比单纯文本更容易记住”,“故事中有入、有情、有文化”。他们普遍认为该教学模式帮助他们理解了汉语语境中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亲近感与传播意愿。

课后,布置主题短文写作任务,如《我心中的医者仁心》或《中医精神与我们国家的医疗观念》,促使学生在总结故事内容的同时,进行文化反思与价值内化,延伸了课堂教学的育人功能。

整体来看,中医药故事化教学不仅丰富了中级阅读课的内容与形式,提升了课堂吸引力,更在跨文化教学中体现了深层交流价值,推动语言教学、文化传播与人格塑造的有机统一。

6.未来展望

未来,中医药故事化教学与文化育人应进一步深化与细化。首先,应加强中医药文化故事资源的系统整理与教材开发,遴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主题的典型故事,分层分类构建多样化、系统化的教学案例库,以适应不同语言水平和文化背景留学生的学习需求。针对初级、中级、高级不同阶段的学生,应设置相应的故事难度与文化元素切入点,精准实现教学与育人功能的同步提升。

其次,应探索将数字化技术与故事化教学深度结合,开发中医药文化故事互动学习平台,通过虚拟情境再现历史人物与医学场景,提升学生的沉浸式体验感和学习积极性。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打造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系统,使中医药故事化学习更加灵活、高效、富有吸引力。

同时,应积极拓展中医药文化故事的国际传播应用,结合不同国家留学生的文化背景,设计本土化改编的中医药故事教材,如中医典籍节选、医德人物群像、医患故事改编等,持续丰富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化体验与价值引领的内涵,助力中医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弘扬,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亲和力。

7.结语

中级阅读课中的中医药故事化教学,不仅是提升留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通过科学设计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注重价值引导,能够实现语言教育与文化育人的深度融合,助力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培养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与人文精神的国际化人才。

参考文献:

- [1] 闵敏,程君林.文化育人视域下来华留学生知华友华教育研究[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04):13-16.
- [2] 王洪龙,李金莹,周艳芬,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文化重要论述融入医学生思政教育研究[J].高教学刊,2025,11(12):185-188.DOI:10.19980/j.CN23-1593/G4.2025.12.045.
- [3] 陈子君.论故事化教学在播音主持专业课程思政中的应用路径——基于《广播电视基础》课程的教学实践[J/OL].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2025-05-1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890.C.20241127.1506.002.html>.
- [4] 孟玲,朱云梦,崔佳兴.中国传统医德融入医学院校思政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J].卫生职业教

- 育,2025,43(08):28-31.DOI:10.20037/j.issn.1671-1246.2025.08.08.
- [5] 李泉,孙莹.中国文化教学新思路:内容本地化、方法故事化[J].语言文字应用,2023,(01):33-44.DOI:10.16499/j.cnki.1003-5397.2023.01.002.
- [6] 王一丹.叙事视域下中医药文化传播探析——以国漫《中医故事》为例[J].中国传媒科技,2023,(11):72-76.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3.11.014.
- [7] 谢苏雅,张宜岩.故事化教学在语言发展中的应用研究[J].新课程研究,2025,(09):78-80.
- [8] 李文国.以榜样文化为引领打造学校德育特色[J].新班主任,2025,(12):11-12.
- [9] 郑国平,谢广平.学通用语言讲中国故事——大学英语课程育人探索[J].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2(01):71-74.
- [10] 王瑞.翻译研究中“文化问题”的历时演变[J].当代外语研究,2025,(03):25-35+171.

传媒构建的困境迷雾：《包法利夫人》

曹一君¹，陈立立^{1*}

(¹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广东廉江 524400)

摘要：福楼拜早在 18 世纪 90 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初登历史舞台，传媒文化崭露头角之际，就已经敏锐觉察到文学作品、艺术传媒或可对人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法利夫人》就是一本这样的小说，女主因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沉浸在文化作品虚构的浪漫主义和理想状态之中，在现实和理想的巨大落差之中，持续忽视现实，透支生活，最终由于债务缠身自杀而亡。包法利夫人的生活方式是当今社会许多人的真实写照，其悲剧应当为今日社会敲响警钟。

关键词：文化作品；传媒手段；非理性行为；理想现实落差；消费主义

The fog of the dilemma of media construction: Madame Bovary

CAO Yijun¹, Chen Lili^{1*}

(¹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Lianjiang, Guangdong, 524400, China)

Abstract: Flaubert, as early as the 1890s, when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was just beginning to make its mark on history and media culture was emerging, had already keenly perceived that literary works and artistic media could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people. "Madame Bovary" is such a novel; the heroine, influenced by literary works, becomes immersed in the romanticism and idealized state of cultural creations. Caught between reality and ideals, she continues to ignore reality, overdraws her life, and ultimately commits suicide due to debt. The lifestyle of Madame Bovary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many people in today's society, and her tragedy should serve as a warning bell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Cultural works; Media means; Irrational behavior; Gap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Consumerism

1. 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作品。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到了十九世纪，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间反复较量，法国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里，法国文学空前活跃和繁荣，开始了它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星光璀璨的文坛里，福楼拜无疑是其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星星之一^[1]。《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完成于 1856 年四月。该书在同年十月开始在《巴黎评论》连载，但小说显露出来的锋芒激怒当局，福楼拜因此受到官方的指控，认为有伤风化。在两个月的诉讼后，法庭宣告此书并非淫秽作品，第二年，该书全书面世，福楼拜因此声名大震^[2]。

- 11 -

基金项目：无

作者简介：曹一君(2001—)，男，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陈立立(2002—)，女，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通讯作者：陈立立，邮箱：13432879050@163.com

2.《包法利夫人》：对浪漫主义的小资追求

《包法利夫人》写的是一个女人，死于幻想和现实间隙的故事。包法利夫人爱玛是一个农户的女儿，自幼母亲早逝，父亲的农庄收入尚且可观，为了女儿爱玛受到一定的教育，送她进入了修道院学习^[3]。爱玛由于母亲的缺失，没有在母亲那里得到她作为这个阶级本应习得的一些优秀品质，比如勤奋踏实，朴实能干。又因为在修道院的学习，接触到了很多浪漫主义色彩，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影响。这一切导致了爱玛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父亲收入可观的农庄让她尚且不必为生计发愁，美丽的外貌又让她无形中增加了幻想的资本。她每天构思自己理想的生活，在华美的建筑中，在闪耀的灯光之下，穿着璀璨的礼服和公爵起舞。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遇到了男主人公，刚刚丧偶的包法利先生。包法利先生查理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医生，他这个人平淡且木讷，刚刚死去的妻子是一个寡妇，查理的母亲因看中寡妇的离婚财产而做主让儿子查理娶其为妻，在发现寡妇所谓的财产不存在时叫苦不迭，好在不久这位妻子就去世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在充满陷阱的生活里，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谁才是猎物。查理是一个医生，他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认识了爱玛的父亲，并因此爱上了爱玛。严格来说，查理也并不是一个对爱情忠诚的人，他在妻子尚未离世时就已经和爱玛眉目传情，恨不得日日相见，妻子的去世正如瞌睡时遇上了个枕头，真是死的恰到好处。

查理和爱玛就这样结婚了，刚在一起时，热恋的激情尚未褪去，两个人也是如胶似漆爱意绵延。爱玛心中的浪漫色彩总是让呆板的查理感到十分新鲜，比如优雅的钢琴曲，精心布置的地毯，蕾丝裁制的杯垫，想方设法烧制的精致菜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穷精致。查理被这种穷精致深深的迷惑住，他对自己的妻子非常满意，并日复一日对她充满了爱和迷恋。爱玛则在贯彻着心中的浪漫色彩生活，并从未停止心中对幻想生活的要求。

查理在一次行医途中，医好了一位侯爵，这位侯爵为了感谢包法利先生，邀请包法利夫妇去庄园参加晚会。这对包法利夫人来说，是一件大事，正好比十年追星老粉抢到了演唱会的门票，包法利夫人终于有机会感受到她心心念念的生活。包法利夫人精心打扮，密切观察舞会上其他夫人的姿势，以便于及时调整自己，让自己马上融入这个团体。她和一位邀请她跳舞的公爵跳了一夜的舞，爱玛此刻的心中应该正如歌词唱的“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她彻底的沉迷在这场华丽的晚会里无法自拔。在往后的每一天里都回想这一天的细节，甚至捡走公爵的雪茄匣留作纪念，时时提醒自己那一场舞会并非是梦。她心中的欲望越来越大，以至于她完全不满于现实的生活，每日在苦思之中竟日渐消瘦下来，一个拼单假名媛在一次拼单成功后享受到了极致的虚荣的快乐，却永远的失去了拼单的机会。对她百依百顺的查理完全无法得知她内心的想法，以为她是精神出现了问题，于是举家搬迁为了她养病换个环境。

包法利夫人在幻想和现实的差距里找到了绝佳的出气点，那就是丈夫查理，尽管查理对她百依百顺，但她厌恶极了他的不懂浪漫，呆板，看他哪哪都不好，甚至是愚蠢至极。爱玛在新家迅速的找到了情人，在和第一位情人赖昂眉来眼去，调情未果后立刻无缝连接和另一位情人罗道尔弗在一起了。她在情人身上演绎了极致的浪漫，所有的学过的没学过的浪漫桥段她都一一上演，每天夹在偷情的快感里越陷越深，她在这样的生活里再次精神焕发，查理几度认为是搬家治好了妻子的郁郁寡欢。这种快乐让她无法再忍受木讷的查理，她决定带上女儿和罗道尔弗私奔。此时的爱玛是一个十足的恋爱脑，她自带的浪漫滤镜让她没有辨别出罗道尔弗的逢场作戏，罗道尔弗只是一个热衷于玩弄女儿的情场浪子，他当然不会和包法利夫人孤注一掷谱写爱的私奔华章。包法利夫人在私奔临行前夕才发现了这一点，狡猾的男人还说的声泪俱下以掩饰自己的逢场作戏。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再次病了起来，罗道尔弗不是那个带她去往幻想生活的人，她不得不再次坠入苍白的现实生活，每分每秒都在幻想和现实的煎熬里度过。直至她不久后再次遇到学成归来的，偷情未遂的第一位情人赖昂，她又一次陷入这种爱情的狂欢，这一次变本加厉，偷了查理的诊费去约会，借款和情人住最好的旅馆，穷精致的毛病又犯了，不管有没有钱，都要住那个豪华的旅店，吃昂贵的点心。

包法利夫人最后死于砒霜自杀，巨额的债务给她沉重的打击，她无法向查理解释这一笔债务的来源，而她的情人在一次次的风花雪月中产生了厌倦，也根本无法帮助她偿还债务，她甚至去找了罗道尔弗，当然也无济于事，走投无路之下，包法利夫人选择了自杀。而我们的老实人查理，直至爱玛去世，全世界都知道爱玛出轨，他依然木讷的对这些事情毫无所知。

通过分析发现，因为她幼年时期被父母抛弃，是被家里的长辈抚养长大的。而长辈最经常说

的话就是，如果你不乖，我就不要你了。这句话对她的人生影响巨大，不乖、不优秀——被抛弃，这个公式成为了指导她人生的真理^[4]。她没有自我的边界，不知道别人的侵犯到哪一步是侵犯，总是无底线的退让和迎合，因为害怕自己不被喜欢，然后被抛弃，同时也让她总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去努力，因为很明显，潜意识的思维模式告诉她，不优秀，也会被抛弃^[5]。

3.爱玛式悲剧在今日

我们的社会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包法利夫人，拼单假名媛，穷精致正是越来越多的戏码，抱着幻想生活，把生活幻想成就是理想那个样子的人和行为，更是不胜枚举^[6]。回头看包法利夫人的偷情，会惊讶的发现，她爱的热烈的也许并不是情人罗道尔弗，或者是赖昂，她热烈的向往着的，始终是那种幻想的生活，她不断的在寻找幻想和现实之间连接点，这两个点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仅此而已，所以她大可以和随便一个男人无缝连接。

这是一个无法平衡幻想与现实，最终死于两者间隙的故事。在这个飞速运行的多媒体时代，抖音、快手等软件层出不穷，自媒体经济盛行，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传播媒介，千奇百怪的消费陷阱，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信息渗透每一个人，引导和呼唤每一个人去成为媒体建构的客体。认清生活的本质，认清想象和现实的距离，我们才不会成为包法利夫人。

在我们高喊女性主义的今日，女性渴望追求得到的物质生活等，都需要依靠自身的奋斗去获得，任何依靠他人、透支未来的方式都是对女性真正寻求自我的困境。

参考文献

- [1]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11.382.
- [2] 李嘉懿.福楼拜虚无主义思想研究[M].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09.222.
- [3] 徐美静,高丽.《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母性与身体欲望[J].文化学刊,2024,(08):90-93.
- [4] 颜琳婕.《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女性空间意识[J].三角洲,2024,(02):142-146.
- [5] 郭秀华.《包法利夫人》中的“物化”现象探析[J].嘉应文学,2023,(15):73-75.
- [6] 王嘉怡.《包法利夫人》悲剧美学意蕴——以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为视角[J].名作欣赏,2023,(21):87-90.

美国影片中反派虚拟角色的研究

徐昊颖^{1*}, 曹一君¹

(¹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广东 廉江 524000)

摘要: 随着影视行业的不断发展创新, 影视作品中加入越来越多的虚拟角色。他们不仅有鲜活的生命, 而且具备完善的思想情感, 有的是充满阳光的正义虚拟角色, 有的则是布满棱角的反派虚拟角色。通常影视作品塑造的正面角色被人所歌颂, 而反派角色在受众观影后就被抛掷脑后。但是, 从美国虚拟角色电影发展趋势来说, 反派虚拟角色在影片中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塑造一个典型的、深入人心的反面虚拟角色也是系列虚拟电影的叙事入口, 它与正派产生矛盾冲突从而促进故事的情节发展, 使电影更具有紧迫感和跌宕性。美国漫威电影中, 铁霸王、鞭索、基里安博士、红骷髅、泽莫、海拉、灭霸等反面虚拟角色不仅有着独特的造型特征和风格, 同时还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让每一部新的漫威系列电影都充满故事性, 从而塑造更多经典的反派虚拟角色。因此本文综合运用案例研究, 文本研究等方式对反派虚拟角色的意义进行研究。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反派虚拟角色在作品中所呈现的状态, 努力探索反派虚拟角色身后的艺术价值与社会文化功能, 并以美国影片中的反派虚拟角色为窗口, 分析反派虚拟角色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 通过现有的成功经典案例中的反派虚拟角色, 探究美国影片中反派虚拟角色的塑造方法。

关键词: 反派虚拟角色; 价值; 社会问题; 角色塑造

Research on the virtual characters of villains in American films

Xu Haoying^{1*}, Cao Yijun¹

(¹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Lianjiang, Guangdong Province, 524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more and more virtual characters are added to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They not only have vivid lives, but also have complete thoughts and emotions. Some are sunny and righteous virtual characters, while others are villain virtual characters full of edges and corners. Usually, the positive characters portrayed i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re praised, while the villain is thrown away after the audience watches the movie. However, judg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virtual character mov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value of villain virtual characters in the film cannot be ignored. Creating a typical and deeply rooted in the negative virtual character is also the narrative entrance for the series of virtual movies. It creates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with decency, thereby promoting the plot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making the film more urgency and ups and downs. In American Marvel movies, the negative virtual characters such as Iron Overlord, Whiscrew, Dr. Killian, Red Skull, Zemo, Hera, Thanos, etc. not only have unique sty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s, but also make the plot of the storyline ups and downs. Make every new Marvel movie full of storylines, thus creating more classic villain virtual character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uses case studies, text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to study the significance of villain virtual characters. Through the state

presented by representative villain virtual characters in the works, we strive to explore the artistic value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behind the villain virtual characters, and use the villain virtual characters in American films as a window to analyze the social problems reflected by the villain virtual characters, and explore the method of shaping villain virtual characters in American films through the villain virtual characters in existing successful classic cases.

Keywords: Villain virtual characters; value; social issues; role shaping

引言

自 1895 年世界第一部电影诞生至今, 电影从最开始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产物到现在成为一门伟大的艺术, 这些跟时代的进步、人文观念的转变、社会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时随着电影行业的不断发展进步, 虚拟角色被大量的引入到影片中。在影片中的虚拟角色越来越受到受众的追捧, 如美国动漫《疯狂动物城》中的兔子朱迪以及狐狸尼克和美国电影《银河护卫队》中的树人格鲁特等。朱迪、尼克和格鲁特的设定就非常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同样, 在影片中承载着正义力量的虚拟角色被演绎的极度精彩, 但是受众往往只会注重正面角色带来的正能量而忽视衬托正义角色的反派虚拟角色带来的危害和警示。《疯狂动物城》播出后, 最受热议和追捧的则是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 但是却极少热度是在反派角色绵羊的身上。因此本文通过影视案例分析以及文本研究对美国影片中的反派虚拟角色进行探讨, 发现反派虚拟角色存在的类型和在影片中承载的核心价值。

1. 反派虚拟角色的概述

1.1 反派虚拟角色的概念

虚拟角色是客观世界不存在的, 是借助影视艺术创作的手段以及创作者精心构思、设计出来的各种形象, 他可能是具有人类基本特征但是却拥有超能力^[1]。如漫威系列电影中的绿巨人、洛基等; 可能是在现实生活存在的事物但是不具有人的特性, 但是在影视中获得人的特性。这一类型的虚拟角色则是在动画动漫中体现的居多, 例如动漫《疯狂动物城》里的所有角色; 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事物, 是由创作者创作出来的, 例如《复仇者联盟》的灭霸。虽然这些是虚拟角色, 但是在影片中他们同样和人类一样拥有性格、思想以及行为观念。

正反原本就是相对的。反派则是与正义角色的行为相对、思想观念相对、性格相对的角色设定。但是在反派的构成中往往不是单一的情节设定。可能是在社会生存中遭受到常人不能接受的不公平对待, 导致原本心存善念的他们不断的走向极端世界; 也可能是他们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使得自己的心理状态发生急剧变化。最终自己的行为 and 心智不受控制, 导致走向正义的对立面, 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反派坏人^[2]。例如美国影片《X 战警》中的万磁王, 他的母亲、父亲、妹妹都被杀死埋在集体坟墓中, 导致马克思的能力觉醒, 只有他一人侥幸存活。正是因为经历了二战的残酷和非人的对待, 使得万磁王成为 X 战警的头号反派。

综上所述, 反派虚拟角色是在角色构成方面由创作者创造出来的非现实意义的角色; 在影视作品表现中反派虚拟角色是和正面的虚拟角色相对, 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为影视作品增添张力。

1.2 反派虚拟角色的特征

为使反派角色形象丰满立体, 避免反派角色因为角色定义而故意设计显得僵硬死板, 近年来, 美国影视作品不再创造“单纯”的反派, 大部分作品不再把反派的形象设计得凶神恶煞, 让观众一眼就能分辨的出来。很多作品描述了反派在变得邪恶之前的经历, 通常将其设定为平凡、弱小的社会成员, 因遭到迫害或意外变得思想行为极端; 一些作品着力刻画反派复杂的性格特征, 展现出他们作为人的良知与温情还没有完全消失的一面, 显得反派角色更加真实而富有感染力。通常影视作品中的反派在性格、力量、行为、外表等方面都是相对极端的。

性格特征: 角色的性格刻画是内在的, 他的形象刻画没有特别的突出, 使观众再看的时候关注度在上面极其的少, 给本身的反派角色多了很多伪装, 往往到最后才会揭露出他的真实面目,

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探究的心态去观看这部影片。例如《疯狂动物城》的小羊副市长的角色，他的形象刻画很普通也很贴合逻辑，但是在影片中，他的真实性格充满仇恨、疯狂、残忍。影片里的羊副市长外形温顺可爱乖巧，一直任劳任怨的工作，并且很热心的帮助兔子朱迪，故事前一大部分都没有透露出一丁点可疑的地方。直到最后才揭示出羊副市长的计划，暴露出羊副市长的阴险狡诈。着实让观影者为之感叹。往往就是观众觉得毫不起眼的角色才可以成功塑造成性格扭曲的大反派。

力量特征：有些反派虚拟角色一改往常的奸邪小人的形态，采用的是体格高大看起来格外具有战斗力的形象与之相对应的正义角色的体态往往就是弱小的、势单力薄的。对于力量型反派虚拟角色的塑造，首先他们的身材是无比的巨大，身体比例严重失调，做事情不计较后果。力量型反派虚拟角色做事是莽撞的，没有头脑。如《圆梦巨人》中的食人巨人们，他们浑身充满野兽凶猛的气息，身材高大，面部表情充满鄙夷的态度，吞噬人类，时常欺负体型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巨人；又如《阿丽塔》里的地下领主格鲁依什卡，他是半机器人状态，浑身是金属制做而成，体格也是极大无比，看上去就是充满爆发力的人物。做事残暴、狂躁并且不那么容易对付。

行为特征：行为任意杀人、大肆破坏、危害公共安全、破坏公共秩序、企图颠覆国家。例如《环太平洋》中的怪兽想要入侵地球，对人类的城市造成巨大的破坏。

外表特征：反派的形象塑造总会给人视觉的冲突，几乎每个影片中都少不了凶恶、狰狞可怕，令人感到恐惧、厌恶的反派形象。他们面骨如骷髅一般，这种形态的反派角色在视觉上就会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他们的形象就如同社会中重度吸毒者的样貌。没有朝气，有的吸毒者甚至家破人亡，当他们没有经济来源去吸食毒品的时候，内心黑暗的一面就会彰显出来。美国影视中反派虚拟角色的塑造也常会借用现实生活中的这类典型人物，用他们身上的某一特征来打造符合影视形象的反派虚拟角色。比如说利用他们的外貌特征，身材比较瘦小，眼神时常透露出奸诈的神情，嘴巴细长，牙齿参差不齐。往往这种样貌极端的形象在画面中一出来，受众就会把他往反面人物去靠拢，使得角色的反派特性更加的突出，让受众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是坏的存在。例如《指环王》里的咕噜，咕噜是曾经的魔戒持有者是一种扭曲又凶残的生物，带着双重人格的他一直在追逐实现目标就是再次的拥有魔戒^[3]。他在拥有魔戒后被魔戒所影响才导致他扭曲性格的产生，得到过强大力量后不在愿意接受弱小平庸，将贪婪的性格展现的淋漓尽致。

2.美国影片中反派虚拟角色塑造的意义

2.1 反派虚拟角色在影片结构中的意义

在一部以虚拟角色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影视作品中，平白直述的去宣扬正面虚拟角色伟大善良，高大无私，给观众带来的冲击力不是很大。往往在影片中存在诡计多端，阴险狡诈的反派虚拟角色。不用刻意的去渲染正面虚拟角色，正面虚拟角色自身的主角光环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表现。同时观众在观看影视作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自身代入感，会对正派虚拟角色的命运感到紧张，同时对影片中的反派虚拟角色产生愤恨的心情。当观众情绪到位就可以很好的证明作品中的反派虚拟角色塑造的很成功。一个正面形象的饱满，往往就是离不开反面角色的衬托，例如在美国影片《阿丽塔》中的反派虚拟角色，外形巨大的格鲁依什卡，他在战斗中浑身充满残暴因子，不管对方的生死，一直为剧中的大反派卖命。每次格鲁依什卡的一出场，阿丽塔就会被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每次当阿丽塔奋力反抗的时候，让观众看的直呼过瘾。从中也凸显出阿丽塔的勇者精神以及强大的使命感。其中有很多大一部分的功劳是反派格鲁依什卡的存在。

自2018年美国推出一个新系列的科幻电影《毒液》。毒液的存在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在没有宿主的情形下，毒液是黑色粘稠状的液体。攻击性虽然也有但是基本上削弱一大半。第二种就是找到宿主，他们依附与宿主生存，在饮食习惯上，毒液是一种食人的物体，在影片中，毒液找到男主的身体作为自己的宿主，刚开始的融合就可以看出毒液骨子里就具有凶残的暴力因子，易怒、暴饮暴食、打人等。随着毒液和男主长时间的相处，两个人都互相沟通，慢慢的毒液的性格由着宿主发生改变，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学会沟通，会辨别是非，懂得他的同伴行为是错误的，最终毒液和男主达成共识，一起消灭掉反方。维护住世界的和平。起初毒液的个人行为也是恶劣不可控制的，但是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也就是宿主的行为影响，导致最终毒液成为具有正义感的正面角色^[4]。

2.2 反派虚拟角色在影片中的叙事意义

一个完整影片想要成功的发展下去，需要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完整结构。在叙事部分又需要有矛盾冲突的出现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5]。矛盾冲突的出现也是分为：矛盾的出现—矛盾的发展—矛盾的激化—矛盾的解决这四个部分构成。而矛盾的出现必然需要有对立的双方存在，如正义和邪恶，善良与恶毒，亦或是双方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念。通常，矛盾的制造者会交给影片中所谓的反派角色。由此看来，想要具有丰富的故事情节、推动情节的发展，反派角色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在一部以虚拟角色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影视作品中，反派虚拟角色同样承载着激化矛盾的作用。就像美国电影《复仇者联盟》里的反派虚拟角色灭霸，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持有与漫威英雄相反的观念，并且灭霸的能力也是无限大的，一个响指就可以使整个宇宙毁灭^[6]。也正是因为有灭霸的存在，才会使得复仇者联盟电影如此的受到欢迎。因为灭霸的存在，影片中对持的场面无比的激烈，故事情节也跌宕起伏。影片中正义的角色也被彰显得尤为勇敢。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像灭霸这样的反派虚拟角色制造的矛盾，漫威中的诸多英雄人物就会没有解决矛盾的机会。

3. 反派虚拟角色在社会认知中的意义

3.1 价值观念的引导

美国许多影视作品中的反派虚拟角色多少都隐喻一些人性的黑暗面，通过揭示这类人性的黑暗面，从而引导受众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如《疯狂动物城》中，剽窃权力的绵羊副市长，代表人性中对权力的欲望，观众在观看影片中便会不自觉的将自己放置在角色上。绵羊想要掌控一切，贪婪的想要有极其大的权力。在实现掌权的过程中手段让人不寒而栗。但是绵羊的最终结果则是被关进监狱。光明重回动物城。也就隐射出，虽然人人都渴望掌握权力，拥有身份的象征，但是，当误入歧途后，不仅永远得不到权力反而会为此牺牲很大的代价。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是跟人类在社会发展中的状态相关^[7]。绵羊的贪婪和越权最终遭到社会的管制，在这里也体现出心术不正带来的后果。从而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3.2 社会现象的批判

在《疯狂动物城》中，对于性别偏见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也表现的尤其明显。在职场上，兔子朱迪作为女性，第一天上班就被歧视，不被委以重任，只是被派去贴罚单。表现出在警察职业中，女性是出于劣势地位^[8]。在影片中表现出来就是只有男性才有资格胜任警察职业。有很强的男性化色彩。

同时在影片中地域偏见也是格外的严重，动物城划分出很多的区域——啮齿动物区、大象区、狐狸区，同时也包括热带雨林区、冻土区、沙漠区、绿洲区还有中心区域。影片中有一幕是当狐狸尼克想要在大象冰淇淋店买冰淇淋时，大象拒绝为狐狸尼克提供商品，让尼克回自己的狐狸区去买。不仅仅这一幕显现出地域偏见严重，再后来爆发哺乳动物会狂暴化言论时，动物城瞬间分裂成各个区域，而哺乳动物则被歧视，坐在地铁上会被用异样眼光对待，很大一部分人，让哺乳动物滚出属于他们的领地，让原本和谐的动物城变得四分五裂。不具有身份和地域优势，当出现问题时，总是会被放置最底端的位置对待^[9]。这种现象也象征着现实社会在遇到涉及到本身利益的时候，就会表现的趋附附热。

经济象征着话语权也在影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比如说在影片中哺乳动物鼯鼠属于最小的一类，但是鼯鼠的经济却是影片角色中最可观的，以致于身材魁梧，擅长武力的北极熊为身材极小的鼯鼠打工，在鼯鼠身上就可以看出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掌握极高的话语权。

在美国影片《哈利波特》中，伏地魔虽然是一个反派的存在，但是他身上的所有经历却折射出严重的社会问题。伏地魔作为《哈利波特》电影中最重要角色，虽然在观众的眼中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存在，但是却无人从伏地魔的另一面去了解他，伏地魔是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幸，从小就被父亲母亲抛弃，无家可归的他被送往孤儿院生活。但是在那里的生活对伏地魔来说却是折磨，幼小的他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而且被孤儿院的总管认为是古怪的孩子，为了可以存活，伏地魔必须压制住自己的内心。时间一长就导致伏地魔从一位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霍格沃兹最出

色的学生，成长为一个邪恶的、对抗整个魔法世界、妄图毁灭所有麻瓜的黑恶魔。如果伏地魔的小时候生活环境是纯净美好的，伏地魔的未来可能就是明朗的。因为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因素导致伏地魔最终扭曲的性格^[10]。

4. 反派虚拟角色的塑造方法

4.1 形象贴合角色性格设定

影视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视觉。在针对形象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打造出符合大众审美的外形。才会在影视的市场中得以长期的发展。在反派虚拟角色的形象设计上，根据图形构成学多采用三角形，三角形在视觉上显得锐利、扩张；锐利的三角形给人的感觉也是尖酸刻薄的，将三角形的元素融合在反派虚拟角色的造型效果会更加的突出^[11]。除三角形之外，多采用由棱角感的元素，使受众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善类的角色。同时，心理学家认为色彩可以对人的感觉、思维、情绪、行动等都产生一定的作用。如《白雪公主》中女巫披着一身黑色的袍子，和色彩明快、纯洁的白雪公主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在心理就会将两个元素放置在两端进行对比。人对于色彩的敏感度是特别高的。在一部影片中想要塑造好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反派虚拟角色，直观形象的线条以及色彩的搭配上就要格外的下功夫。在创作的时候一定要融合观众的感受，尊重角色承载的意义，打造一个可以与观众产生共鸣的反派虚拟角色。

4.2 性格塑造趋于多元化

虚拟角色的塑造不仅仅是一个视觉形象的塑造，不能只注重外形与轮廓，应该在创作的同时考虑形象的背后生活和以及成长环境中造就的性格。在早期的许多具有虚拟元素的影视作品中，反派往往都是很直白的偏执性格。没有太多的故事背景，让受众感觉到反派的存在只是衬托主角的。随着观众对待影视的要求越来越高，单一化的反派虚拟角色已经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所以，在创作反派虚拟角色的时候要倾注更多的背景赋予这个反派角色^[12]。不仅要让反派是坏蛋而且要坏的有据可循。如果创作者只是单一的想在故事情节中加一个坏蛋角色，按照固定模式去创作的话，创作出来的反派势必是公式化、脸谱化、简单化。

同时也要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受众群体去设置不同反派虚拟角色的性格。一般在针对低龄受众者的影视作品中的反派虚拟角色基本上采用单一化性格塑造方法；对于非低龄的受众群体，在反派虚拟角色性格塑造上则需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要塑造一个没有瑕疵的复杂反派，例如《卑鄙的我》中的小黄人们，之所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呆萌的外型，更是因为各异的性格。虽然小黄人基本形态相似，但是创造者却赋予了他们鲜明的性格。一堆小黄人中每一个小黄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比如发型有的是竖立起来的，小黄人的性格就有些暴躁；有的发型是中分，小黄人的性格就是偏爱享受生活的等等。由此看出在反派虚拟角色性格的创造上要趋于多元化。正如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合，反派性格的复杂化与其社会生存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3]”因此在塑造反派虚拟角色中，人物既要有普通的一面也要有特殊的一面，有时候表现出美好的一面，有时候在某些方面又表现出极其的恶劣。就像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一样，也不是单一性。人在社会行为中都传递着许多变换不定的性格因素：有时热心、有时冷漠、有时理性、有时又冲动等。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其它性格元素而只注重人物主导性格元素的存在，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在一些特殊的情景下，次要性格元素也会在情况变化中形成人物新的性格特征，转变为主导性格。因此这也可以作为反派虚拟角色创作时的一个方式。

5. 结束语

在一部以虚拟角色作为主要元素的影片中。反派虚拟角色也许不像正面角色那样深入人心，受到观众的追捧，甚至会被观众所唾弃、反感、厌恶等，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观看后就会被遗忘的反派虚拟角色往往是使得正面角色成功的主要条件，当我们仔细推敲反派角色存在的意义时，会发现，反派虚拟角色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14]。这种魅力不仅仅是构成影片发展的元素，更主要的特点是，在观影之后，反派虚拟角色带给我们的启发和认识。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解读反派虚拟角色带给我们的启发。其一，美国影视作品中反派虚拟角色的存在，他可以不仅仅只

是作为一个表演角色,更可能是通过虚拟的反派人物来隐射社会上现实存在的人物身上的瑕疵^[15]。亦或是正派角色的黑暗写照,虽然在影片中是正反两方的对抗,但是为何不可以理解为正派角色在和自己的黑暗一面作斗争,打败反方也就意味着战胜自己,反之亦然。

参考文献:

- [1] 汪少明,程曦.中国影视虚拟角色创作初探[J].传媒,2018,(18):49-51.
- [2] 廖亚明.动画电影反派角色的塑造研究[D].导师:丁粤红.赣南师范学院,2014.
- [3] 朱帅.《指环王》系列影片角色形象建构研究[D].导师:张新英.山东师范大学,2020.
- [4] 朱晓萍.《毒液·致命守护者》:小人物逆袭与英雄拯救[J].电影文学,2019,(03):140-142.
- [5] 宫麒康.论郁达夫小说的叙事艺术[D].导师:周海波.青岛大学,2022.
- [6] 张彩云.美国电影中反派人物形象研究[J].电影文学,2018,(08):31-33.
- [7] 孟婷,安琦.美国社会现实的真实缩影——影片《疯狂动物城》中的现实隐喻解读[J].长江小说鉴赏,2024,(18):96-99.
- [8] 王庆鹏,谢竞贤.《疯狂动物城》中身份构建的人际语法隐喻探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7,(06):50-52.
- [9] 黄曦.《疯狂动物城》中的身份构建及政治隐喻[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7,(03):153-155.
- [10] 姚亚倩.《哈利·波特》系列中的视觉艺术与文化符号[J].青年文学家,2024,(36):130-132.
- [11] 黄睿姝.动画作品中反派角色塑造[D].导师:邹毅.湖南师范大学,2016.
- [12] 刘明.皮克斯动画电影中反派角色的塑造研究[D].导师:萧萍.上海师范大学,2021.
- [13] 熊巍.论杰拉斯对马克思“人性”概念的解读——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为中心[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3):22-31.
- [14] 郭芬.论美国动画电影中的反派形象[J].电影文学,2017,(20):104-106.
- [15] 余森,吴琼.中美动画电影中反派角色塑造比较研究[J].电影评介,2016,(07):95-97.

夜灯输液报警器的研究设计与应用

崔子聪¹, 孙仪航^{1*}, 马照涵¹

(¹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医学技术学院,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165000)

摘要: 目的通过研究设计一种输液报警器并探讨应用前景, 以解决临床中患者输液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提高输液过程的安全性和效率。方法采用现代电子技术和传感器技术, 设计一种能够实时监测输液速度、剩余液体量以及输液结束自动报警的输液报警器。结果该输液报警器具有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报警准确等优点, 能够有效避免输液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结论 本研究设计的输液报警器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值得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输液报警器; 静脉输液

Research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infusion alarm

CUI Zicong¹, SUN Yihang^{1*}, MA Zhaohan¹

(¹ Daxing' anling Vocational College, Medical Technology College, Daxing' anling Region, Heilongjiang Province, 165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ign an infusion alarm and explore its application prospect to solve th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in the clinical infusion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safe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infusion process. Methods Using modern electronic technology and sensor technology, an infusion alarm was designed that could monitor the infusion speed, the amount of remaining liquid and the automatic alarm at the end of infusion in real time. Results The infusion alarm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structure, convenient operation and accurate alarm, 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in the infusion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s. Conclusion The infusion alarm designed in this study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and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Infusion alarm; Intravenous fluids

引言

医疗行业快速发展, 病人护理和监测需求增长, 输液作为常见治疗手段, 需密切监测药物流速、滴数及患者反应, 以确保治疗有效性与安全性。目前输液监测主要依赖人工巡视与简单基础设施。人工巡视存在时效性不足、难以长时间保持警觉的问题, 无法满足实时性与准确性要求。现有基础设施如输液泵虽能实时监测流速和滴数, 但缺乏报警功能, 难以及时提醒医护人员处理异常情况^[1]。因此, 开发具有实时报警功能的夜灯输液报警器十分必要, 该设备应具备实时监测输液流速、滴数及患者反应, 异常时报警, 并带有夜灯功能以便夜间观察输液情况等功能, 以保障输液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提高患者康复效果^[2]。

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20 -

基金项目: 无

作者简介: 崔子聪 (2005-), 男, 黑龙江大兴安岭, 大专, 研究方向: 护理

马照涵 (2006-), 女, 黑龙江大兴安岭, 大专, 研究方向: 护理

通讯作者: 孙仪航, 邮箱: syh679399@163.com

1.1. 提高输液安全性

夜间或光线昏暗时，传统输液设备难以准确观察输液情况，易致药物滴空、流速异常等问题。夜灯输液报警器引入先进传感和通信技术，能实时监测输液情况，异常时及时报警提醒医护人员，显著提高输液过程安全性，减少因疏忽导致的意外^[3]。

1.2. 提升医疗效率和服务质量

夜灯输液报警器实时监测输液情况，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提高医疗效率和服务质量，满足患者对高品质医疗服务的需求，提升医院竞争力和影响力。

1.3. 推动医疗技术创新和发展

本研究旨在通过引入先进传感和通信技术，实现输液过程的智能化监测和远程监控，推动医疗技术创新和发展，为医疗行业带来机遇和挑战^[4]。

2. 工作原理及技术特点

2.1. 夜灯输液报警器工作原理

夜灯输液报警器作为医疗设备关键组件，其工作原理及技术应用对确保输液过程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可从核心组件构成、技术实现方式、可持续发展设计三个维度剖析。

核心组件构成，通常包括红外发射器、接收器、蜂鸣器、LED 指示灯、单片机、滴速设置按钮及电源开关等，精心设计与选型为设备提供坚实硬件基础。

技术实现，采用红外传感器技术，监测输液管中液体流动情况触发报警机制。液体流动时，红外传感器检测输液管中红外线变化并转化为电信号判断液体是否流动，检测到液体流动停止或异常时立即触发报警，发出声音和光线信号提醒医护人员，提高报警准确性和及时性^[5]。

可持续发展设计，采用低功耗、长寿命设计理念，优化电路设计和采用环保材料降低能耗和环境污染，具备可重复使用性，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6]。



图 1 夜灯输液报警器整体结构示例

2.2. 技术特点与优势分析

精准监测，具备精准监测能力，通过内置先进传感器实时、准确检测输液管中液体流动情况，提高输液过程安全性，出现气泡、阻塞或异常流动时立即报警，避免输液事故发生。

多种报警方式，具备声音报警、光线报警等多种方式，吸引医护人员注意，提高报警效果，还具备自动复位功能，液体流动恢复正常时自动停止报警。

简单易用，设计简单易用，界面简洁直观，操作按钮清晰明了，医护人员可快速上手，体积小、重量轻，可随身携带，适用于不同场景，提高实用性，降低操作难度^[7]。

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可广泛应用于医院、护理院、家庭护理等领域，在医疗机构中用于患者输液护理，在家庭护理场景中用于家庭护理人员输液监测，提高家庭护理安全性和有效性^[8]。

3. 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3.1.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及对策

在夜灯输液报警器领域，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矛盾：首先，关键技术存在短板，核心传感元件的精度不足以及智能报警算法的可靠性低，这导致了产品性能的升级滞后；其次，研发协同存在断层，企业研发活动主要集中在短期改良上，缺乏与医学临床研究的深度整合；最后，人才供给失衡，具备医疗电子知识与应用开发能力的复合型工程师比例不足。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对于关键技术短板，积极与科研机构展开合作，加大对核心传感元件精度提升以及智能报警算法优化的研究投入，设立专项研发基金，鼓励创新思维，力求突破技术瓶颈。针对研发协同断层问题，建立企业与医学临床研究机构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组织联合研讨会，共同确定研发方向，确保产品研发紧密贴合临床实际需求。在人才供给失衡方面，一方面与高校相关专业合作，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设置医疗电子与应用开发相关课程，为企业输送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搭建培训平台，对现有工程师进行跨学科知识培训，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3.2. 标准不统一问题及对策

行业标准的缺失已成为制约夜灯输液报警器行业发展的关键障碍。技术标准的不明确导致企业在研发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指导原则，而质量标准的不明确则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难以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标准化建设的缓慢进展，主要受到技术积累不足、市场需求的不稳定性以及政策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使得标准统一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对此，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联合行业内龙头企业、科研机构以及相关专家，共同开展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首先，对现有的技术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和评估，结合市场实际需求，确定科学合理的技术指标和规范。其次，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测体系，明确产品质量的量化标准，通过定期抽检和认证等方式，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标准生产，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为加快标准化建设进程，政府可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以提升技术积累水平，增强行业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为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此外，还需加强政策引导，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推动行业标准统一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4. 智能化、精准化发展方向

智能化设计，智能化是夜灯输液报警器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融合应用，正逐步从单一报警功能向智能监测与管理转变。嵌入智能芯片和传感器，实时监测输液进度、液体温度等关键参数，通过 APP 或显示屏展示给用户，提高用户输液体验，为医疗机构提供精准输液管理手段，还可实现对输液安全的远程监控，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精准化控制，采用先进算法和传感器技术，实现对输液速度的精准控制。实时监测患者输液情况，根据医嘱和患者实际情况自动调整输液速度，避免安全问题，提高输液安全性、医疗机构工作效率和患者满意度^[9]。

4.1.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集成应用

物联网技术，实现设备互联互通，为医疗人员提供便捷、高效的监控和管理手段。可远程监控和调节输液设备，确保输液过程准确性和安全性，实时收集设备使用数据，为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支持^[10]。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算法，实现对输液异常情况的智能识别并自动采取应对措施，降低医疗风险，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如智能识别输液管道堵塞或渗漏时自动发出警报并停止输液，还能对设备性能进行实时监测，确保设备稳定运行^[11]。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将进一步扩大夜灯输液报警器的性能和应用范围^[12]。

4.2. 远程监控、数据记录与分析功能实现

远程监控，通过先进传感器和通信技术，实时监测患者输液情况，将数据实时传输到医护人员

员手机或电脑终端,使医护人员能随时随地关注患者输液进度和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风险,还支持医护人员为患者提供实时指导和干预,确保输液过程安全顺利进行^[13]。

数据记录与分析,详细记录患者输液数据,包括输液进度、液体温度、输液速度等关键指标,经分析处理后为医护人员提供客观、准确的输液效果评估,有助于制定更优化治疗方案,提高医疗质量和患者满意度^[14]。

5. 结论

夜灯输液报警器通过其独特的工作原理和技术特点,在提高输液安全性、提升医疗效率与服务质量以及推动医疗技术创新发展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价值。尽管在发展进程中遭遇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标准不统一等挑战,但通过采取有效对策使得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而智能化、精准化的发展方向,尤其是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集成应用以及远程监控、数据记录与分析功能的实现,更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预见,夜灯输液报警器将在医疗领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患者带来更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验。

参考文献:

- [1] 谭敏,杨波,张娜.外周输注胺碘酮致化学性静脉炎的预防研究进展[J].中国当代医药,2025,32(06):193-198.
- [2] 徐风忠,陈桂涛.输液报警器的研制及临床护理应用效果[J].医疗装备,2023,36(04):17-19+27.
- [3] 程敏,向晓漫,王耶欣,等.输液报警器的临床研究进展[J].中国医药指南,2022,20(17):62-65.DOI:10.15912/j.cnki.gocm.2022.17.007.
- [4] 李铭洋.基于 5G 通信技术的医用终端设计与实现[D].电子科技大学,2022.DOI:10.27005/d.cnki.gdzku.2022.04255.
- [5] 麦毅源,吴伟斌,史晓裕,等.一种新型输液报警器[J].医疗装备,2015,28(18):48.
- [6] 曾鑫,梁希瑶,周莹.基于液位监测的智能输液报警系统设计与应用[J].医药高职教育与现代护理,2022,5(03):262-266.
- [7] 黄凤霞,苏媛媛,赵倩,等.输液报警器的进展分析[J].科技视界,2019,(01):46-48.DOI:10.19694/j.cnki.issn2095-2457.2019.01.018.
- [8] 余路,温高钱.一种静脉输液报警器的研究与开发[J].黑龙江科学,2022,13(04):62-63.
- [9] 王学建.双位红外感应输液及报警装置临床应用满意度调查[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6,16(A2):180+182.
- [10] 牛青松,吕花会,杜准,等.基于医疗设备物联网技术的康复信息个性化服务平台构建及其应用价值研究[J].中国医学装备,2025,22(04):111-116.
- [11] 林文杰.检测医用输液泵、注射泵应注意的事项[J].品牌与标准化,2016,(02):60-61.
- [12] 欧阳威,钟冬秀,罗峰,等.弹套莫非氏滴壶式微型智能输液报警器在静脉输液中的应用观察[J].赣南医学院学报,2021,41(10):1040-1042.
- [13] 张育铭.数字技术赋能中医诊疗慢性病的临床实践与创新路径探究[C]//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关爱生命大讲堂之生命关怀与智慧康养系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肿瘤患者全流程营养护理实践专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北京融科医院,2025:213-214.DOI:10.26914/c.cnkihy.2025.002944.
- [14] 李梦格,郝雪涵,刘梦绮,等.移动健康在妊娠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J].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2024,32(07):1525-1528.DOI:10.13404/j.cnki.cjbhh.2024.07.012.

史铁生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4——2022 年）艺术特色研究文献综述

陈乃文^{1*}，潘炜婷¹，黄思哲¹，朱悠然¹

(¹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建 福州 350202)

摘要：自 1984 年至 2022 年，研究史铁生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学术期刊论文共 46 篇、学位论文 13 篇，笔者从中挑选出 30 篇进行文献分析，通过对小说的细致阅读和前人期刊论文的研析，就艺术特色方面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进行了文献综述的工作，主要从前人期刊论文对该篇小说艺术特色研究的热点、焦点、弱点、盲点出发，进一步研究该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叙事特色；语言风格；地方色彩；情节叙述；人物塑造；意象描写

A Literature Review of Shi Tiesheng's Novel My Distant Qingping Bay (1984-2022)

Naiwen Chen^{1*}, Weiting Pan¹, Sizhe Huang¹, Youran Zhu¹

(¹ Fuzho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Trade, Fuzhou, Fujian, 350202, China)

Abstract: From 1984 to 2022, there were 46 academic journal papers and 13 dissertations on Shi Tiesheng's novel My Distant Qingping Bay, from which the author selected 30 for literature analysis. Further study of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novel.

Keyword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language style; local color; plot narration; character building; image description

引言

前人发表的期刊论文主要围绕叙事特色、语言风格、情节叙述、人物塑造、意象描写等艺术特色问题展开研究，其中以研究叙事特色和语言风格的论文为主，叙事特色方面分别从叙事角度、叙事方式、叙事技巧和叙事安排等方面进行展开探讨，语言风格则从小说的音乐性切入，深入探究了地方色彩、写作笔调以及句式、选词等方面的问题，其次是对情节叙述相关内容进行谈论，最后分析人物塑造和意象描写的论文占比较少。

1. 小说叙事特色

1.1. 叙事结构

小说中史铁生看似散乱无章、随心所欲，实则精耕细作、工于构思的散文化叙事结构使得《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叙事，而成为一种真情的自然流露，一种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让你“总是来不及做什么逻辑推理，就立刻被那深厚的情感所打动，觉得人间真是美好，苦难归苦难，深情既在，人类就有力量在这个星球上耕耘”^[1]。

1.1.1. 主副线交织

对于小说的叙事结构,张在中以为:“如果我们把这首歌看作是破老汉故事的主旋律,它表现了破老汉为代表的底层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2-1]。那么‘我’插队的经历——小说的副线——也响着另外一支‘旋律’。”即小说以破老汉的故事为主线,以“我”插队的故事为副线,交织展开,表达了作者对破老汉和对插队时的生活的深深怀念。

1.1.2. “代父”的叙事功能

黄河提出:“破老汉是替代性父亲,具有‘代父’叙事功能。”因没给大夫多送些礼(十来斤米或面),耽误了儿子的病,儿子惨死。这也造成了他父亲职场的空缺^[3-1]。“我”这个北京来的远离亲人的心儿(孩子)地到来,使老汉再次做起了精神上的父亲:冬天半夜里替我拌二次料,好让“我”多睡一会;那年“我”两腿萎缩住进医院后,他特意捎来了十斤粮票,以便“我”治病时用,通过“我”补做父亲的责任。他对救了全村人的老黑牛的怜惜与老黑牛对占了自己床位的牛不老的怜惜构成一种互喻,在文中应不是闲笔。然而史铁生的高明之处在于让破老汉的父职在那个年代特有的全国粮油票证管理政策下,再次在功用层面缺失(陕西的地方粮票在北京不能流通)。

1.1.3. 复调音乐中赋格曲

牛颖借用音乐专业术语指出:“小说采用了复调音乐中赋格曲的叙事结构”^[4-1]。

1.2. 叙述方式——自然而然

根据牛颖关于小说叙事结构——赋格曲的观点,从小说开篇一直到第32段的内容里,作者没有去遵循传统的叙事脉络,而是用自由流畅的方式表达对小说主题全面理解,在这个表达过程中作者没设定固定情节发展线索,而是让我的回忆于清平湾村民、山水还有牛儿间自由穿梭,这些回忆呈现出碎片化且多样的特点,从老到小、从山到水、从牛儿到人们都被我深情回忆与描述,其中偶尔会穿插队长、亮亮妈等角色相关故事,但这些故事都显得平凡又琐碎,不存在强烈冲突和高潮部分,这样的叙事方式让整部小说笔调显得温馨又自然,读者好似能随我回忆亲身感受清平湾宁静与和谐,这种淡化情节的叙事特点是复调小说典型表现,它不仅让小说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与多元,还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更多自由和想象空间^[4-2]。

与此观点不谋而合,在此之前,朱庭婷认为,这部小说从开头到结尾都没按传统故事叙述顺序来,也没设置那种特别明显的情节高潮和低谷,作者展现出来的只是对自己往昔在清平湾生活的片段回忆,这些回忆并非经过刻意编排且没有明显情节线索,就像水流一样自然而然地在作者笔下流淌,跟着作者意识流动化作文字,整部小说里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构建都极为自然,好像这些人和事真就在读者眼前发生,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叙述方式不但赋予小说极高艺术价值,还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作者深深的怀旧之情^[5-1]。

1.3. 叙事角度——第一人称

洪丽霁指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部作品用了典型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手法,全文借叙述者“我”的视角细致入微展现知青插队生活各方面,让读者能身临其境地感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氛围,还能体会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轨迹,在作品结尾作者运用“十年过去了”这一时间标记,既给整个叙事画上了句点又凸显知青岁月已成历史记忆深刻主题^[6-1]。

1.4. 叙事技巧——移步换形法

黄河提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部小说达成了描写主体的独特转变,它把关注的重点从普通的道德评判转到农民实际生活的情感体验,通过深度刻画农民在严酷生活里展现出的豁达态度与生存耐力,小说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平民姿态,这在知青文学当中实属少见,作者并非只停留在对农民生活的表面描绘层面,而是深入农民的情感世界去感受他们所历经的各类磨难与艰辛,这种情感上的贴近和体验让小说里的农民形象更为鲜活、立体,也更易引发读者的共鸣^[3-2]。

1.5. 叙事安排——回忆

梁鸿以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文坛“知青寻根”文学思潮的一个回应。

作者用极其优美、淡远的笔调回忆自己在插队时生活过的清平湾”^[7]。

洪丽霁提到小说开头，作者在提及对北方黄牛的熟悉之后，便引入了自己插队时的经历：“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这句话既为读者清晰揭示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又预示接下来要展开插队生活的追忆性叙述^[6-2]。

在回忆当中主人公详细描绘清平湾自然风光，还展现村民们平淡且真实的日常生活，更通过诸多细节呈现出与当地人民深厚情感，这些回忆不仅包含喂牛劳动交往等各个方面，还渗透着对那段生活独特感悟与未来憧憬，小说里的回忆并非只是简单的时间回溯过程，而是一种情感沉淀和逐步升华的体现，通过对过去进行反思和全面深入的回顾，主人公不但找到了生活真谛还理解人生意义。

1.6. 叙事基调——清平调

黄河以为：小说叙事基调带着淡淡且苦涩的感觉名为清平调，《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叙事基调存在不同之处，这里的“遥远”是相对于城市中心而言等同于偏僻荒远，“清平”意思是等同于清贫平淡的状态，“湾”则是乡村具有代表性的代名词^[3-3]。

2. 小说语言风格

2.1. 地方色彩

2.1.1. 地方方言

张俊丽认为，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面，叙述语言跟人物对话都弥漫着很浓的陕北乡土气息，陕北方言的使用到处都能见到，这不但增强了小说的地域特色，还为作品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整篇小说就像黄土高原上那连绵起伏的峁梁以及纵横交错的沟壑，把陕北地区的自然风貌给展现了出来，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如同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乡亲父老那样，质朴且浑厚，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土地的眷恋，这种质朴的情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让整篇小说散发出清新的泥土气息，使读者好像置身于那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陕北乡村世界^[8]。

2.1.2. 地方民歌、地方人

对文本做深入分析后发现，作品用艺术化手法展现社会底层群体坚韧品格与积极向上生活态度，这种精神特质在陕北民间音乐文化当中得到充分彰显，陕北民歌以独特语言风格、悠长旋律线条和真挚情感表达为主要艺术特征，和小说蕴含思想内涵形成高度契合，所以成为文本创作重要艺术资源，在篇幅达 11000 字的叙事文本里，作者通过 11 处陕北民歌的有机穿插，不但强化作品情感张力，还提升整体艺术表现力，这些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歌元素，既丰富文本文化内涵，又借独特音乐语言传递创作者对普通民众生存状态深切关注与人文思考^[2-2]。

易秀芳认为尽管陕北人民在苦难中生活了许多世代，这些人物形象充分展现出非凡精神韧性来应对生活困境，《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的破老汉就是典型代表人物，作为革命战争时期参与广州战役的一名老战士，他最终选择回归那片贫瘠的陕北故土，他的人生智慧与丰富情感体验借助信天游这一陕北民间艺术形式呈现，既流露出对残酷命运的不屈抗争，又蕴含着发人深省的生命哲思，史铁生通过塑造破老汉等一系列农民形象，深刻揭示底层民众质朴善良情感特质与坚韧顽强生存意志，这种精神特质不但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更承载着独特生命价值观与生存哲学^[9]。

2.2. 音乐特色——富有节奏感

王蒙在论及该小说时这样写道：“《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小说，更是优美的抒情散文，是诗、是涓涓的流水、是醇酒、是信天游、是质朴而又迷人的梦”、“是真正的天籁”、“是一首灼人的情歌”^[10]。

张在中提到：“作者很巧妙地穿插十多首陕北民歌，这些歌曲给小说定下舒缓忧伤浑厚悠长的调子，为和这种音乐性的调子相协调，作者写作过程中做了精心的艺术调度”^[2-3]。在语言表达层面研究者发现，该作品大量采用有陕北地域特色的方言词汇，还配合富有抒情性的句法结构，以此实现和民间歌谣情感内涵有机统一，从文本结构方面来看，创作者巧妙运用长短句交替整散

句结合的修辞手法，既增强叙事的韵律感又深刻展现陕北独特人文风貌，值得关注的是在环境描写这方面，作者用精湛写实手法把陕北自然景观乡村图景及人物内心世界细腻刻画，和民歌抒情特质形成艺术共鸣构建出有地域特色审美意境。

2.3. 写作笔调

朱庭婷、易娟都认为，史铁生的文学创作展现出独特的语言艺术方面特征，他的行文风格以含蓄内敛、逻辑严谨且富有诗意而见长，和直白张扬的表达方式相比较，作者更愿意采用平实克制的叙述手法去创作，在这种看似朴素的文字背后，常常蕴含着深邃的哲思与敏锐的洞察力，他的散文作品依靠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和整散句式的有机融合，构建出富有韵律美感的语言结构，在代表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当中，作者运用简约质朴的叙述方式，用平和从容的笔触去描绘历史变迁，营造出自然天成的艺术效果，这种返璞归真的语言风格既彰显了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又折射出其对生命本质的独特体悟，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境界^[5-2,11]。

3. 小说情节叙述

3.1. 情节淡化、散文化、诗化

在前人研究论文中谈及情节几乎都讲到了情节的淡化、散文化、诗化。

其中张胜冰认为，这个作品明显呈现出诗意氛围、弱化叙事冲突以及散文式表达的特征，它的审美内核实现了从外部形式感知到内在体验的深度转变，在这个审美转换的过程当中，个体情感与主观感受成了核心要素，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给读者创造了新颖且深刻的审美体验，还引导读者超越表象形式去触及作品内在的精神意蕴，创作者凭借这种审美表达方式，既彰显出对艺术体验的独到见解，又提升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12-1]。

而北帆以为，本研究经过对文本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运用了平实自然的散文体叙事手法，其艺术特征主要体现于以下这些方面，在表达方式上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刻意去营造戏剧性情节，而是借助细腻入微的细节描写来展现情感世界，这种叙事策略和作家前期的创作实践相比，具备更为深刻的美学内涵^[13]。从文体特征角度来看，该作品呈现出典型的散文化小说特质，其放射状叙事结构不但赋予了文本多重解读的可能性，还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叙事视角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不过，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一具体文本当中，作家对放射状结构的艺术把控存在不足情况，具体表现为，其一，表层意识流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其二，缺少具有统摄力的核心思想作为叙事支撑。这一创作局限既反映出作家哲学思考的深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整体性和思想深度。

3.2. 前后呼应

牛颖指出，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部作品里，作者很巧妙地选取《崖畔上开花》民歌首句，将其分别放在小说开头与结尾的位置，达成了结构上的呼应效果，还借助对比手法深化了作品主题，小说起始阶段，破老汉于崖畔的余晖当中唱着那悠长的曲调，既展现出陕北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同时也揭示出他们贫困的生活状况，等到这段山歌在小说结尾再度响起的时候，情境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老汉所唱的不再是崖畔上的残阳，而是盛开在崖畔的山丹丹花，此处所谓的“好光景”已经从人们的期盼变成了眼前红彤彤的现实，这种简单的叙述方式很巧妙地交代了小说主题，展现出陕北农民生活的巨大转变^[14-3]。

3.3. 反复

张在中提出：“《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支信天游在小说里前后三次出现，分别位于小说的开端、中间和结尾部分。‘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的旋律回荡全篇，表现了陕北人民艰难岁月里的高尚情操”^[12]。小说借助这首歌表达出他们对幸福生活热切向往与追求，这种情感表达并非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是通过音乐旋律和歌词深入人心，让读者能更深刻感受小说传达的情感 and 价值观。

4. 小说人物塑造

张胜冰点明,人物描写呈现出一种非典型化的趋势^[12-2]。这种艺术处理方式更加注重捕捉生活中的“原型”和“原态”,追求的是真实而深刻的艺术表达,而非简单地复制或描摹生活。非典型化的人物描写并不局限于刻画个别典型的角色,而是采用“全方位”的观照和“全景式”的扫描来构建整个形象体系,呈现出一种众生相。

陈佳提到,作者很巧妙地用一个“破”字揭示破老汉经济状况,采用白描手法描述破老汉“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等外貌特征,简洁生动勾勒出贫穷沧桑却乐观的老者形象,破老汉的“破嗓子”成其形象点睛之笔突显出他生活经历和个人特色,除运用“破”字之外作者还反复描写破老汉标志性动作抽烟以及爱唱歌特点来丰富人物形象^[14]。

5. 小说的意象描写

朱庭婷指出,本研究文本里总共六次对牛类形象做了细致描绘,其中老黑牛这个典型形象显得尤为突出,老黑牛这一形象在遭遇生存困境的时候表现出非凡勇气与坚韧特质,展现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态度,并且该形象对弱势群体表现出了较强的保护意识,对竞争失利也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这种动物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性范畴,引发读者深刻思考与由衷敬意^[5-3]。

严志蓉认为,在文本分析当中研究者通过对比叙事手法展现情感认知转变过程,初始阶段叙述者对老黑牛持有负面评价觉得它有老谋深算特性,它能精准辨别野草与农作物还会伺机寻找机会去偷食庄稼,随着叙事不断推进叙述视角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开始认同老黑牛作为群体领袖所展现出来的顽强品质,该形象在生死考验面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英勇气概,它对同类怀有深厚情感即便角力失败后也能保持尊严,值得关注的是老黑牛与白老汉这两个形象形成互文参照,二者都以暮年之躯彰显出刚毅不屈的强大生命力,其倔强性格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温厚的人文关怀^[15]。

前期刊论文聚焦该篇小说艺术特色的热点是叙事特色和语言风格,他们花大量笔墨研究这两部分且研究成果比较完善,不过该篇小说情节淡化和情节散文化这一特色成了研究焦点,有人觉得这样好,也有人认为这样不好,笔者认为前期刊论文对该篇小说艺术特色研究存在弱点,一是在小说写作风格方面,很多人提出模棱两可观点却未明确深入分析,二是在小说人物塑造上,多数研究者仅做表面研究而未深入探究,对该篇小说艺术特色研究的盲点在于小说的环境描写,前人研究论文里几乎没人对其进行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小说的艺术特色,笔者将从小说研究的盲点入手,主攻小说的环境描写这一方向,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个角度展开进行探究。

参考文献:

- [1] 史铁生. 回首黄土地[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 [2] 张在中. 小说如何获得音乐性——以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为例[J]. 平原大学学报, 2006, 2006(6): 85-87.
- [3] 黄河. 史铁生小说中知青文本的乡土叙事[J]. 文艺争鸣, 2007, 2007(6): 163-164.
- [4] 牛颖. 论史铁生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音乐性[D]. 吉林大学, 2009.
- [5] 朱庭婷.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艺术特质[J].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005(1 Suppl.): 68-70.
- [6] 洪丽霖. 回忆与对话——《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叙事阐释[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008(2): 79.
- [7] 梁鸿. 史铁生: 残障生存与个体精神旅程的哲理叙述[J]. 北京社会科学, 2003, 2003(2): 113.
- [8] 张俊丽. 史铁生小说语言风格研究[D]. 广州大学, 2012.
- [9] 易秀芳. 情系黄土——知青反思小说之陕北情[J]. 宜春学院学报, 2005, 2005(1 Suppl.): 147.
- [10] 王蒙. 读八三年一些短篇小说随想[J]. 文艺研究, 1984, 1984(3): 43.
- [11] 易娟. 生命意义的执著追索——史铁生作品解读[J]. 中学生百科: 阅读写作, 2006(32): 3.
- [12] 张胜冰. 论近年来小说创作观念及表现形式的变化[J]. 思想战线, 1986, 1986(4): 75-76.
- [13] 北帆. 论史铁生小说的艺术变奏[J]. 小说评论, 1987, 1987(4): 35.
- [14] 陈佳. 如何让笔下的人物活起来——名家笔下的人物写法赏析[J]. 作文新天地(初中版), 2020, 2020(3): 45.
- [15] 严志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形象分析[J]. 文学教育(上), 2021, 2021(11): 27.

毅力特质、成就目标定向与高中生数学学业成绩的关联性研究

吴云东¹, 孔维俭², 吕婷婷^{3*}, 李锦涛⁴

(¹ 韩国东新大学 研究生院, 全罗南道罗州市, 58245; ²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船员培训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³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⁴ 韩国全南国立大学 艺术学院, 光州市东区, 61186)

摘要: 本研究的宗旨在于深入探究毅力、成就目标与高中生数学成绩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 我们特意收集了中国湖北省咸宁市 A 学校 172 名高中生的相关数据, 并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详尽的解析。研究结果显示, 毅力不仅直接对成就目标和数学成绩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且还通过成就目标这一中介因素, 间接地促进了数学成绩的提升。具体而言, 坚持不懈的努力被证实为提升成就目标和数学成绩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毅力; 成就目标; 数学; 高中生

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lience Traits,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nd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Academic Performance

Yundong Wu¹, Weijian Kong², Tingting Lv^{3*}, Jintao Li⁴

(¹ Dongseon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Naju, Jeollanam, 58245, South Korea; ² Quanzhou Ocean Institute, Quanzhou, Fujian, 362000, China; ³ Quanzhou Ocean Institute, Quanzhou, Fujian, 362000, China; ⁴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Gwangju, 61186, South Kore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eply explor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everance, achievement goals,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math grades. For this purpose, we specifically collected relevant data from 172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A School in Xianning City, Hubei Province, China, and use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atifie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conduct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se dat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erseverance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s achievement goals and math grades, but also indirect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math grades through the mediating factor of achievement goals. Specifically, persistent effort has been proven to be a key factor in improving achievement goals and math grades.

Keywords: perseverance; achievement goals; mathematics; high school students

- 29 -

作者简介: 吴云东 (1997-), 男, 湖北咸宁人, 韩国东新大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 教育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教育技术与信息化管理、学生发展与支持服务

孔维俭 (2001-), 男, 福建龙岩人,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学生发展与培养

吕婷婷 (2000-), 女, 福建泉州人, 研究方向: 教育领导力与管理、企业战略管理

李锦涛 (2000-), 男, 湖南郴州人, 研究方向: 艺术教育实践、学生艺术素养培养

通讯作者: 吕婷婷, ethanwu0525@gmail.com

引言

智力和人格特征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影响学业与工作成就的重要因素。然而,近年来,毅力这一特质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根据 Duckworth 等人(2007)的定义,毅力是一种性格层面的特质,它体现了对长期目标的坚定追求与热情^[1-1]。Christensen、Knezek(2014)进一步阐释,毅力即“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一特质包含两个核心方面:一是“坚持不懈”,指的是能够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完成长期任务;二是“兴趣的一致性”,强调的是长期坚守并追求个人目标的能力^[2]。简而言之,毅力是连接个人持续努力与长期目标实现的桥梁。

关于毅力的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毅力与学业及工作成就之间的内在联系,Kern(2017)的研究揭示,毅力是推动成就的关键因素^[3]。具体而言,他们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智商和大五人格特质,毅力对于成就方差的解释力度更强,确立了毅力作为促进学业与工作成就的重要变量地位。进一步地,在毅力的构成维度中,Duckworth 等人的研究以及 Brandstätter 和 Bernecker(2022)的探讨均明确指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对于成就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1-2,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毅力对学业成就影响的研究实践中,存在方法论上的挑战。Wolters 和 Hussain(2015)指出,许多研究依赖于受试者自我报告的学业成就,这引发了关于学业成绩衡量有效性的质疑^[5]。这种自我报告的方式可能受限于主观因素,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近年来,学术界对毅力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其对成就的直接影响,进一步探讨了毅力与影响学业成就之间的相互作用^[6,7]。尽管已有研究揭示了毅力对动机的影响以及动机对毅力的反作用^[8,9],但这些研究结果之间的一致性却存在疑问。换言之,不同研究得出的关于毅力与动机之间相互关系的结论并不总是相互吻合,这提示我们在理解这一复杂关系时仍需谨慎,并期待未来研究能够进一步澄清和统一这些发现。

鉴于上述背景,本研究致力于探讨毅力与动机之间如何影响数学学业成绩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过往关于毅力与成就的研究中,鲜有聚焦于数学学业成绩这一具体领域的。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入剖析毅力、动机与数学学业成绩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数学教育领域提供有价值的见解与指导。此外,针对先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学业成绩衡量有效性问题,本研究采取了更为严谨的方法,即利用标准化的数学测试分数作为学业成绩的衡量标准,以期提升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另外,本研究还将成就目标纳入为关键的动机变量进行研究。根据教育心理学和有关于数学教育的研究显示,成就目标在促进或阻碍数学学习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视其为数学教育领域内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10,11]。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国内外已有研究将成就目标作为动机变量来探讨其与毅力的关系,但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鉴于此,本研究鉴于成就目标在数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研究的稀缺性,特地将成就目标作为动机变量加以考察。成就目标理论中常涉及三个核心变量,分别是“熟练目标”、“接近目标”以及“避免完成目标”。具体而言,“熟练目标”侧重于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接近完成目标”则是以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学习能力为学习动力,追求得到认可与肯定;而“避免完成目标”则是一种以防卫心态为导向的学习目标,旨在避免在学习过程中暴露出自己的不足与无能^[12]。

1. 研究目标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深入而全面地阐明毅力、成就目标与数学学业成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我们旨在探讨毅力这一性格特质如何影响学生的数学学习动力,以及不同类型的成就目标(包括熟练目标、接近完成目标和避免完成目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通过综合分析这些因素,我们期望能够为理解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提供新的视角,进而为数学教育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湖北省咸宁市 A 学校的 172 名高中一年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据官方参考资料显示,A 学校不仅在咸宁市内名列前茅,位列综合实力前十,而且在中国湖北省的学校综合排名中也位居前 100 名之内,显示出其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学术实力。

2.2. 研究工具

2.2.1. 毅力量表

本研究采用了 Nishikawa 等人 (2022) 所开发的 Short Grit Scale 作为测量工具^[13]。该量表的项包含了“我是一个勤奋的人”、“即使我对某件事很着迷，但一段时间后我也会很快感到厌倦”等 8 个问题。

2.2.2. 数学学习成就目标量表

本研究参考了 Wu Jia 和 Fu Hailun (2024) 所使用的成就目标量表^[14]，数学学习成就目标量表包含 9 个项目，这些项目被细分为三类：熟练目标、接近目标和避免目标，每类各含 3 个项目。例如，熟练目标包含“我渴望深化对数学知识的理解”等 3 个项目；接近目标包含“我致力于超越他人，在数学上取得更优异的成绩”等 3 个项目；避免目标包含“我之所以学习数学，是因为我不喜欢它，但我想避免在这个领域落后”等 3 个项目。这些项目旨在全面评估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不同成就动机取向。参与者对这些项目的回答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从 5（我完全这么认为）到 1（我完全不这么认为）进行评分。

2.2.3. 数学成绩

由于以往的许多研究中存在的自我报告成绩可能带来的偏差问题，本研究采取了更为客观的数学成绩评估方式。具体而言，数学成绩并非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而是在问卷调查进行一周之后，通过 A 学校的正规定期测试来获取的。这些测试的成绩范围设定在 0 到 100 分之间，确保了成绩评估的标准化和可比性。测试分数以及参与测试的学生出勤情况均由 A 学校的教师直接提供，从而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3. 研究程序

在得到 A 学校老师的同意后，2024 年 12 月，利用 A 学校数学课的时间段，进行了问卷调查。整个过程由包括问卷的发放、解释问卷目的、解答疑惑以及回收，总耗时大约 30 分钟。在调查期间，向参与者明确说明，问卷的回答内容绝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且所有个人信息都将得到严格保密，以此确保受试者的隐私安全。

3. 研究结果

对问卷答案进行了筛选后，剔除了其中的不合格的数据，得到有效答案共计 166 份，缺失率为 3.5%。随后，我们采用 SPSS 进行了统计分析。表 1 详细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以及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兴趣一致性与持久努力的相关系数较小 ($r=-.04$)，表明兴趣一致性具有不同于持久努力的特质，因此我们决定在分析中保留该变量。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和相关系数

	Mean	SD	(1)	(2)	(3)	(4)	(5)
(1)持之以恒的努力	2.59	0.76					
(2)利益的一致性	3.36	0.69	-0.04				
(3)熟练目标	3.14	0.91	0.46	0.07			
(4)完成接近目标	3.30	0.86	0.27	0.24	0.48		
(5)执行回避目标	3.13	1.02	0.30	0.18	0.32	0.76	
(6)数学成绩	48.84	21.66	0.26	0.01	0.30	0.16	0.11

进一步地，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成就目标、毅力与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基于 Mohd 等人 (2011) 的研究，毅力和成就目标对于提升数学学业成绩具有积极作用^[15]。此外，考虑到人格特征通常被视为成就目标的先导因素^[16]，我们假设毅力能够促进成就目标的实现。为了验证这些假设，本研究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旨在明确成就目标、毅力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数学成绩。本研究探究了毅力与数学成绩之间的关联性。同时，鉴于在不考虑成就目标这一变量的前提下，探讨毅力对数学成绩直接影响的必要性以及样本规模的实际情况，我

们选择了分层多元回归分析作为研究方法。

表 2 以实现目标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熟练目标	执行接近目标	执行回避目标
	β	β	β
坚持不懈努力	.462 [.332, .592]	.279 [.138, .418]	.308 [.168, .451]
利益一致性	.093 [-.035, .223]	.250 [.112, .389]	.197 [.060, .337]
R^2	.218 [.123, .316]	.138 [.056, .233]	.132 [.052, .225]

注： β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表示 95%置信区间。

首先，本研究实施了多元回归分析，旨在探究毅力对目标达成的影响，以目标达成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的具体数据见表 2。分析结果显示，持续不懈的努力对熟练目标的达成、接近实现目标以及避免实现目标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还发现兴趣的一致性对接近执行目标和回避执行目标具有一定的促进效果。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成就目标与毅力如何共同作用于数学成绩，本研究进行了分层多元回归分析，以数学成绩为因变量的分层多元回归分析的具体数据见表 3。分析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仅将毅力作为自变量；第二步，加入成就目标作为新的自变量，同时保留毅力；第三步，则继续以成就目标和毅力为自变量进行分析。第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坚持不懈的努力能够显著提升数学成绩，而兴趣的一致性在数学成绩方面并未显示出显著影响。第二步的结果揭示了熟练目标对数学成绩的正面促进作用，而接近目标和回避目标则对数学成绩没有显著影响。至于第三步的分析结果，我们观察到坚持不懈的努力与熟练目标均对数学成绩有积极影响，这意味着毅力不仅直接有助于数学成绩的提升，而且通过熟练目标这一路径间接地促进了数学成绩的提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三步的描述中，关于兴趣一致性、成就接近目标和成就回避目标对数学成绩的具体影响，由于原文表述上的模糊，我们在此未做进一步展开，以避免误导。

表 3 以数学成绩为因变量的分层多元回归分析

	数学成绩		
	Step1	Step2	Step3
	β	β	β
坚持不懈努力	.266 [.120, .411]		.167 [.005, .332]
利益一致性	.024 [-.120, .169]		.000 [-.146, .146]
熟练目标		.288 [.129, .452]	.215 [.038, .392]
执行接近目标		.022 [-.218, .260]	.047 [-.188, .295]
执行回避目标		.000 [-.218, .224]	-.045 [-.268, .179]
R^2	.077 [.019, .155]	.099 [.033, .184]	.127 [.050, .217]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提到兴趣一致性、成就接近目标和成就回避目标可能对数学成绩有间接的促进影响，但关键在于这些影响并未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即它们并不直接影响数学成绩。然而，从分层回归分析的第 1 步和第 2 步结果来看，结合持续努力与熟练目标的回归系数变化，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持续不懈的努力不仅直接对数学成绩有正面效应，而且还通过促进熟练目标的达成间接提升数学成绩。

4. 讨论与结论

关于毅力与成就目标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的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对所有类型的成就目标均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兴趣的一致性则特别推动了成就接近目标和成就回避目标的发展。这一发现强化了人格特质作为成就目标先决因素的观点，并通过量化分析验证了毅力对成就目标的正向驱动作用。在对比标准化回归系数时，我们发现毅力对成就目标的影响力超越了兴趣的一致性。这一结果与 Kate 等人(2023)的研究发现相吻合，即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动机的强大解释因素^[17]。本研究不仅重申了熟练目标和接近完成目标作为学业成就理想目标的重要性，成就回避目标也应得到关注与促进。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的样本中，成就接近目标与成就回避目标之间存在着强

烈的正相关关系 ($r=.76$), 这揭示了两类间复杂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地, 执行接近目标与执行回避目标在此被视为评估个人能力的执行目标的两个面向, 而非截然对立的概念。据此推测, 毅力不仅激励个体追求执行接近目标, 同样也促进了执行回避目标的达成, 这表明毅力在驱动不同类型的执行目标上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探讨毅力、成就目标与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时, 清晰显现的是, 毅力和成就目标对提升数学成绩具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 研究表明, 坚持不懈的努力与熟练目标能直接推动数学成绩的增长, 并且, 坚持不懈的努力还能通过熟练目标这一中介因素, 间接地促进数学成绩的提升。这一发现与 Waters(2019)观点相呼应,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在数学学习的特定环境中, 首次定量地验证了毅力、成就目标与学业成绩之间的紧密联系^[18]。尽管与数学成绩相关的决定系数处于较低水平, 其范围在 0.077 至 0.127 之间, 表明即使是在较小的效应量下, 毅力等因素依然对学业表现具有显著且可测量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强调, 为了有效提升数学学习的质量和成绩, 特别需要重视并考虑实施旨在增强耐心与努力的干预措施。尽管 Duckworth 等人 (2007) 的研究揭示了毅力具有的长期稳定特性, 暗示了长期干预的必要性^[1-3]。因此, 我们在设计提升毅力的策略时, 必须全面考虑课堂氛围的营造、课堂形式的创新以及学习难题的应对策略, 以期在多维度上促进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毅力发展。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 通过量化分析在数学学科的框架内定量地证明了毅力、成就目标和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先前的数学教育研究已经强调了动机对于学习成效的关键作用, 但毅力这一核心要素却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本研究表明, 毅力, 尤其是坚持不懈的努力, 是驱动学习动机提升数学成绩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丰富了数学教育的理论体系, 有助于高中教师更深入地理解并优化数学教学过程。

尽管本研究分析了毅力、成就目标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 但本研究仍存在局限性。由于本研究的对象仅限于中国湖北省咸宁市 A 学校的学生, 这一特定样本的代表性有限。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拓展样本范围, 纳入更多样化的学生群体, 以验证和深化我们对毅力、成就目标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理解。同时, 也应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学习成效的因素, 如教学方法、家庭背景等, 以构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教育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 [1] Duckworth AL, Peterson C, Matthews MD, et al. Grit: perseverance and passion for long-term goal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92(6): 1087.
- [2] Christensen R, Knezek G. Comparative measures of grit, tenacity and persever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Teaching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4, 8(1): 16-30.
- [3] Kern ML. Perseverance, achievement, and positive education[C]//Future directions in well-being: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2017: 75-79.
- [4] Brandstätter V, Bernecker K. Persistence and disengagement in personal goal pursuit[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22, 73(1): 271-299.
- [5] Wolters CA, Hussain M. Investigating grit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ollege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J]. Metacognition and Learning, 2015, 10: 293-311.
- [6] Chue KL, Lim ML. Optimism and perseverance: Examining interrelations with test anxiet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J].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 2024, 10: 101196.
- [7] Du Haozhen. The influence of non-intelligence factor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D]. Zhejiang: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2022.
- [8] Amin A, Alimni A, Kurniawan DA, et 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religious character, perseverance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J]. Journal of Innovation i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2022, 3(4): 536-547.
- [9] Akin A, Arslan 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s and grit[J]. Egitim ve Bilim, 2014, 39(175).
- [10] Cano F, Berbén ABG. University students' achievement goals and approaches to learning in mathematics[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9, 79(1): 131-153.
- [11] Putwain DW, Symes W, Nicholson LJ, et al. Achievement goals, behavioural engagement, an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A mediational analysis[J].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8,

- 68: 12-19.
- [12] Elliot AJ, McGregor HA. A 2×2 achievement goal framework[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0(3): 501.
- [13] Nishikawa K, Kusumi T, Shirakawa T. The effect of two aspects of grit on developmental change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Findings from a fiv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year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22, 191: 111557.
- [14] Wu Jia, Fu Hailun.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self-efficacy,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rning engagement[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4, 32(7): 1104.
- [15] Mohd N, Mahmood TFP T, Ismail M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2011, 3(3): 49-54.
- [16] Reisz Z, Boudreaux MJ, Ozer DJ.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 prediction of personal goal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3, 55(6): 699-704.
- [17] Xu KM, Cunha-Harvey AR, King RB, et al.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n perseveranc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J].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3, 53(3): 361-379.
- [18] Waters LE, Loton D, Jach HK. Does strength-based parenting predict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erseverance and engagement[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9, 20(4): 1121-1140.

基于 STEAM 教育理念的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价值阐释、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刘泽霖^{1*}, 陈奕辰¹, 王政尧²

(¹河北衡水中学, 河北 衡水 053000; ²衡水中学实验学校, 河北 衡水 053000)

摘要: 聚焦 STEAM 教育理念在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遵循 “价值 — 问题 — 路径” 逻辑展开研究。首先, 阐释 STEAM 教育在知识整合、能力培养与国家战略适配方面的核心价值, 通过跨学科项目学习构建认知网络以实践驱动创新能力发展,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储备人才。继而剖析当前高中阶段实施困境, 包括学科体系割裂导致知识整合不足、实践教学表层化阻碍创新能力培育、评价体系单一化制约人才多元发展。最后, 基于政策协同视角, 提出系统性优化路径: 重构政策导向的跨学科课程体系, 完善政府主导的双师型师资培养机制, 革新多元主体参与的发展性评价框架, 并强化跨部门协同的政策保障体系, 旨在构建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契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推动高中教育范式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STEAM 教育; 高中教育; 拔尖创新人才; 政策协同; 人才培养机制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High School Top Innovative Talen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TEAM Education: Value Interpretation,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s

Liu Zelin^{1*}, Chen Yichen¹, Wang Zhengyao²

(¹Hengshui High School Hebei, Hengshui 053000, Hebei, China)

(²Hengshui High School Experimental Campus, Hengshui 053000, Hebei,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STEAM education concep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top innovative talents in high school, the study follows the logic of “value - problem - path”. Firstly, the core value of STEAM education in knowledge integr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national strategy adaptation is explained, and the cognitive network is constructed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 learning to practically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bility, so as to reserve talents for strategic emerging fields. Then, we analyze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EAM education at the high school level, including the lack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due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ubject system, the impediment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due to the superficializ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the constraints on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alents due to the monotonous evaluation system. Final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synergy, a systematic

- 35 -

基金项目: 无

作者简介: 刘泽霖 (2007-), 男, 河北衡水,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计算机工程

陈奕辰 (2008-), 女, 河北衡水, 高中在读, 研究方向: 科技教育

王政尧 (2008-), 女, 河北衡水, 高中在读, 研究方向: 科技教育

通讯作者: 刘泽霖, isliuzelin@dingtalk.com

optimization path is proposed: reconstructing the policy-oriented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ystem, perfecting the government-led dual-teacher training mechanism, innovating the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framework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reinforcing the cross-sectoral synergistic policy safeguard system, aiming at constructing a new mode of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and innovative talents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high school education paradigm.

Keywords: STEAM education; high school education; top innovative talents; policy synergy;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引言

在国家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背景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为高中教育改革指明方向。当前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传统高中教育模式在人才培养上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STEAM教育理念通过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的深度融合,为破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难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1-38]。本文结合多校实践案例,从现实困境、理念价值、机制构建三方面展开论述,探索新时代高中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

1.价值澄明:STEAM 教育理念对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赋能逻辑

STEAM 教育理念作为整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的跨学科教育范式,核心价值体现在知识体系的立体联结、能力结构的层级建构与国家战略的动态适配三重维度^[2]。在知识整合层面,该理念通过项目制学习的结构化设计,将传统分科教育中碎片化的学科知识,转化为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有机认知网络。具体而言,通过真实问题情境的引入,激活不同学科知识节点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促使学习者突破学科壁垒的限制,在跨维度知识联结中构建系统性思维框架,理解学科知识的共生关系与本质规律。

在能力培养向度,STEAM 教育通过“实践场域—思维进阶—创新生成”的螺旋上升机制,推动学习者从知识继承者向问题解决者转型。真实情境中的开放性问题要求学习者在模糊性、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探索,通过“问题定义—方案设计—技术迭代—成果验证”的完整流程,培育批判性思维、实验精神与跨学科协作能力。艺术思维的感性直觉与科学思维的理性逻辑在协作中相互激发,形成创新性思维的多元视角,使高中阶段成为创新能力发展的关键奠基期。

国家战略适配层面,STEAM 教育通过跨学科知识融合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双重路径,为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领域储备复合型人才^[3]。高中阶段植入的跨学科思维与可迁移能力,能够有效衔接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需求,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人力资源支撑。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的“完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战略目标高度契合,实质是通过基础教育阶段的能力塑造,构筑国家科技创新的人才战略优势^[4]。

2.现实省思:高中阶段 STEAM 教育实施的深层结构性矛盾

2.1.学科体系的割裂性与知识整合诉求的内在冲突

现行高中课程体系的分科设置源于工业时代标准化人才培养模式,导致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知识以“竖井式”结构传授,学科间知识断层显著。例如,力学原理的教学常局限于公式推演,未能与工程结构设计、材料性能分析建立实质关联;化学实验操作与环境治理需求相割裂,数学建模缺乏现实问题导向。学科评价体系以单科成绩为核心,进一步强化知识碎片化,抑制学习者跨学科知识迁移与整合能力的发展,使其难以形成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认知结构,违背现实问题需多学科协同解决的客观规律。

2.2.实践教学的表层化与创新能力培育的目标错位

传统高中实践教学存在功能定位工具化与情境设计虚拟化双重困境。实践环节多作为理论知识的验证性活动，缺乏对创新思维的激发；项目设计脱离现实复杂性，如机器人课程预设动作编程与真实工程中的算法优化、结构抗风险设计存在本质差异。评价机制以“结果正确性”为导向，忽视探索性尝试，导致学习者虽掌握基础操作技能，却缺乏应对开放性问题的能力，创新精神在“求稳怕错”的教学文化中被隐性压制^[9]。

2.3.评价体系的单一化与综合素质评估的价值失衡

现行评价体系以标准化笔试为核心，对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团队协作等核心素养缺乏科学评估工具，存在评价维度窄化、标准同质化、功能异化等问题。统一量化指标忽视学习者个体差异，擅长艺术创新或实践操作的学生难以在评价中公平竞争，评价的诊断、反馈、激励功能被应试导向消解，导致“高分低能”现象普遍，制约拔尖创新人才的多元化成长^[9]。

3.路径创新：基于政策协同的 STEAM 教育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建构

3.1.构建政策导向的跨学科课程生态系统

依据《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中“加强课程综合化，完善课程类型”的政策要求，以“碳中和目标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智能社会的基础设施规划”等国家战略议题为载体，设计主题式跨学科项目课程。每个课程模块整合多学科核心知识，如“智能能源系统优化”课程需融合物理学能量转换原理、工程学系统设计方法、数学优化算法、环境科学政策分析与艺术设计美学要素，形成“政策问题导入—跨学科知识整合—技术方案设计—实践模拟验证”的课程逻辑链。建立“基础整合—进阶创新—高阶研究”三级课程结构：基础课程通过“科学与社会”等模块启蒙跨学科思维，进阶课程以“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等真实项目培养问题解决能力，高阶课程对接高校强基计划科，实现从知识整合到创新创造的能力进阶。

3.2.完善政府主导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政策体系

落实《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构建产学研协同的教师培养机制，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实施“STEAM 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工程”，通过三方面举措提升教师跨学科素养：一是理论研修，依托师范院校开设跨学科教育专题研修班，系统培训项目式学习设计、多学科知识融合教学方法；二是实践浸润，建立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要求教师每五年累计不少于 3 个月参与企业技术研发，积累产业前沿知识；三是协同教研，组建由高校学科专家、企业工程师、中学骨干教师构成的“跨学科教学共同体”，定期开展联合备课、课程开发与教研攻关。建立跨学科教学考核激励政策，将项目课程开发成果、学生创新竞赛指导成效纳入教师职称评审条件，设立“STEAM 教育创新专项津贴”，激发教师改革动力。

3.3.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发展性评价政策框架

依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构建“能力导向、过程聚焦、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7]。在评价指标层面，制定高中 STEAM 教育学生核心素养评价标准，从知识整合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感等维度建立量化与质性结合的评估指标。在评价方式层面，实施“学习历程档案袋”制度，通过电子档案实时记录学生在项目中的调研日志、实验数据、协作记录等过程性资料，每学期开展“能力发展雷达图”分析，动态反馈成长轨迹。在评价主体层面，建立“政府教育督导—高校学术评审—企业实践评估—学生自评互评”的多元评价机制：教育行政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区域性 STEAM 教育质量监测，高校专家对学生科研项目进行学术规范指导，企业工程师从产业应用角度评价技术方案可行性，学生通过同伴互评反思协作效能，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评价网络。

3.4.政策保障体系：强化跨部门协同的实施机制

建立由教育、科技、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参与的高中 STEAM 教育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政策资源与要素供给：教育部门负责课程标准修订、教师培训经费保障；科技部门开放国家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资源，为学生提供科研实践平台；工信部门协调高新技术企业与中学共建“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定向提供真实技术项目。制定《高中 STEAM 教育设施设备配置标准》，将虚拟现实（VR）实验室、3D 打印中心等新型教学装备纳入学校建设规划，通过专项债等政策工具保障资金投入。建立“STEAM 教育示范区”建设评估指标，将改革成效纳入地方政府教育履职评价，强化政策落地的监督与激励。

4. 结语

STEAM 教育理念的实践转化，本质是在智能时代背景下对高中教育范式的系统性重构。通过课程体系的跨学科整合、师资队伍的双师型转型、评价机制的多元化革新以及政策保障的协同化设计，能够有效破解传统教育的结构性矛盾，构建与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这一过程需要政府、学校、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力——政府通过顶层设计与资源供给提供政策保障，学校通过教学改革落实育人主体责任，高校通过学术引领提升培养专业性，企业通过产业资源注入增强实践真实性。

从教育现代化的宏观视野看，基于政策协同的 STEAM 教育改革不仅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技术路径，更是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制度创新。当高中教育能够通过跨学科的知识图谱、真实性的实践场景、发展性的评价体系，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成长空间，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奠基工程。需持续深化政策创新与实践探索，久久为功，让 STEAM 教育从理念创新走向制度性育人模式，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 [1] 王晓庆.面向 STEM 教育的创客教育模式研究[J].中小学电教（下）,2020,(09):5-6.
- [2] 范文翔,张一春.STEAM 教育:发展、内涵与可能路径[J].现代教育技术,2018,28(03):99-105.DOI:10.3969/j.issn.1009-8097.2018.03.015.
- [3] 郭旭丹. STEAM 教育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D].浙江:浙江师范大学,2019.
- [4] 王卓玉,于灏媛,王琳琳. 面向新质人才需求的 STEAM 培育机制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0(5):87-96.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5.008.
- [5] 任建平.反思新课改背景下考试制度的改革[J].考试（教研）,2007, (2):51-52.
- [6] 赵莎莎.差异性学生评价探究[D].河南:河南师范大学,2011.DOI:10.7666/d.Y1960926.
- [7] 杨小梅,黎斌.产教研融合模式下“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教育素质培养策略[C]//香港新世纪文化出版社.2023 年第三届高校教育发展与信息技术创新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二卷）.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2023:23-25.DOI:10.26914/c.cnkihy.2023.098865.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论证式教学中的运用——以“DNA 的结构”为例

俞金礼¹, 巫李美¹, 李先明², 林国栋^{1*}

(1 温州大学, 浙江 温州 325035; 2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浙江 温州 32503)

摘要: 以“DNA 的结构”一节为例, 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 GPT 在辅助教师教学、促进学生学习、评价论证内容三个场景中的应用路径, 并设计“情境创设, 提出问题; 分组合作, 模型初构; 科学论证, 修正模型; 专家咨询, 完善模型; 总结提升, 反思写作”的论证式教学环节, 为人工智能赋能生物学教学、创造更具互动性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发展学生模型建构能力与论证能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论证式教学; 生物学教学; Chat GPT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rgument-based Teaching—Taking "The Structure of DNA" as an Example

Jinli Yu¹, Limei Wu¹, Xianming LI², Guodong Lin^{1*}

(¹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² Wenzhou No. 2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Wenzhou, Zhejiang, 32503,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se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paths of th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 GPT in three scenarios, namely, assisting teachers' teaching, promoting students' learning, and evaluating argumentation content. Moreover, it designed the argument-based teaching links including "creating situations and raising questions; group cooperation and initial model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argumentation and model modification;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model improvement; summary and promotion, as well as reflective writing",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mpower biology teaching, create more interactive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develop students' model construction ability and argumentation ability.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gumentative Teaching; Biology Teaching; Chat GPT

引言

《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2023) 提出^[1], 要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数字化赋能教学成为促进知识创新,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新趋势。同时, 论证式教学将论证引入课堂, 学生通过搜集信息、评价资料、提出主张, 为主张进行辩驳等过程深化对知识的理解^[2], 从而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与逻辑推理能力, 但传统的论证式课堂往往受限于教学资源、时间空间等因素, 课堂中所采用的科学史资料由教师提前设置, 不能根据学生动态生成新的学习材料, 课堂的生成性难以保证; 并且由于学生生成的论证内容繁多且复杂, 学

- 39 -

作者简介: 俞金礼 (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生物理学教学论

巫李美 (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生物理学教学论

李先明 (1974-), 男, 硕士生导师, 中学高级教师, 研究方向为中生物理学教学论

林国栋 (1968-), 男,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生物理学教学论

通讯作者: 林国栋, 2209253929@qq.com

生难以获得及时的反馈。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以其强大的创造力、快速反应力与输出能力为论证式课堂带来了新的机遇，“DNA 的结构”一节教学中，将物理模型建构过程融入论证式教学，加深对学生对概念理解的同时，提升科学思维，以此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3]，并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 GPT 为切入点，分析了其在情境创设、论证资料搜集、论证内容评价等方面的应用^[4]，提供了人工智能背景下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

1.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简介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项够利用复杂算法、机器学习模型和规则从大数据中集中学习以创新并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和代码等多种类型内容的创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自主学习适应力强、输出内容多样且迅速、跨学科整合能力强等特点^[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具就是 Chat GPT，而国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DeepSeek、讯飞星火、文心一言、智普清言等也在教育领域有着广泛应用。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 GPT 采用提示学习与人类反馈相结合的训练方式^[6]，结合了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能够处理文本并根据提问生成连贯、个性化的自然语言回复，在辅助教师改进教学设计、开发教学资源；帮助学生答疑解惑、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智能方案^[7]；创新评价方式，实现多维度智能诊断反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显著提高教学质量与学习效果，推动教学评一体化目标的实现。

2.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 DNA 的结构主题教学中的应用

2.1.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课前

在教学准备阶段，教师可以利用 Chat GPT 生成相应的生物教学资源，创设多样化的学习情境，丰富教学内容并以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参与度与学习热情^[8]。例如，在“DNA 的结构”一节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角色+背景+要求”的指令句式对 Chat GPT 进行提问：“你是中学生物学教学领域的专家，我是一名中学生物教师，即将进行 DNA 的结构一节教学，你能够结合当前研究前沿或社会热点，为我提供几个关于这节的课堂情境让我选择吗”（图 1），对于人工智能创建的情境教师能够从中获取灵感，批判性利用其提供的学习任务与建议。对于已有素材或者教学情境，教师也可以利用 Chat GPT 进行细化，模拟现实环境中的各种情境与角色。为从不同角色视角导入教学，促使情境更加深入，增加学生情感体验提供素材。例如，在“为烈士寻亲，让无名英雄有名”情境中，教师可以从寻亲者（烈士亲属）、科学家或研究者、烈士、记者、法医等角色视角进行导入，并通过“你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请你以你的口吻叙述‘为烈士寻亲，让无名英雄有名’项目”等指令获取情境素材（图 2），进行加工，赋予学生角色体验的同时激发学生同理心与社會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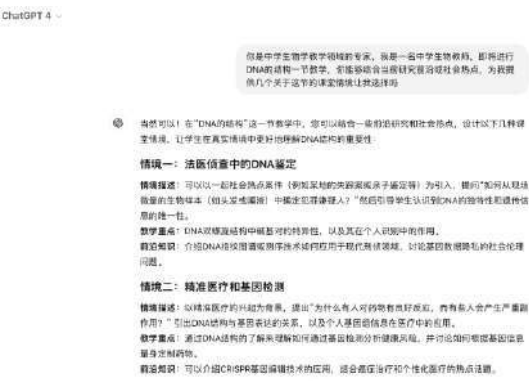


图 1 Chat GPT 生成“DNA 的结构”教学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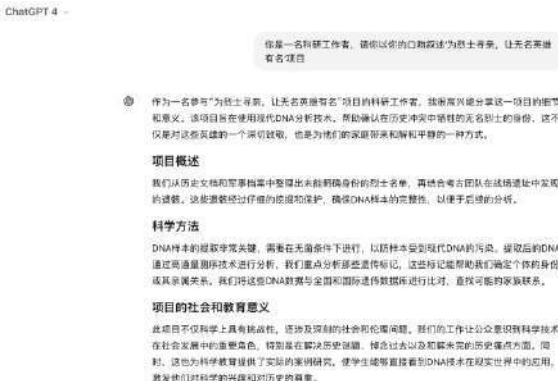


图 2 以科研工作者视角生成教学情境

2.2.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论证式教学课堂

在“DNA 的结构”教学中，学生需要建构模型并阐述自己的主张，搜集资料进行科学论证，这要求他们不仅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背景，还要能够有效组织语言，表达思想^[9]。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庞大的数据库，为学生提供了与论证主题密切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学生能够利用 Chat GPT

快速搜集 DNA 结构相关的科学史并筛选其中的有效信息以完善论证，建构模型，在高效获取知识的同时提升了自己的信息提取能力、归纳总结能力与科学素养。

2.2.1. 情境创设，提出问题

以科研工作者视角介绍“为烈士寻亲，让无名英雄有名”项目，引导学生回顾所知识并思考：什么技术可以确认烈士的身份？为什么 DNA 可以作为坚定不移材料？DNA 具有怎样的结构与其功能相适应？

通过创设“为烈士寻亲”这一有意义的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学生思考的同时，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师生讨论共同确定驱动型问题“DNA 的结构是怎样的”，并明确课堂任务：构建 DNA 的物理模型。

2.2.2. 分组合作，模型初构

教师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分组原则，将学生 4 人一组分为不同的小组，提供建模所需材料，引导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建构模型。按照学生认知规律，将 DNA 分子模型的构建拆分为构建脱氧核糖核苷酸模型、构建一条脱氧核苷酸链模型、构建 DNA 平面结构模型、建构 DNA 的双螺旋结构模型 4 个由简到繁的步骤^[10]，并结合科学史逐步论证，引导学生在脱氧核糖核苷酸的基础上构建 DNA 单链、DNA 的平面双链以及立体空间结构，在螺旋上升的逻辑思维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推理能力与信息提取能力。学生在建构模型时，可以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提问，获取与主题相关的材料（图 3），在此基础上筛选支持模型构建的信息，并结合活动任务，进一步提问（图 4），例如学生可以通过 Chat GPT 了解脱氧核糖核苷酸之间的连接方式、碱基的形状、氢键的形成、双螺旋的结构细节等知识以加深对模型的理解。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识别其中重要的信息，并提供问题支架给予学生方向。



图 3 DNA 结构科学史资料

[活动一]构建脱氧核糖核苷酸模型。教师提供材料，分别代表组成脱氧核糖核苷酸的物质，让学生在回顾 DNA 的基本组成单位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建构 4 种不同的核苷酸，思考：脱氧核糖的 C 原子位序如何？磷酸基团链接在几号 C 原子上？

[活动二]构建一条脱氧核苷酸链模型。教师提出问题“单个脱氧核糖核苷酸之间如何连接”，引导学生根据所学知识进行类比推理，并展示科学史资料。学生能够从资料中获取信息，为建模提供依据并做好记录。

[活动三]构建 DNA 平面结构模型。以科学史为支架，引导学生分析资料解决“DNA 有几条脱氧核苷酸链组成”“DNA 的脱氧核苷酸链如何分布”“碱基之间如何配对”“如何让两条脱氧核苷酸链连接起来，更加稳定？”，并在学生建构模型的过程中搜集学生生成的问题，及时给予引导。

[活动四]建构 DNA 的双螺旋结构模型。学生搜集相关资料后教师展示沃森和克里克的 DNA 衍射图谱，设置弹簧激光衍射这一体验性活动，引导学生类比推理得到 DNA 具有螺旋结构，并提供科学史资料作为支架，学生进一步分析资料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确定 DNA 螺旋结构组成，建构 DNA 的立体结构模型。

2.2.3. 科学论证，修正模型

基于上一阶段构建的 DNA 立体模型，以书面形式撰写由主张、证据和推理组成的科学论证^[11]，教师提供书面论证指南（图 5），论证过程围绕“DNA 的基本单位是什么”“DNA 的基本骨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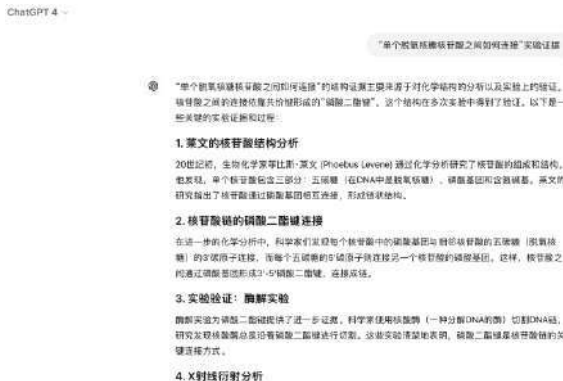


图 4 针对模型建构过程进一步提问

是怎样的”“DNA 的碱基所在位置如何”“DNA 的三维立体结构如何构成”展开，学生依据搜集到的信息，个人完成书面论证进行小组讨论。在此阶段，教师应当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而不对学生观点的正确与否作出评价，并实时与同学交流，了解学生进度。通过组内交流，小组成员加深对 DNA 模型的认识和理解，消除分歧，达成一致。

问题：DNA 具有怎样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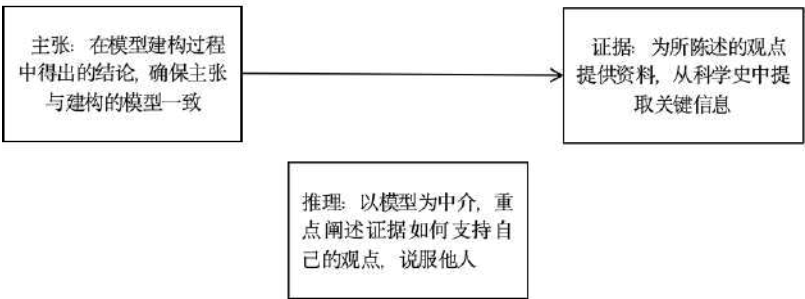


图 5 书面论证指南

在书面论证完成以后，班级进行交流讨论，完成口头论证，小组选派代表进行汇报，阐述本组构建的 DNA 模型，其余小组成员对同学的提问和质疑进行解释，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当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学生进行批判质疑，在学生出现问题时提供脚手架（表 1），帮助学生理解，推动讨论顺利进行。在质疑与批判过程中，学生不断修正模型，最终全班能够针对驱动型问题达成一致，总结 DNA 的结构特点。

表 1 模型论证中出现的问題

学生初步构建的模型	教师活动
不清楚脱氧核苷酸之间的连接方式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方式进行类比，分析得到脱氧核糖 3 号碳原子与另一个核苷酸的磷酸相连
对于碱基排列在内侧还是外侧不明确	教师进行适当提示：人的 DNA 分布在细胞的哪些结构中？DNA 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建构的模型两条链方向不明确	教师通过角色扮演活动，类比推理，两位同学上台，躯干代表五碳糖，左手握拳代表磷酸基团，右手摊开手掌代表碱基，进行配对，通过提问，配对的两位学生身体朝向如何？说明了什么问题？

2.2.4. 专家咨询，完善模型

教师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 DNA 双螺旋结构视频，利用动画技术呈现碱基互补配对、磷酸-脱氧核糖骨架的交替排列等核心特征，帮助学生建立空间结构认知，并将学生构建的模型与专家总结的模型进行对比，并作进一步的修正。“专家”不仅指的是生物学领域的权威人士，也包括教科书、互联网资源等等。在此过程中，学生需填写《模型修正对照表》，记录自身模型与标准模型在结构参数（如螺距 3.4 nm）、化学键类型等方面的偏差，并标注修正依据来源。

2.2.5. 总结提升，反思写作

修正模型以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组间对比，观察小组构建的 DNA 结构模型，总结其相同点与不同点，并归纳得到 DNA 分子的特性：通过改变碱基序列演示 DNA 携带遗传信息的能力，总结 DNA 分子的多样性；对比正常 DNA 与热变性 DNA（加热至 95℃）的模型，解释氢键断裂与复性的可逆过程，总结得到 DNA 具有稳定性；使用 CRISPR-Cas9 系统的简化模型，模拟 gRNA 对特定 DNA 序列的识别，归纳出 DNA 的特异性，从而解决情境问题，DNA 技术可以帮助确定烈士身份，这依靠的是 DNA 分子的什么特点？渗透结构与功能观。通过强调 DNA 技术在现代社会亲子鉴定、犯罪侦查和疾病诊断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认识 DNA 技术的社会价值。

反思性写作是促进学生知识系统化的关键性一步，其本质是思维的外显化训练，要求学生将隐性知识转化为可交流、可批判的显性文本^[12]。不同于小组建模与交流讨论环节，写作应当能够体现学生所学习到的具体知识和科学探究方法，通过写作，学生回顾模型建构与科学论证的过程，阐明个人对概念的理解，并反思在学习过程中的不足与收获，升华对知识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不仅“知道”科学知识，更“理解”科学本质；不仅“掌握”探究方法，更“内化”科学思维。这种从“知识记忆”到“思维建模”的转变，正是核心素养教育的核心要义。

2.3.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论证评价

在传统的论证式教学评价中，对于论证内容的甄别和梳理往往依靠教师个人的主观判断与经验积累，而真实教学场景中学生生成的论证内容不仅量大且复杂^[13]，涵盖了多元化的观点和论据，受时间、经验、个人认知的限制，教学评价容易陷入片面化、单一化与过度主观化的困境，不仅难以反映学生学习成效，还可能影响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体验。Chat GPT 基于大语言模型，以其丰富的语料库与强大的交互理解和对话能力在联系论证内容的上下文，从中提取出观点、证据、推理过程等评价要点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潜力。在对学生生成的论证内容进行评价时，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搜集学生的论证内容，并结合教学评价以及教学情境进行提问设计（表 2），要求 Chat GPT 从解释的充分性与证据的充分性对论证内容的合理性进行质性评价，从论证内容中所包含的观点、证据主数量对论证内容的完整性进行量化评价，并基于此提供反馈。

表 2 Chat GPT 对论证内容评价与反馈提问设计

提问类型		提问内容
量化评价	主张	这段论证内容中，学生提出的主张是什么
	证据及其数量	学生是否提供了证据支持主张？提供了几个证据？提供了什么证据？
质性评价	证据的充分性	学生提供的证据能够充分支持主张吗？为什么？
	推理的充分性	学生能够清楚解释主张和证据之间的关系吗？为什么？
过程反馈	目前进展如何	学生的论证任务完成情况如何？请总结一下
	接下来的做法	学生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接下来该怎么做？
情感反馈	表扬	假如你现在是教师，请根据同学在论证过程中的表现加以表扬。
	批评	假如你现在是教师，请根据同学在论证过程中的表现提出批评

3. 反思与展望

人工智能赋能中学生物教学为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范式，Chat GPT 在辅助教师教学、促进学生学习、评价论证内容等方面的潜力巨大。在“DNA 的结构”一节教学中，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开展物理建模与科学论证，在亲历提出问题--获取信息--建构模型--修正模型-形成结论的过程中进行科学推理，通过书面论证与口头论证对建构的模型进行解释，论证主张并在讨论的过程中获得反馈，经专家咨询，逐步修正模型，实现概念转变，最后通过反思性写作完成对概念知识的内化，实现系统建构并对学习过程进行反思。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熟练应用各种智能工具，规范使用提示语，利用多样化的提问方式创建教学情境，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设置不同特点的各类职业、社会身份教学智能体以增强情境教学的真实沉浸感觉。同时，在学生利用人工智能搜集资料，进行模型建构与科学论证时，教师应当充分考察学情，为学生建构模型搭建脚手架，明确学生资料搜集的方向^[14]；引导学生辨别生成信息的真伪，避免课堂教学出现科学性错误，潜移默化提升学生批判性思维与科学探究能力，养成积极的科学态度，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优势。在教学评价中应用人工智能，能够丰富教学效果评价手段，有利于制定多元、有效的评价体系，客观评价学生建构过程，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1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生物学教学中潜力巨大，但其合理应用仍需教育研究者不断深入思考^[16]，在实践中探索其应用方式和策略，为学生创造多样化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的通知[J/O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3(05): 15-19. DOI:10.16826/j.cnki.1009-7228.2023.04.007.

[2] 徐小颖, 金英善, 吴晓霞, 等. 论证式教学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J]. 中学生物教学, 2022(36): 11-14.

[3] 弭乐, 郭玉英. 科学建模与科学论证整合的教学模式述评[J]. 物理教师, 2018, 39(02): 7-12.

[4] 高琳琦.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个性化学习中的应用模式[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 2023, 24(04): 36-40.

[5] 陈琳.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路径初探[J].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 2023(34): 15-20.

[6] 陈静远, 胡丽雅, 吴飞.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以知识点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变革研究[J]. 华东师范

- 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07): 177-186.
- [7] 尹立坤.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项目式课程设计中的应用实践[J]. 中小学数字化教学, 2024(08): 18-22.
- [8] 梁焯华. 基于科学思维的智能技术与高中生物教学深度融合途径研究[J]. 考试周刊, 2021(A1): 142-144.
- [9] 华丽芬. 基于证据推理与模型建构的教学实践——以"分子的空间构型"为例[J]. 化学教与学, 2021(18): 13-15+26.
- [10] 盛莉. 基于科学史和模型建构的"DNA 的结构"教学设计[J]. 中学生物教学, 2022(35): 72-75.
- [11] 徐梦秋. 基于 SNP 教学模式的教学设计——以"动量守恒定律"为例[J]. 湖南中学物理, 2021, 36(12): 59-61+30.
- [12] 滕佳星, 徐小颖, 吴红漫, 等. SNP 论证式教学模式在"DNA 的结构"一节中的教学初探[J]. 中学科技, 2022(17): 31-33.
- [13] 王丽, 李艳, 陈新亚, 等. ChatGPT 支持的学生论证内容评价与反馈——基于两种提问设计的实证比较[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3, 35(04): 83-91.
- [14] 潘章丽, 林国栋. 基于 SNP 教学模式的高中生物单元教学设计探索[J]. 中学生物学, 2021, 37(10): 9-12.
- [15] 郑好.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SSI 论证教学中的应用[J]. 生物学教学, 2024, 49(12): 51-54.
- [16] 郭计华. ChatGPT 在提升生物教学体验中的应用与前景分析[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4(02): 113-119.

当镜头揭露制度：现实主义电影中的教育管理困境与伦理反思

郑少鑫¹, 王雯娟¹, 宋沐杰¹, 韩明^{2*}

(¹ 首尔科学综合大学院大学, 韩国 首尔 03767; ²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 器官移植科, 广东 广州 510080)

摘要: 近年来, 现实主义电影在东亚社会中日益成为揭示制度问题与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文化媒介。本文以《熔炉》《素媛》《嘉年华》三部现实主义影片为案例, 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叙事呈现教育管理实践中的制度漏洞与伦理失守。研究综合运用电影现实主义理论、教育管理伦理学与社会批判教育理论, 从教育者缺位、制度冷漠、跨系统联动失败等维度出发, 分析现实主义电影如何激发公众共鸣、推动制度改革, 并提出其在教师培训和教育治理中的实践价值。研究发现, 现实主义电影具备“制度再现—伦理批判—改革动员”的三重功能, 可作为教育管理课程的重要补充资源, 并构成文化、制度与教育之间互动机制的关键环节。本文旨在为现实主义影视作品在教育管理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与教学实践提供跨学科启示。

关键词: 现实主义电影; 教育管理伦理; 制度批判; 教师培训; 社会批判教育理论

When the camera exposes the system: Dilemmas and Ethical Reflections on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 Realist Cinema

Shaoxin Zheng¹, Wenjuan Wang¹, Mujie Song¹, Ming Han^{2*}

(¹ASSIST University Seoul Korea, 03767; ²ransplant center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8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alist film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medium for revealing institutional problems and promoting social reform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This paper takes three realist films, *The Crucible*, *Hope*, and *Angels Wear White*, as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how they present the systemic loopholes and ethical failures in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through video narratives. The study integrates the theories of film realism, ethics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critical education, and analyses how the realist films inspire public resonance and promote institutional reform from the dimensions of educators' absence, institutional indifference, and failure of cross-system linkage, and proposes their practical value in teacher training and education govern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realist films have the triple function of 'institutional reproduction - ethical critique - reform mobilisation', which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resource for education management courses and constitute a key link in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culture, system and edu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inter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the theoretical

- 45 -

作者简介: 郑少鑫 (1992-), 男, 广东汕头, 博士, 研究方向: 性教育研究、AI 赋能与教育教学研究等

王雯娟 (1989-), 女, 山西太原, 博士, 研究方向: 教育管理研究、民营艺术机构教育研究等

宋沐杰 (1999-), 男, 山西太原, 博士, 研究方向: 教育管理研究、法律研究等

韩明 (1981-), 男, 吉林吉林, 博士, 研究方向: 器官移植与器官捐献、教育管理研究等

通讯作者: 韩明, Hanming282@163.com

construction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 of realist film and television in educational management studies.
Keywords: realist cinema; ethics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al critique; teacher training;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education

引言

现实主义电影作为一种深具社会批判力与伦理警示功能的艺术形式,近年来在东亚国家逐渐成为反思制度性问题的主要媒介。以韩国电影《熔炉》(2011)、《素媛》(2013)及中国电影《嘉年华》(2017)为代表,这类基于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不仅揭示了教育系统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失守,更激发了公众对教育管理伦理、制度漏洞及法律回应的广泛讨论。这些影片虽不同地域背景,却在共同的叙事策略与现实议题中构建了强烈的社会现实观照。

现实主义电影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社会共鸣,与其所采用的真实化叙事方式密切相关。电影的本质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再现,而现实主义正是“影像对真实世界最具还原性与感染力的形式之一”^[1]。这种影像语言不仅仅追求视觉再现的真实性,更承载着叙事伦理的自觉与社会批判的力量。现实主义电影常常突破传统叙事结构,通过非理想化的人物设定与开放式结局,引发观众对“制度性冷漠”与“结构性压迫”的反思^[2]。这在教育场域中尤为敏感,因为学校、教师、制度往往被视为最应承担保护义务的角色。

教育管理理论强调,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过程,更是制度伦理与社会责任的体现。教育管理者的角色,理应在制度设计与危机干预中居于核心。然而,这类现实电影频繁展现的恰是学校管理者、教师、甚至法制机构对儿童权益保护的缺席。由此可见,现实主义电影在反映教育管理伦理失衡与制度疏漏方面,具备强烈的问题导向与社会功能。

本文将《熔炉》《素媛》《嘉年华》三部现实主义影片为分析案例,探讨现实主义电影如何通过叙事策略揭示教育系统中的管理困境、伦理失守与制度空白,并进一步分析此类影片对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与伦理重建的潜在推动作用。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现实主义电影如何建构教育管理的危机图景?电影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教育政策与公共认知?教育管理者是否可从此类文化产品中获得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涵盖电影现实主义理论、教育管理伦理学、以及社会批判教育理论。通过跨学科整合与文本分析,本文试图建立“现实电影—制度批判—教育管理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现实主义影视作品在教育管理研究中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反思路径。

1. 文献综述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电影叙事传统,长期以来在电影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不同学者从技术层面与伦理层面对其展开分析。Hietala (2022) 区分了“技术现实主义”与“伦理现实主义”,前者关注电影媒介再现现实的能力,后者则强调电影如何承担社会批判与伦理建构的责任,尤其在呈现边缘群体困境方面具有独特价值^[3-1]。而 Nagib (2011) 在其对世界电影的研究中指出,现实主义在不同国家语境中被用来揭示政治、社会与文化的隐秘结构,特别是在反映教育、阶层与社会改革问题上更具道德张力^[4-1]。

1.1. 教育管理伦理与制度责任的相关研究

教育管理不仅是一种组织行为,更是一种伦理实践。Strike 等学者强调,教育管理者的首要职责不只是确保制度运行的效率,更在于维护教育系统中的道德正义与学生权利^[5-1]。在实际运作中,制度往往存在“责任转移”与“组织冷漠”的问题,尤其在处理涉及儿童利益的危机事件中表现突出。Nagib (2009) 在对多国现实主义电影的研究中指出,学校管理者在面临伦理抉择时的失守,恰是制度化冷漠的具象呈现^[6]。因此,电影中对学校失职者的塑造,不仅是对个体行为的批判,更隐喻了教育治理体系中权力结构与伦理机制的断裂。

近年来研究更强调“教育领导力”的伦理维度,尤其是面向弱势学生群体的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主张教育管理者应主动识别和干预制度性伤害^[7]。在未成年被侵犯等极端事件中,制度响应机制与教育伦理之间的矛盾,往往揭示制度规范无法涵盖的情感与人权需求。

1.2. 教育管理中的伦理反思与制度批判

在教育管理领域,影视作品常作为“公共教育”的非正式渠道,呈现出对教育伦理责任、制

度性暴力以及政策冷漠的质疑与批判。Ma (2024) 在分析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狗十三》时指出, 该片通过青少年的教育困境揭示了家庭与学校制度对个体情感与发展的压制, 折射出当前教育管理系统中权威机制的伦理危机^[8-1]。而 Seipel (2017) 的实证研究也表明, 影视文本中的教育场景虽属虚构, 却能通过社会学习机制影响受众对现实教育情境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 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应对与制度角色理解方面具有一定启发意义^[9-1]。

多项跨文化电影研究发现, 现实主义电影常在重大社会矛盾(如性别暴力、种族歧视、阶层隔离)激化时期涌现, 并在公共舆论与政策转型中扮演“情绪激发器”和“制度议题设定者”的角色。例如, 韩国电影《熔炉》上映后, 引发了国会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 说明电影可以成为法治改革的重要社会引导力量。

1.3. 现实主义电影与教育制度改革的潜在关系

电影不仅是社会批判的工具, 也可能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文化催化剂。García (2015) 指出, 影视作品是当代青年学生认知教育制度、教师职业角色与管理权力结构的主要媒介之一^[10]。在教师教育中, 使用现实题材影片作为案例讨论, 能够促进师范生对“教育正义”“权力伦理”与“制度盲区”的深入理解。Hauke G, Dall'Occhio M (2013) 的研究也发现, 影视剧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受众对教育制度运行与个体责任的认知, 尤其当作品具有高度现实感时, 更容易激发情感共鸣和认知重构^[11]。Shahanskaya (2018) 通过对意大利 1940—2017 年以“学校”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影片进行分析发现, 在社会矛盾加剧时期, 学校题材电影往往转向表现制度压迫、贫困问题与教育资源不均, 引发大众对教育公平与制度改革的关注^[12-1]。在美国语境中, Petrilli (2010) 则指出, 诸如《Waiting for Superman》等教育纪录片通过大众化叙事, 将教育改革议题从政策圈层推向公众讨论场域, 有效推动了教育改革资源的流动与舆论监督机制的发展^[13]。

在实际教学实践中, 美国、芬兰、以色列等国的师范课程中已广泛引入现实主义教育电影, 用于教师伦理教育与危机干预演练。这些经验说明, 影视作品不仅能引发社会讨论, 更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1.4. 未成年人保护与学校制度研究概况

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议题长期受到重视, 郑少鑫等学者 (2024, 2025) 研究发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制度的建构, 二是学校内部保护机制的完善, 三是社会支持系统的整合^[14-16]。Ma (2024) 在对《狗十三》的分析中指出, 当学校与家庭共同失责时, 青少年极易被边缘化或创伤化, 制度应建立“主动性识别与干预机制”, 而非仅在事件发生后被动补救^[8-2]。

在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教育电影研究中, 教育系统面对危机事件时的“反应滞后”与“程序主义”被频繁批判, 呼吁从“儿童为本”出发重构教育法律与行政体系^[12-2]。这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提出的“尊重儿童意见”“保护儿童不受一切形式暴力侵害”的理念高度一致。现实主义电影对这些问题的反映具有极高的教育价值: 它不仅展现了制度如何失败, 更提出了伦理与制度如何协同建构的命题。

2. 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现实主义电影为分析媒介, 以教育管理中的伦理危机与制度失效为研究对象, 借助跨学科的理论视角构建分析框架。具体包括: 电影现实主义理论为研究提供叙事机制与社会功能的解释框架; 教育管理伦理学揭示制度操作与伦理责任之间的张力; 社会批判教育理论则赋予本文对制度性压迫与教育正义的深层解析力。

2.1. 电影现实主义理论

电影现实主义理论作为电影学研究的重要分支, 旨在探讨影像与现实之间的映射关系与伦理诉求。Bazin (1967) 在其经典论著中主张, “现实主义是电影最本质的使命”, 真实不是机械还原, 而是一种尊重现实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影像语言^[17]。Hietala (2022) 在现代媒体语境下重构现实主义为“技术现实主义”与“伦理现实主义”两个维度, 前者强调影像语言的真实再现, 后者则强调艺术作品的社会正义功能, 主张现实主义电影应当“揭示制度性暴力并赋权于边缘人群”^[3-2]。这一理论为本文分析《熔炉》《素媛》《嘉年华》中对教育制度失灵与儿童权利侵害的视

觉化呈现提供了解释路径。现实主义电影以“个体命运叙事”激活公共记忆，以“事件可感化”促发社会制度回应，其在教育题材中的运用恰恰揭示了教育制度表象下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批判与转化社会现实的重要工具。

2.2. 教育管理伦理学

教育管理伦理学关注教育管理者在制度运行中的道德角色与行为边界。Strike 等学者提出，“教育行政不仅是对规则的执行，更是对学生福祉的道德捍卫”^[5-2]。然而，在现实教育实践中，教育管理常常陷入“程序优先、责任回避”的伦理困境，尤其在处理学生性侵、心理创伤等高风险事件时，组织往往选择风险控制逻辑，而非伦理响应逻辑。

Noddings (1984) 的“关怀伦理学”理论强调教育管理者应在关系中体现责任，关怀并非抽象的善意，而是具体行为中的主动识别、倾听与回应^[18]。本文所分析的三部电影均展现出教育管理者在面对学生危机时的伦理缺位：《熔炉》中的校长选择压制真相，《素媛》中的教师缺席心理辅导，《嘉年华》中学校回避参与调查，这些行为本质上暴露出教育制度对“学生中心”理念的执行断裂。教育管理伦理学为本文提供了理解制度冷漠、组织沉默以及道德判断力缺失的理论支持，也为重建责任型教育管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2.3. 社会批判教育理论

社会批判教育理论由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雷雷 (Paulo Freire) 奠基，其核心主张是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解放的实践，应当揭示和挑战制度性压迫，并赋予弱势群体“命名世界”的权利^[19]。Freire 反对“银行式教育”中教师权威灌输与学生被动接受的关系，主张通过“对话式教育”实现学生主体性的激活。在电影分析语境中，批判教育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教育如何成为权力再生产的机制，以及如何在现实主义电影中被揭露和挑战。《嘉年华》中女学生在失去保护后对抗社会的尝试、《素媛》中家庭对制度救助无望的承受、《熔炉》中教师与学生共同抵抗校方权力体系，均是“被压迫者教育学”的典型情境重现。批判教育理论为本文提供了宏观结构分析维度，使我们能够看到电影中制度性问题背后的权力逻辑，并进一步思考教育应如何超越形式上的制度合理性，走向实质上的公平正义。

3. 案例分析

3.1. 《熔炉》：教育机构的系统性掩盖与权力结构失衡

电影《熔炉》(2011) 改编自韩国真实事件“光州聋哑学校性侵案”，深刻揭示了教育机构在应对内部侵害事件中的系统性遮蔽行为。影片中，学校高层不仅知情不报，甚至与施害者共同构成“内部共犯结构”，试图以金钱与威胁掩盖真相。这种系统性掩盖本质上源于教育机构对弱势学生（尤其是残障儿童）权利的结构性的忽视，其背后是权力保护主义与等级秩序的深层文化逻辑。

影片真实还原了“制度冷漠”的运行机制：受害者的证词难以被法院采信，学校领导通过行政资源对抗法律，教育行政部门也未能及时介入。这种失职不仅体现在道德层面，更体现为制度性“风险规避”的倾向——即教育管理者将组织声誉置于学生福祉之上。

《熔炉》上映后引发了韩国社会巨大舆论反响，最终推动韩国国会修订《性暴力特别法》，出台俗称“熔炉法”，废除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公诉时效，并加强了对残障人群的保护。这种影视—社会—立法三维联动，体现了现实主义电影对教育与法律制度的现实干预力^[20]。

3.2. 《素媛》：法律与教育干预系统的双重滞后

《素媛》(2013) 取材自 2008 年震惊韩国的“赵斗淳事件”，讲述一位 8 岁女孩遭遇侵犯后的心理创伤与家庭支持过程。影片聚焦于事件发生后的制度性空白，呈现了法律判决与学校支持的“双重缺位”。

一方面，施害者仅被判处 12 年监禁，舆论普遍认为量刑过轻，暴露出当时韩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性侵的惩罚机制尚不健全；另一方面，影片中受害女孩所就读的学校几乎未提供任何有效的心理辅导或特殊支持服务，家庭成为唯一的情感庇护所。

在教育管理视角下，该片反映出严重的“教育延迟响应”问题，即学校在面对学生遭遇创伤后，未建立起应急心理干预、学业过渡与社交修复等系统化机制。这种“教育孤岛化”现象，折射出学校缺乏跨部门协同与以学生为中心的危机管理理念^[21]。

3.3. 《嘉年华》：多机构联动失败与教育者缺位

《嘉年华》(2017) 改编自 2013 年我国真实案例改编而来，聚焦于两名未成年女孩的受害经历及其后续遭遇。影片采用少女小米的视角，揭示出学校、家庭、公安、媒体等多个社会系统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中的全面失守。学校方面，管理层未对学生的失踪与异常行为及时干预，表现出“教育责任的行政性推卸”；家庭方面，家长因社会地位、认知不足等原因未能有效为孩子发声。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影片中“教育者缺位”现象，教师角色基本隐形，学生在受害后并未得到来自学校的专业情感支持或制度性保护。影片用冷静克制的镜头语言展现制度中“无形的暴力”与“合法的沉默”，高度符合

Foucault (1995) 关于“规训性社会”的理论分析^[22]。《嘉年华》不但呈现了我国社会对性侵案件的敏感性，更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揭示学校教育系统中“形式合规而实质无力”的深层问题。

3.4. 案例比较与归纳

三部电影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当教育管理机制失效时，电影成为揭露现实、重塑认知与推动制度进化的文化利器。通过对这三部现实主义电影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管理不仅需要制度规范，更需要伦理自觉与跨机构协作能力。现实主义电影则以其“伦理再现”的特性，成为制度漏洞最具穿透力的呈现方式。具体比较与归纳如表 1 所示：

表 1：案例比较与归纳

影片名称	教育管理问题	制度响应	现实意义	显著特征
《熔炉》	校方系统性掩盖，权力结构保护加害者	推动“熔炉法”立法改革	形成影视推动立法范例	公权力与教育伦理冲突
《素媛》	学校未提供心理干预，制度支持缺失	社会舆论促使法律加强惩治性犯罪	揭示制度对心理康复支持不足	教育支持系统的“真空”
《嘉年华》	教育者集体失语，多机构联动失败	无明确制度改革，但引发广泛社会反思	关注“非行为中的失责”	真实主义下的沉默抗议

4. 教育管理的启示与反思

4.1. 教育管理中的伦理责任与制度刚性问题

从三部影片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教育管理实践在处理极端事件（如校园性侵、学生心理创伤等）时，往往暴露出制度“刚性”与伦理“柔性”之间的张力。教育管理者通常被制度性角色（如校长、行政官员）所规训，强调程序与风险控制，却忽视教育系统本应承担的道义责任。正如 Strike 等人所言，教育行政不仅是权力的执行，更是道德的承载体；失去伦理反思的制度运行易于沦为“合法的不作为”^[5-3]。

影片《熔炉》所呈现的管理者知情不报、《嘉年华》中教师的集体沉默，皆体现出当代教育机构在面对伦理困境时的“责任悬空”状态。这种失责不仅是个人层面的选择失误，更是制度文化中“以维稳为本”的结构性结果。因此，现代教育管理应以伦理为轴心，重构“权力—责任—回应”三者间的关系，建立以学生福祉为本的决策体系。

4.2. 教育系统与法律、心理机制的联动不足

影片案例同时揭示出教育系统与外部专业体系（如法律、心理辅导）的联动缺失。尤其在未成年人遭遇侵害后，学校往往因权限所限或意识缺失，无法及时启动跨部门协同机制。这一问题在《素媛》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学校缺乏基础心理支持能力，家庭被迫承担了全部重建责任，反映出现代教育体系在“非学科性需求”面前的结构性无力。

Fasching-Varner 等人指出，教育制度需与法律体系、社会福利机制形成“复合保护网络”，尤其是面向弱势群体时，应主动承担识别、报告、协作与疏导的多重功能^[21]。教育管理者应具备“系统思维”与“应急领导力”，理解教育问题的多维性质，促进跨领域沟通机制制度化。

4.3. 现实主义电影的教育功能：警示、唤醒与改革

现实主义电影在教育管理语境中的独特价值不可忽视。一方面，它通过“可视化叙事”将抽象的伦理问题转化为具象场景，强化教师与管理者的情感共鸣与道德反思；另一方面，现实电影

往往具备社会动员能力，能够突破专业边界，唤起公众对教育制度缺陷的关注与批判。

真正的现实主义电影不仅呈现现实，更是“在揭露现实的同时激活改革的潜能”^[4-2]。影片《熔炉》推动法律修订，《嘉年华》在国际影展上引发未成年人保护话题讨论，均是电影介入公共议题、撬动制度回应的有力证据。现实主义电影不仅是一种文化表达，更应被视为教育治理反思与社会改革实践的重要催化劑。

4.4. 教师教育与管理课程的革新建议：引入现实电影为辅助教材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在教师教育与教育管理课程中引入现实主义电影作为案例教学资源。通过将《熔炉》《素媛》《嘉年华》等影片纳入课程设计，不仅能丰富教学内容、提升课堂参与度，更可作为伦理教育与危机管理教学的有力辅助工具。可操作路径包括：（1）案例研讨：以影片中具体教育管理决策为议题，引导学生进行伦理判断与多方利益分析；（2）情景模拟：让学生模拟片中学校应对机制，训练其应急决策与沟通能力；（3）跨学科融合：结合法律、心理、社会工作等知识，形成综合治理视角。

Seipel（2017）的研究已表明，影视在情感唤醒、伦理教育与行为倾向塑造方面具有显著效果^[9-2]，而现实主义题材因其贴近现实、情境真实，更具有深度学习潜力。

4.5. 文化媒介—社会意识—制度变革三位一体的互动机制

基于《熔炉》《素媛》《嘉年华》三部现实主义电影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影片不仅展现了教育管理实践中的制度漏洞与伦理失守，更通过视觉叙事触发了公众情感、社会批判与政策回应。为了更直观地呈现现实主义电影与教育管理改革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构建了如下图 1 概念模型：

该模型展示了现实主义电影如何通过对个案的视觉再现，激发社会情绪与舆论关注，进而倒逼制度批判，并推动教育管理体系向伦理责任导向、跨系统联动和制度革新方向演进。这一逻辑链条强调了“文化媒介—社会意识—制度变革”之间的内在互动，为理解影视文本在教育管理研究与实践中的功能提供了理论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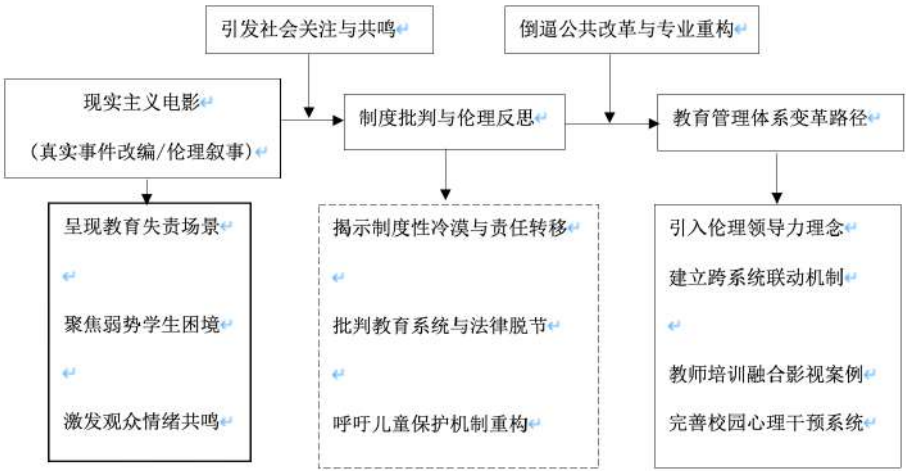


图 1：“文化媒介—社会意识—制度变革”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

5. 结论

本文以现实主义电影《熔炉》《素媛》《嘉年华》为案例，探讨了影像艺术如何以批判性叙事方式揭示教育管理体系中的制度漏洞与伦理失守。三部影片虽产生于不同国家背景下，但均聚焦于教育组织对未成年学生特别是弱势群体在关键时刻的保护缺位，揭示了教育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以下问题：

影片反映出教育管理中制度刚性与伦理责任脱节的核心矛盾。在《熔炉》中，教育机构以权力结构维稳为首要目标，牺牲学生权利；在《嘉年华》中，教育管理者的“沉默”与“缺席”直接构成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这种制度冷漠不仅源于管理体制的问题，更体现出教育伦理的缺位与组织文化中的功利主义倾向。

三部影片均揭示出教育系统与外部法律、心理支持体系之间的联动障碍。《素媛》呈现出学校在性侵事件后的应对空白，严重依赖家庭单方面支撑学生康复过程。这种跨系统协同能力的缺失，

反映出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的无力与迟滞。

本文指出,现实主义电影不仅是社会问题的反映器,更在制度改革与公共意识塑造中具有重要功能。《熔炉》促成韩国立法改革、《嘉年华》在国际舆论场引发关于中国未成年保护的广泛讨论,说明现实主义电影具备“社会动员”与“公共启蒙”的双重教育功能。它能跨越学科与职业界限,促使教育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与普通观众共同参与到对制度正义的建构中。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建议将现实主义电影正式引入教师教育与教育管理课程,作为伦理教育、危机管理、制度批判等模块的重要补充资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影视教育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适配策略与影响评估方法,推动电影教育与教育管理之间更紧密的跨界融合。

参考文献:

- [1] BOARDMAN F. Realism about Film and Realism in Films[J]. *Film-Philosophy*, 2020, 24: 43-62.
- [2] BISWAS M. Realism[J]. *BioScope: South Asian Screen Studies*, 2020, 12: 158-161.
- [3] HIETALA V. The Real Thing? The Hauntings of Realism in Contemporary Media Theory[J]. *Lähikuva—audiovisuaalisen kulttuurin tieteellinen julkaisu*, 1995, 8(3): 93-97.
- [4] NAGIB L. World cinema and the ethics of realism[J]. 2011.
- [5] STRIKE K A, HALLER E J, SOLTIS J F. The ethics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M].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14.
- [6] NAGIB L, MELLO C. Realism and the audiovisual media[M]. Springer, 2015.
- [7] NODDINGS C N.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J]. 1984.
- [8] MA J. The Ordeal of Youth and the Cost of Growing Up on the Realism Critique and Human Nature Critique in the Film “Einstein and Einstei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2024.
- [9] SEIPEL M. Natural disaster films: a social learning and perceived realism perspective[M].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17.
- [10] GARCÍA J. Learning from bad teachers: The neoliberal agenda for education in popular media[J]. *Critical Education*, 2015, 6(13).
- [11] HAUKE G, DALL'OCCHIO M. Emotional Activation Therapy (EAT): Intense work with different emotions in a cognitive behavioral setting[J]. *European Psychotherapy*, 2013, 11(1): 5-29.
- [12] SHAHANSKAYA K A. The Analysis of Italian Films on the Theme of School and University[J]. *Zhurnal Ministerstva narodnogo prosvetsheniya*, 2018(5): 53-60.
- [13] PETRILLI M J. School reform hits the big screen: why 2010 is a banner year for the education documentary[J]. *Education Next*, 2010, 10(4): 82-84.
- [14] ZHENG S, SONG M, HAN M. Research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and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Adolescent Sex Educ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s*, 2024, 1(2): 456-463.
- [15] ZHENG S, HAN M.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Adolescent Sex Education Based on Social Media[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2025, 2(1).
- [16] 郑少鑫, 韩明. 青少年性教育管理——“教”与“防”的思考 [Management of Adolescent Sex Education: Reflection on “Teaching” and “Prevention”][J]. *Advances in Education*, 2024, 14: 171.
- [17] BAZIN A. What is Cinema? Volume I[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108.
- [18] NODDINGS N.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J]. 1984.
- [19] FREIRE P.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M]. New York: Continuum, 1970.
- [20] KONG Z. The Significance of Realistic Theme Fil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C]//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ICHESS 2019). Atlantis Press, 2019: 357-359.
- [21] FASCHING-VARNER K J, MITCHELL R W, MARTIN L L. Beyond school-to-prison pipeline and toward an educational and penal realism[J]. *Equity &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2014, 47(4): 410-429.
- [22]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New York: Vintage, 1995.

天人共生与人性复归：老子与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理想的比较研究

聂慧^{1*}

(¹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西区),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在生态哲学视域下, 东方道家“道法自然观”与西方启蒙时期“返归自然论”形成了跨时空的生态教育哲学对话。老子提出的“无为自化”教育机理与卢梭建构的“自然状态”教育模型, 共同完成了双重范式革命。其一, 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教育范式, 实现从规训教化向生态本位的认识论转向; 其二, 重构“天人共生”的教育价值坐标, 通过现象学还原方法揭示生命体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二者殊途同归地指向生态伦理自觉的三重培养目标, 即培育主体间性认知能力、建构生态位责任意识、达成物我共生的存在论境界。

关键词: 老子; 卢梭; 自然主义; 教育理想

The Coexistence of Heaven and Humanity and the Return of Human N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ozi and Rousseau's Naturalistic Educational Ideals

Hui Nie^{1*}

(¹Chengdu Shude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West District),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 610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the Eastern Taoist "Dao Fa Nature View" and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Return to Nature Theory" have formed a cros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alogue in ecological education philosophy. The educational mechanism of "self-reliance" proposed by Laozi and the educational model of "natural state" constructed by Rousseau jointly completed the dual paradigm revolution. One is to deconstruct the anthropocentric educational paradigm and achieve an epistemological shift from disciplinary education to ecological orientation; Secondly, reconstruct the educational value coordinates of "coexistence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reveal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living organisms in the ecosystem through phenomenological restoration methods. The two paths lead to the triple cultivation goal of ecological ethics consciousness, which is to cultivate intersubjective cognitive ability, construct ecological niche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and achieve the ontological realm of coexistence between things and themselves.

Key Words: Laozi; Rousseau; Naturalism; Educational ideals

1. 哲学的根基：自然观的分野与交汇

1.1. 老子的“天人共生”哲学

老子的“天人共生”哲学, 根植于“道法自然”的宇宙论, 构建了“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层级关系, 主张以“无为”的实践智慧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 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这一思想的出现并非空中楼阁, 而是深刻回应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

- 52 -

基金项目: 无

作者简介: 聂慧(1992-), 女, 四川成都, 研究生, 中学二级, 研究方向: 教育、英语教学

通讯作者: 聂慧, 通讯邮箱: bubu809@163.com

www.shiharr.com

实,针对当时过度人为干预导致的社会失序,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绝圣弃智”的批判,呼吁回归自然之道的本真状态^[1]。在此哲学框架下,教育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即以自然为最高法则,通过“复归于婴儿”的返璞归真,以及“虚静”“寡欲”的内在修养,引导个体摆脱后天习染,回归生命本真,最终实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2]。

1.2. 卢梭的“人性复归”理论

卢梭的“人性复归”理论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建构了一套批判文明异化的教育哲学体系。在理论内核上,卢梭通过“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的辩证关系揭示人性本质的双重性。一方面,他认为人性本善,自然状态下的人具备自爱心、同情心与自我完善能力,这些天赋禀性构成道德的基础;另一方面,文明社会的私有制与阶级分化导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性的堕落源于理性对情感的僭越与社会制度的扭曲。这一思想诞生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矛盾语境中,既受理性主义思潮影响,又对工业化进程中人的工具化与宗教权威的虚伪性进行尖锐批判。卢梭指出,机械生产催生的物欲膨胀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原生纽带,而等级制度则异化了人际关系的纯真性。为了拯救被文明遮蔽的人性,卢梭提出了“消极教育”的原则,即教育者应避免用既定规范束缚儿童,转而依托自然环境中的自由探索,使个体在经验积累中唤醒内在良知。同时,社会实践被赋予调和“自然人”与“社会人”冲突的功能,通过参与协作劳动与公共生活,儿童逐步将自爱心升华为对他者的共情,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锤炼自我完善能力。这种教育路径既是对封建教条的反叛,亦是对启蒙理性的修正,其终极目标是通过“归于自然”的教育,使人在社会契约框架下重建自由与道德的同一性,实现从“野蛮人”到“道德公民”的辩证复归。

1.3. 两种哲学根基异同

老子与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想虽同以“回归本真”为旨归,却在哲学逻辑与实践路径上呈现深刻分野。一方面,共性层面,二者均以批判文明异化为起点,老子斥责礼乐教化对“道”的背离,卢梭控诉私有制对人性之善的腐蚀,共同主张教育应该剥离社会附加的虚饰,复归自然状态。另一方面,差异维度体现为三重张力,第一本体论分歧,老子将“自然”抽象为统摄万物的至高法则,即“道法自然”强调人通过“无为”消解主体性以融入天地秩序;卢梭则将“自然”具象化为人的先天禀赋,即“自然状态”主张通过社会契约重构主体自由,在文明框架中实现人性升华。第二方法论对立,老子以“绝圣弃智”的减法哲学,通过“虚静”“寡欲”消除欲望与知识的干扰;卢梭则以“消极教育”的渐进策略,借助自由探索与社会协作激发内在良知。第三价值指向差异,老子的“天人共生”追求倒退式乌托邦,试图回归“小国寡民”的原始和谐;卢梭的“人性复归”则指向进步性理想国,试图在民主契约中调和个体自由与公共意志。这种差异本质上映射了东方“天人合一”的整体论与西方“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哲学传统的深刻碰撞,二者共同构成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双重镜像,为当代教育平衡生态伦理与人性解放提供了辩证启示。

2. 教育方法论：无为自化与消极教育的实践路径

2.1. 老子的“无为自化”

老子的“无为自化”蕴含深刻的教育智慧,其核心在于反对灌输式教化,主张“行不言之教”。这一理念认为,教育不应是强制性的灌输,而应是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引导个体自我觉醒与成长。《庄子》中“庖丁解牛”的隐喻生动诠释了这一思想,庖丁顺应牛的自然结构,以无为之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启示教育者应尊重受教育者的内在规律,而非生硬干预。同时,在实践层面,汉代黄老之学中的“耕读传家”是“无为自化”的生动例证,强调劳作与修身的自然统一,通过亲身体验与实践,实现知识与品德的自然积累与升华,体现了教育与生活的有机融合。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培养了个体的生存技能,更促成了其道德修养的自然而然养成,彰显了“无为自化”在教育实践中的深远意义。

2.2. 卢梭的“消极教育”

卢梭的“消极教育”理论以“自然善性论”为哲学基底,建构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教育实践范

式。此观点的核心策略在于“否定性干预”，教育者并非主动传授既定知识，而是通过创设自然情境，使儿童在感官体验与问题解决中自主完成“主体性觉醒”，比如体现在《爱弥儿》中远离城市的乡村生活^[3]。这种“不教之教”颠覆了传统教育的规训逻辑，爱弥儿通过观察星辰轨迹理解天文，借助栽种植物习得生命规律，正是卢梭所言“让事物自然教育人”的具象化表达。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教学法”基于此基础，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念的实践维度，通过触摸岩石纹理认知地质结构，借助植物生长周期理解时间概念，将抽象知识转化为具身体验，本质上是对“消极教育”方法论的科学化延伸。卢梭的理论本质上是一场教育权力的让渡革命，将知识权威从教师转向自然客体与儿童主体，在延缓理性干预的同时，通过“有准备的自由环境”激发内在认知动力，既规避了过早社会化带来的天性扭曲，又为“自我完善能力”的发展保留了弹性空间。这种辩证的“消极”实为更高维度的“积极”，为现代教育中“脚手架理论”与“发现式学习”提供了启蒙时代的先声。

2.3. 两种教育方法论异同

老子的“无为自化”与卢梭的“消极教育”展现出教育哲学与行动逻辑的深层对话，其共性根植于对具身认知的共同追求，差异则体现为东西方教育传统的路径分野。两者均突破了传统教化的符号化桎梏，庖丁解牛的技艺习得并非通过语言指令的线性传递，而是在解构牛体筋骨的实践过程中，通过身体与客体的直接对话形成肌肉记忆与直觉认知^[4]；爱弥儿观察星辰轨迹的活动，亦非依赖天文教科书的抽象灌输，而是让儿童在仰观天象的具身体验中，经由视觉、触觉、空间知觉的多维互动建构宇宙认知。这种“做中学”的共性，在汉代耕读传统与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教学中得到更具象的印证，前者通过耕作与诵读的时空交织，使农耕技艺与经史智慧在劳作场域中自然渗透；后者则借助岩石纹理的触摸、植物生长的观察，将地质学与生物学知识锚定于感官经验的原始积累。然而，两者在方法实践层面依然有鲜明的对照，老子的“无为”要求教育者彻底消隐主体性，如同庖丁解牛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忘我状态，教育过程完全交由自然法则主导，教师仅作为“道法自然”的见证者存在；卢梭的“消极”实为精心设计的积极建构，其“有准备的自由环境”需要教育者像园丁培育幼苗般，既要提供适切的认知土壤，又要预设引导性的教育契机。这种分野折射出东西方教育传统的哲学差异，道家实践强调“大巧若拙”的浑然天成，追求教育行为与自然节律的同频共振；卢梭体系则暗含启蒙运动的理性规划，通过环境工程实现人性发展的可控性。这种差异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前者为现代教育提供了去功利化的价值参照，后者则开创了情境化学习的科学范式，共同构成当代实践教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3. 社会理想：小国寡民与道德理想国的终极愿景

3.1. 老子的“小国寡民”

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蕴含着独特的治理逻辑与教育哲学，其核心在于通过“无为而治”构建去阶级化的自然秩序，并以隐性教化维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首先，从治理逻辑层面，《道德经》第八十章描绘的“小国寡民”并非对现实政治的简单规训，而是一种对理想社会的哲学建构。老子主张“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否定技术文明对人性本真的异化，通过“重死而不远徙”的生存哲学，将社会关系锚定于血缘与地缘的天然纽带。这种“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与卢梭“消极教育”中“有准备的自由环境”形成跨时空呼应，但是老子更强调对文明进程的主动节制，比如舟舆、甲兵等工具性存在被悬置于生活场域之外，以维持“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和谐。其次在教育维度层面，“小国寡民”的教育角色体现为隐性教化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统治者通过“处无为之事”实现社会治理的教育功能，其“行不言之教”的实践智慧，与汉代“耕读传家”传统中劳作与修身的自然统一异曲同工。当教育者退隐为自然进程的旁观者，社会制度本身即成为教化载体，正如结绳记事的原始符号系统，在重复性实践中悄然塑造着个体的认知模式与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这种教化逻辑深刻嵌入日常生活场域，“甘其食，美其服”的生存满足感，实质是通过对物质欲望的自然节制，完成对个体精神世界的隐性规训。相较于卢梭通过精心设计的自然情境激发认知动力，老子的教育哲学更趋近于道家“大巧若拙”的智慧，在消解教育痕迹的过程中实现教化目的。总之，这种治理与教育的同构性，本质是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实践展开。当社会规模被限定于“小国寡民”的物理边界，人际关系的亲缘化与生存方式的自足性，共同构成了抵制文明异化的天然屏障。教育不再作为独立的社会子系统，

而是溶解于生产劳动、风俗礼仪等日常实践，通过代际传递的“默会知识”维系文化基因。在全球化与技术文明高歌猛进的今天，“小国寡民”的隐喻价值愈发凸显，它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教育革新，或许始于对技术崇拜与扩张冲动的深刻反思。

3.2. 卢梭的“道德理想国”

卢梭的“道德理想国”以《社会契约论》为政治哲学基石，构建了通过公意实现自由与平等统一的治理范式，其教育维度则成为维系共同体伦理的生命线^[5]。首先，基于治理逻辑层面，卢梭主张通过社会契约将个体权利让渡给共同体，形成超越个人意志的“公意”，这一公意并非简单的民意集合，而是全体公民基于共同利益与道德追求形成的理性共识。在“道德理想国”中，公民通过服从公意实现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脱离社会的放任，而是在遵守共同体法则下的自律，从而达成自由与平等的辩证统一。公意作为最高权威，确保法律与政策符合公共利益，使国家成为道德与正义的化身。其次，在教育角色方面，卢梭认为公民教育是维系“道德理想国”的核心机制，教育在此框架中被赋予了双重的使命，既是公民身份的塑造机制，亦是公意再生产的文化装置。卢梭借鉴斯巴达教育中集体主义训练模式，强调通过系统的教育实践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与道德品格。公民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与责任感，使公民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紧密结合，自愿服从公意的指引。通过仪式化的集体活动、公共责任的实践参与，公民在教育过程中逐渐内化共同体的价值规范，最终成长为兼具自由意志与奉献精神理想公民，为“道德理想国”的存续与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与人力保障。总之，基于这样的教育，公民能够在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个人价值与集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从而构建一个自由与平等兼备的理想社会。

3.3. 两种社会模型比较

老子和卢梭的社会模型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都试图通过教育构建理想社会，抵制权力集中。然而，二者在具体构想上呈现出明显的对立性。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社会模型可被视为一种“倒退式乌托邦”，其理想指向回归原始氏族公社的自然和谐状态。其主张“无为而治”，反对复杂的政治结构和过度文明，认为这些是导致社会矛盾的根源。老子倡导通过教育引导人们回归简朴生活，减少欲望和竞争，从而实现社会的自然秩序和内在稳定。这种模型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追求一种没有阶级分化和权力集中的原始平等。相对而言，卢梭的“道德理想国”则是一种“进步式乌托邦”，指向民主共和的现代政治方向。其提出通过社会契约形成“公意”，使每个公民在共同体内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在这一模型中，教育扮演着塑造公民公共精神的角色，着重培养集体主义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正如斯巴达教育中的集体主义训练所示。卢梭强调通过制度设计和公民教育推动社会进步，以建立一个基于理性、平等和公共利益的民主社会^[6]。总的来说，这种对立反映了二人对社会发展的不同理解，老子试图通过回归原始自然状态来恢复社会的和谐与平等，而卢梭则试图通过制度创新和公民教育来构建一个更公正、更民主的现代社会。老子的模型是对文明进程的反思和否定，追求一种静态的、无为的平衡；卢梭的模型则是对文明的改进和升华，追求一种动态的、参与式的社会进步。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也为后世提供了关于社会理想和教育目标的多元思考。

4. 现代性批判：对当代教育的双重启示

4.1. 生态教育：天人共生的现代重构

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学内核在当代生态教育的实践场域中实现创新性转化，其核心指向在于通过具身化的自然体验，重构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共生性认知框架。例如，德国“森林学校”作为典型范式，将教育场域从制度化空间拓展至原生森林生态系统，儿童以自然元素为动态“课程载体”，在攀爬古树、追踪昆虫迁徙、记录季节物候等沉浸式活动中，建立对自然过程的具身理解。这种去结构化的教育模式不仅提升儿童的环境感知能力，更是通过长期的自然交互，使生态伦理从外在规范内化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契合老子“不言之教”的深层智慧^[7]。日本“里山教育”则进一步将生态教育嵌入地域文化脉络，如新潟县星峠梯田的“与雪共生”实践，当地农民借助豪雪带来的独特微气候种植越光米，在维持梯田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形成应对自然灾害的生态智

慧。教育者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冬季清雪、春季育苗等农事活动，使其在具体劳作中理解“灾害即资源”的辩证逻辑，实现老子“辅万物之自然”哲学的在地化诠释。此类实践突破传统环境教育的知识传递模式，转向“自然——文化”双重维度的协同建构。中国西峡县回车镇中心学校的《生态道德教育》课程开发，展现了这一理念的现代转化路径，通过设计碳排放模拟实验、开展社区碳足迹调研等项目式学习，将抽象的生态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行动。这种融合传统哲学智慧与科学方法论的教育范式，既延续了老子“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又通过结构化的课程设计实现生态意识的系统性培育，为全球化生态危机背景下的教育革新提供了“传统智慧——现代性”的对话范本。

4.2. 个性化教育：人性复归的实践困境

卢梭“消极教育”理论在当代个性化教育实践中持续引发深刻思辨，其核心矛盾聚焦于尊重儿童天性的自由探索与社会规训需求之间的张力。这一理论主张减少外界过早干预，让儿童在自然环境中自主发展，但在工业化、标准化的现代教育体系下，实践落地面临重重挑战。比如，芬兰“无标准化考试”模式是践行卢梭理念的典型尝试。其通过取消统一测评机制，赋予学生自主选择学习路径的权利，旨在打破功利主义对教育的桎梏，释放儿童的创造力与学习热情。然而，该模式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教育资源的配置提出了极高要求，倘若缺乏系统性的支持与引导，学生可能因过度自由而陷入学习目标模糊、知识体系碎片化的“低效自由”困境，难以达成预期的教育效果。蒙台梭利教育法则以“有准备的环境”为基石，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具与自主任务，激发儿童的内在学习动力。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争议，其对教师隐性控制能力的高要求，即从环境创设到行为观察的全方位把控，在保障学习秩序与目标导向的同时，可能在无形中限制儿童个性化发展的空间。这些实践困境深刻折射出卢梭理论的现代性矛盾。一方面，工业化教育体系对效率与标准化的追求，严重挤压了个性化教育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若过度强调自由，又可能导致个体社会协作能力的缺失，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在此情况下，德国的学前教育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通过宪法禁止学前教育过早开发智力，守护儿童的自然天性，同时借助森林幼儿园的集体活动，培养儿童的领导力与责任感，在“自由探索”与“社群融入”之间寻求到了动态平衡，为化解卢梭理论在当代教育中的矛盾提供了实践启示。

4.3. 融合路径：自然——人文协同框架的构建

构建“自然——人文”协同的教育框架，需要实现道家智慧与卢梭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首先，理论层面，老子“无为”思想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方法论，即“循理而举事”的实践智慧，要求教育干预须契合个体认知节律^[8]。比如，中国“双减政策”通过削减机械作业释放自主空间，恰是“道法自然”的制度回应。其次，实践层面，卢梭“积极自由”理论则提供社会化的实现路径，其“公意”概念可转化为项目制学习中的协作机制，使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中完成自然权利与社会责任的辩证统一^[9]。比如，日本里山倡议的“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模式达成了实践创新突破学科壁垒，实现了在地化与跨学科的融合。个性化教育领域可探索的“森林科创营”等混合模式，将德国森林学校的自然体验与芬兰 PBL 的探究式学习结合，在可再生能源项目设计中培育批判性思维与生态伦理。最后，制度层面，制度保障需构建多维支持体系，评价改革应突破工具理性。比如，采用“生态素养档案”记录学生在自然观察、社会实践中的具身认知发展，家校社协同则需建立资源整合机制，如西峡县劳动教育联盟联动农场、非遗传承人，形成“学——思——践——悟”的完整教育链条。这种协同框架既守护教育的人文根基，又回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需求，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东方智慧与西方理性的对话平台。

5. 结语：自然主义教育的跨文明对话与未来范式

老子与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在东西方文明的长河中激荡出迥异却互补的智慧浪花，为当代教育提供了双重镜鉴。从东方“天人共生”的生态整体性视角出发，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将教育视为自然法则的隐性延展，主张通过“无为自化”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其“复归于婴儿”的理念不仅是对个体本真的呼唤，更是对生态共同体命运的深刻关切，老子的思想在当代生态教育中找到了实践支点，警示人类须以谦卑姿态重归自然秩序。而卢梭的“人性复归”理论，则从西方启蒙理性中提炼出个体解放的命题，通过“消极教育”与“社会契约”的辩证，

试图在文明框架内调和自由与责任的冲突，彰显了“自然人”理念的现代生命力，赋予了教育以“唤醒主体性”的使命，使个体在自由探索中实现自我完善^[10]。

二者的思想张力，本质是“整体性”与“主体性”、“自然伦理”与“人文理性”的辩证碰撞。面对全球化与生态危机的双重挑战，这种碰撞恰恰为教育范式的革新提供了契机，若将老子的“天人共生”作为价值基底，以卢梭的“人性复归”为实践路径，或可构建一种“自然——人文”协同的教育生态。例如，中国“双减政策”在削减功利性干预，即“无为”的同时，引入项目制学习激发创造性，即所谓的“积极自由”，正是二者融合的初步尝试。

对于未来教育的终极目标，或许在于超越“放任”与“规训”、“复古”与“进步”的二元对立，在跨文明对话中开辟第三条道路，既依托东方智慧维系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又借助西方理性释放个体的创造潜能。唯有如此，教育才能真正成为“生命的诗学”，让每个灵魂如草木般依自然之道自由生长，同时以根系深扎人类文明的土壤，在天地之间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天人新约”。

参考文献：

- [1] 老子.道德经【M】.上海：上海书店，1987.
- [2] 杨润根.发现老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3] 【法】卢梭.李平沅译.爱弥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4] 詹剑锋.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
- [5] 【法】卢梭.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6] 【法】卢梭.黎星、范希衡译.忏悔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7] 蒙培元.“道”的境界——老子哲学的深层意蕴【J】.中国社会科学，1996：（1）
- [8] 任遂虎.道法自然与教育生态【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27
- [9] 康子兴.立法者与公民的复调——一位社会学家眼中的卢梭【J】.社会，2014.
- [10] 那薇.圣人在于寻常——道家的圣人在世与海德格尔的诸神在场【J】.社会科学战线 2003（2）

媒介融合时代建构数字原住民的多元读写能力探究

王璐莹^{1*}

(¹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人类读写方式是伴随着主导媒介的变革而发展变化的。不同的媒介发展阶段规定和塑造着人类读写的目标、内容、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等, 使人类读写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特征, 人类读写能力也不断随着媒介演变而进化发展。在数字化时代, 新旧媒介交织融合, 数字原住民需通过不断地调适, 一方面适应新媒介的要求, 发展多元读写能力, 一方面规避媒介潜在的负面作用, 做出理性的判断与取舍, 促进读写能力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媒介演变; 多元读写; 媒介融合

Media Evolution and Human Reading - Writing: An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ng Digital Natives' Multiple Reading - Writing Abilities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Wang Luying^{1*}

(¹College of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mode of human reading and writing evolves in tandem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ominant medium. Different stages of media development prescribe and mold the goals, contents, thinking pattern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human reading and writing, giving rise to distinct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reading and writing in various eras. Simultaneously, human reading and writing capabilities also continuously progress and evolve in line with the media evolution. In the digital era, where new and old media interweave and merge, digital natives need to continuously adapt. On the one hand, they sh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media and develop multiple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ust evade the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media, make rational judgments and trade-offs,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and writing capabilities.

Key words: Media evolution; Human reading and writing; Multiple literacies; Media convergence.

引言

互联网的兴起引起了媒介领域的又一次变革。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 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受技术进步和人们需求的双重影响, 媒介开始走向融合^[1]。在媒介融合时代, 人们可以通过报纸、电视、电脑、手机等多种终端完成信息的接收。多媒介的融合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对人们的读写能力提出了挑战, 尤其对在数字时代出生成长的“数字原住民”。“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2]是教育游戏专家 Marc Prensky 于 2001 年首次提出的, 指的

- 58 -

基金项目: 无

作者简介: 王璐莹 (2002-), 女,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硕士, 研究方向: 教育数字化、比较教育

通讯作者: 王璐莹 邮箱: 2114692009@qq.com

是在互联网时代出生或成长起来的一代人^[3]。当读写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字和纸张,而是扩展到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时,如何培养“数字原住民”的多元读写能力,便成为了我们亟需思考的议题。

在既有研究中,媒介形态与读写能力的共生关系始终是传播学与教育学交叉领域的重要命题。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奠定了媒介环境学派的认知范式^[4],其后续学者如波兹曼对电视媒介的批判^[5]、莱文森的媒介补偿理论^[6],构成了理解媒介技术演进逻辑的基础框架。随着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新伦敦小组提出的“多元读写”(Multiliteracies)概念引发学界对多模态文本解读能力的关注^[7],詹金斯的“融合文化”理论则揭示了新媒体环境下参与式文化的特质^[8]。国内学者彭兰提出的“数字化生存”研究框架,进一步将媒介素养讨论延伸至移动互联网场景^[9]。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些许局限:一方面,针对数字原住民代际特征的教育适配性研究较少;另一方面,跨媒介读写能力的评价体系与培养策略尚未形成共识。鉴于此,本文首先厘清“媒介即讯息”的理论基础,再依次梳理不同时代媒介演变对人类读写产生的影响,力图通过审慎地分析得出对多元读写更为科学、理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探讨建构多元读写能力的有效策略。

1. 媒介演变历程与读写能力进阶

媒介的更新导致意义的多样化,在人类读写领域,人们需要更新读写方式,使用新的媒介来理解和表达意义。因此,不同的媒介形式对人类的读写能力产生影响。

1.1. 口语媒介:塑造记忆方式

口语媒介是人类最初的语言交流方式,也是其他媒介的根基。人们以语音符号作为交流和记录的符号体系,通过口语交流来习得语言,包括词汇、语法和发音等^[10]。在口语媒介时代,由于口语“随说随逝”^[11],因此需要交流双方同时在场进行近距离交流。此时,信息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都需要依靠人的记忆进行,因此,口语媒介对人类读写能力的影响集中在记忆方面^[12]。

1.2. 文字媒介:促进思维发展

口语媒介具有信息和知识不易保存的特性,文字媒介的出现很好地回应了这一弊端。人们以文字、字母作为交流的符号,将文字记录在龟甲、纸草上,使信息和知识以外化、具体化的形式保存下来^[13]。文字媒介的出现有利有弊,利处在于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记录,让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弊处则在于记录文字的龟甲、纸草来之不易,知识记录的成本高,并且古代只有贵族、僧侣等少部分人才可以学习文字,因此造成了信息和知识的垄断。

1.3. 印刷媒介:变革思维模式

文字媒介负载受限和遭受垄断的问题到印刷媒介出现得到了解决。印刷媒介,如书籍、报纸和杂志等,通过印刷技术将文字、图像等信息固定在纸张等载体上,使得信息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印刷媒介的出现不仅打破了知识垄断,还降低了传播成本,促进了知识普及^[14]。

1.4. 电子媒介:双重影响读写

电子媒介的兴起始于电报的产生,代表性的电子媒介包括电报、留声机、广播、电视、电影、早期计算机等。电子媒介使信息通过电信号传输、以音像的形式呈现,让远隔千里的人们得以交流,世界以“地球村”^[15]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电子媒介具有传播速度更快、效率更高、范围更广的特点。但是,也具有一些弊端,例如传播的单向性和反馈的延时性^[16]。

1.5. 数字媒介:推动数字读写

互联网的兴起标志着媒介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数字媒介时代。数字媒介^[17]是依托计算机、互联网及通信技术,实现传播与互动的媒介的总和,包括原生型数字媒介(例如手机、电脑)和升级型数字媒介(例如数字期刊、数字图书馆)。

数字媒介对人类读写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数字读写能力,即以数字媒介为依托进行的阅读与写作^[18],并在数字读写过程中,解决数字文本问题时展现出的数字素养。欧盟将数字素养分为“信

息与数据”、“交流与协作”、“创建数字内容”、“数字安全”、“解决数字问题”等。而数字素养又细分了不同能力构成,以“信息和数据”为例,包括查找检索信息,判断筛选信息,存储管理信息和组织分析信息几项能力^[19]。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到“旧媒介的形式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媒介的演变是动态的,因而数字媒介实际上包含了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所有媒介形式,是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形式与内容的集合,并且当下各种媒介趋于融合,例如,一部手机就几乎融合了所有媒介的功能。在这样媒介融合的时代,数字原住民所需的读写能力不断变化扩展,不仅需要传统的书面文字读写能力,还需要适应时代需要的数字读写能力、批判思维能力等等。因此,培养数字原住民的多元读写能力势在必行。

2. 媒介融合时代多元读写能力的内涵阐释

媒介融合打破了传统媒介之间的界限,使得信息在多种媒介之间自由流动,意义的表达和解读也日趋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文字读写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读写形式,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媒介进行读写活动。这就要求人们具备更加综合、全面的读写技能,即多元读写能力。

多元读写能力^[20]是指个体在阅读、写作及交流过程中,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模态(如语言、视觉、听觉等)及符号系统(如文字、图像、声音等)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这一能力不仅涵盖了传统的语言读写技能,还涉及对多种信息来源的解读、整合与创造。多元读写能力最早是由新伦敦小组(New London Group)提出的,主要对读写的教学方法提出可行性的假设,并对读写教学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探讨^[21]。对于多元读写能力的构成,国外学者认为包括语言、视觉、听觉、姿态和空间成分等^[22]。这些成分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读写能力体系。

3. 媒介融合时代数字原住民多元读写能力的建构的思考

当我们聚焦于“数字原住民”这一自小便与数字技术共生共长的群体时,如何在成长轨迹中有效建构并提升其多元读写能力,便成为了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题。

3.1. 读写目标上:警惕后视镜思维,明确多元读写目标

在媒介融合时代,多元读写能力已成为个人适应社会发展、有效获取并处理信息的关键技能。然而,在培养这种能力的过程中,仍存在“后视镜思维”^[23]现象。麦克卢汉提出“后视镜思维”指在新旧环境转变过程中,人们往往用旧环境中所形成的思维来思考新环境中所面对的问题。

数字原住民伴随着互联网出生成长,对数据信息的往往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但教育者受年龄、认识限制,易受到“后视镜思维”的干扰^[24]。具体表现在教育者仍然沉浸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中,忽视了人工智能、5G等多元化媒介的兴起和融合趋势,从而未能及时调整读写技能的教学策略。当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固守单一的读写教学模式将严重限制学习者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此外,教育者需明确的是,无论新旧媒介,都是学习获取知识的手段,不应被媒介新旧之争所裹挟,多元读写能力的目标在于让学习者具备媒介融合时代从容获取知识的能力。

3.2. 读写方法上:警惕旧瓶装新酒,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虽然许多教学实践致力于落实人工智能等新兴媒介的运用,但很多情况下,教育者往往趋向于媒介与教学内容的表面结合,如使用一些与课程表面相关的视频、图像等多媒体手段,以达到“丰富”教学效果的成效。这种“形式主义”非但没有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原则,反而徒增了学习者的认知负荷。培育数字原住民的多元读写能力,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采用项目式教学方法,提升综合能力。项目式学教学一种以项目为驱动的教学方式,通过完成一个具体的项目来培养学习者的多元读写技能。在项目式教学中,学习者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媒介进行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分析,并最终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其次,寓教于乐,激发学习兴趣。澳大利亚与乐高基金会和乌克兰教育研究协会在乌克兰学校开展的“寓教于乐”研究表明,一个引人入胜的、有趣的学习环境可以提升学习者的识字、社交和情感技能。在这项为期4年的研究中,乌克兰教

师接受了游戏教学培训，通过利用实物材料、进行团队学习、增加不同感官的体验活动等策略，将游戏纳入早教课堂。最后，开展“数字扫盲”，提升数字素养。2023 年国际扫盲日的主题是“促进转型期世界的扫盲：为可持续与和平的社会奠定基础”。这就启示教育者需要关注“促进包容、福祉、社区和公民的多种形式的扫盲”，让数字原住民更好地为他们的未来做准备。其中，尤其要重视“数字扫盲”，将其融入到课程教学实践中，以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从而推进教育系统向数字化未来过渡。

3.3. 读写主体上：避免单一主体，多元形成合力

传统读写能力培养的主体主要是教育者和学习者两大主体，多元读写能力培养的主体在角色和职责上可能更加复杂和多元化。2024 年，爱尔兰颁布《爱尔兰 2024-2033 年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数字素养战略：从出生到成年早期的每一位学习者》^[25]强调多个主体，例如家长、社区、早教工作者、保育员、教师等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聚焦教师、早教工作者和保育员等专业教育者。信息时代，儿童往往过早地接触到互联网世界，因此多元读写能力需要从幼儿阶段进行培养，教育者应提供个性化学习指导，有效激发并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其次，家长与社区应积极参与学习者多元读写能力的培养。家长作为第一任教师，在学习者多元读写能力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家校合作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儿童成长并为其未来学习奠定基础。正如 ACER 提到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需要更好地在技术应用和读写能力发展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最好是从孩子出生时就开始采取措施。”社区作为提升学习者多元读写能力的社会力量，也要深度参与和支持学习者读写能力的发展^[26]。再次，宏观来看，早期的学习机构、保育机构和学校领导部门应积极响应，协调课程设置、教学设计和评估实践，使多元读写能力培养有效嵌入学习者的学习体验。最后，学习者积极挖掘自身潜能。数字原住民自对互联网较为熟悉，因此，应积极利用数字工具进行读写练习、参与数字化环境下的交流活动等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多元读写能力。

3.4. 读写评价：切忌单一评价，丰富评价方式

读写评价既要适应媒介环境的变化，又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读写评价质量。首先，评价方式多样化。传统的评价内容往往以课本为主，忽略了其他资源的利用。在媒介融合时代，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上的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源，设计出更加生动、有趣的读写任务。例如，可以让学生利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创意设计，以考察学生的多媒体读写能力。其次，评价方式智能化。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例如，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学生的作文进行自动评分和反馈，提高评价的效率和准确性。再次，关注过程性评价。例如，可以记录学生在创作过程中的思考、讨论和修改过程，以评估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强调跨学科评价。媒介融合时代下的多元读写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在评价时应强调跨学科评价，以考察学生在不同学科领域内的读写能力。例如，在评价学生的多媒体作品时，可以关注他们在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文学创作等多个方面的表现。

4. 结语

数字媒介在重构知识传播范式的同时，确与深度阅读形成认知悖论。其实实时性虽提升了信息获取效率，却可能通过增加工作记忆负荷，削弱系统性认知加工。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阅读障碍、多元化学习者和社会公平中心（Center for Dyslexia, Diverse Learners, and Social Justice）的主任玫莉安·沃尔夫（Maryanne Wolf）博士表示，三十年前 60% 的儿童每周都会进行阅读，而如今只有 12-15% 的孩子会每周都读书^[27]。尽管学生们仍然在从数字设备中获取知识，但在阅读实体书时所获得的深度感受是今天的学生所缺少的。数字媒介以其碎片化、即时化的特点，让人们习惯于快速浏览与浅尝辄止，深度阅读则逐渐被边缘化。长此以往，不仅可能导致思维的肤浅与碎片化，更可能让人类失去对深刻事物的感知理解能力。因此，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我们不仅要拥抱技术带来的便利，更要培养起多元读写的能力，学会在纷繁复杂的媒介环境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深度的思考与解读，既不盲目崇拜技术，也不一概排斥，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让媒介技术成为提升读写能力的助力。

参考文献:

- [1] [美]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 [M]. 章艳, 吴燕莲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2] ACER. Beyond reading and writing: reframing literacy [EB/OL]. (2023-09-08)[2023-09-29]. <https://www.acer.org/au/discover/article/beyond-reading-and-writing-reframing-literacy>.
- [3] E School News. How technology impacts literacy [EB/OL]. [2021-12-23]. [2021-12-02]. <https://www.eschoolnews.com/2021/12/23/how-technology-impacts-literacy>.
- [4] Gentle, P., Knight, S., & Corrigan, K. (2006). Multiliteracies: New literacies, new learning. *Pedagogy, Culture & Society*, 24(5), 587-603.
- [5]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21.
- [6] Prensky M.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art 1 [J]. *On the Horizon*, 2001, 9(5): 1-6.
- [7] Vuorikari R, Kluzer S, Punie Y. Dig Comp 2.2: The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Citizens - With new examples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R].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
- [8] 郭文革:《媒介技术:一种“长时段”的教育史研究框架》,《教育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
- [9] 黄金艳.媒介融合态势下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研究[D].兰州大学,2017.
- [10] 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7.
- [11] 李戈锐.爱尔兰发布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数字素养培养战略,探讨——如何培养学习者的数字素养[N].中国教育报,2024-09-05(09)
- [12] 李巧针,赵梦园.媒介变迁与高等教育:塑造与调适[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9):165-168.
- [13] 刘迪,荣维东.数字读写: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新内容[J].中小学数字化教学,2023,(10):27-30.
- [14] 马赛,靳光洒,孙培健.手势与工作记忆视角下的二语口语表现研究[J].现代外语,2022,45(02):232-244.
- [15]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55周年增订本)[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61-60
- [16] 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莲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211页.
- [17] 苏涛,彭兰.技术与人文:疫情危机下的数字化生存反思——2020年新媒体研究述评[J].国际新闻界,2021,43(01):49-66.DOI:10.13495/j.cnki.cjjc.2021.01.003.
- [18] 汪润,靖鸣.媒介演进:截屏和截屏图片的人性化趋势与功能补偿——以保罗·莱文森媒介进化理论为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07):155-161.
- [19] 王朋.新读写研究与我国大学课程教学改革[J].教育探索,2016,(11):75-79.
- [20] 王亿尧.媒介融合时代大众类型文学的演变与发展[J].文化产业,2024,(28):82-84.
- [21] 夏红玉,李玉海,彭婷,等.数字原住民自我感知的信息素养能力与实际能力的差异调查[J].图书情报工作,2023,67(22):104-113.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3.22.011.
- [22] 杨玲.媒介、受众与权力:詹金斯的“融合文化”理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4(04):64-70.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1.04.015.
- [23] 殷乐,杨默涵.数字媒介生态下的情感传播:生成机制、关系性逻辑与行为实践[J/OL].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8][2024-10-29].<https://doi.org/10.16255/j.cnki.11-5117c.20240619.002>.
- [24] 张建桥.从“学媒之争”看媒介技术对学习的影响[J].比较教育研究,2024,46(08):34-44.DOI:10.20013/j.cnki.ICE.2024.08.04.
- [25] 赵德全,苏燕萍.“互联网+”智能时代高校学生英语多元读写能力培养模式探究[J].外语电化教学,2023,(06):91-95+118.DOI:10.20139/j.issn.1001-5795.20230614.
- [26] 周知,周赵鋈,张窈.认知失调背景下数字原住民网络谣言接受影响因素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4,47(03):138-148.DOI:10.16353/j.cnki.1000-7490.2024.03.018.
- [27] E School News. How technology impacts literacy [EB/OL]. [2021-12-23]. [2021-12-02]. <https://www.eschoolnews.com/2021/12/23/how-technology-impacts-literacy>.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逻辑困境与范式重构路径

张辉^{1*}

(^{1*}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 广东省 韶关市 512600)

摘要: 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是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辩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 对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逻辑困境与范式重构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认为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存在价值导向偏差、主体协同缺失、标准架构失衡及方法应用滞后等困境, 提出价值整合、主体协同、标准适配、方法革新等方式重构路径, 旨在提升学生职业体能与岗位适配, 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教学质量评价; 体育教学; 产教融合; 职业教育

The logical predicament and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Hui Zhang^{1*}

(^{1*} Guangdong Songshan Polytechnic College, Department of Public Courses Teaching, Shao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512600,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eval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qualit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inevitable way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is study employ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reasoning, and dialectical analysis to conduct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logical predicament and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evaluation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qualit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reform of the eval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qualit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beset with predicaments such as deviation in value orientation, lack of subject collaboration, imbalance in standard architecture, and lag in method application. It proposes reconstruction paths such as value integration, subject collaboration, standard adaptation, and method innovation, aiming to enhance students' voc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and job adaptabilit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引言

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是明确指引体育教育目标与职业教育育人方向的精准定位, 是衡量教学结果的重要标尺和综合表现, 是有效推动职业教育体育教学改革的首要动力。2025 年《教

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建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体育教学质量评价作为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必须深度迎合产教融合发展向度，创新契合职业岗位体能和素养需求的评价模式。然而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存在以传统的评价体育教学一般体能教学效果为主，缺乏对职业岗位和场景所需要的运动能力考量等问题。因此，本文在深入剖析产教融合与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耦合逻辑、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价值向度及逻辑困境基础上，提出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范式重构路径。

1. 产教融合与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耦合逻辑

1.1 产教融合的内涵审视

产教融合是一种教学方式与途径，是职业教育利益主体不同参与程度下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是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交融^[1]，其内涵是突破职业院校与企业的阻隔，实现产业前沿与职业教育教学目标、内容、方法与评价的有效融合，以满足市场精准人才需求。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不仅能有效检验体育教学在增强学生体质的效果，在社会适应、坚强意志力、勇于拼搏精神、团队意识及协作能力等职业素养的培养成效中具有独特的作用^[2]。而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职业素养的培育功能为产教融合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利于打破教学与企业简单资源共享，实现教育价值与产业价值的全面融合，达成职业教育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共创。

1.2 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功能转型

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是为验证体育教学培养优秀职业人的贡献，需要区别于普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功能，实现自身对体育教学职业体能培养效果转型，完成体育与职业的融合发展^[3]，不仅考量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健康属性，更要发展其职业属性^[4]。职业体能是指某些职业惯常性工作对从事者所要求的特殊身心素质与能力^[3]，具体包括承受能力、耐劳能力、适应能力、维持能力等。需要把握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指挥棒，促进体育教学内容与未来职业的体育锻炼、职业健康和安全深度融合。因此，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功能需要满足不同职业面向的职业体能需求，由评价体育教学的一般体能训练转向岗位适应性训练，注重职业心理的发展。

1.3 产教融合与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耦合逻辑

实现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首要任务是剖析产教融合与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耦合逻辑，本文从目标、内容和主体三重维度阐述二者的耦合逻辑。目标维度是指产业需求与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目标的动态匹配，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目标制定必须充分考虑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体能、心理素质及职业素养需求，确保培养的人才符合市场需要^[5]。内容维度是职业能力与体育教学培养成效的相互映射，职业体能是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对体育教学培养成效验证的必然选择，最能为培养优秀职业人才做出突出贡献^[3]。主体维度是职业教育不同利益主体的角色重构，开展好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需要处理好学生、企业、学校的关系^[6]，特别是体育教师与企业的关系，共同构建产教融合式的体育教学新生态。

2.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价值向度

2.1 目标转向：从短期工具考量到长期价值考量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目标从短期工具考量到长期价值考量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往往趋同与普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3]，过于注重短期体育教学体质与技能培养效果，以量化的体能数据衡量教学成果，忽视了职业教育对学生职业成长的特殊培养需求。长期价值考量必须服务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关注体育技能的掌握情况，着眼于学生的长期职业健康，包括抗压能力、团队协作、终身学习能力等。建立多元化的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深度融合体育教学和职业发展需求，为学生长期的职业健康护航。

2.2 功能拓展：由教学优化到教学产业双向反馈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核心功能在于教学优化到教学产业的双向反馈。以职业体能为导向，通过大数据等新型技术手段进行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是必然趋势。一方面，教学端依据大数据反馈评价结果，调整适应产业对职业人才特殊体能需求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达到教学优化。另一方面，产业根据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数据调整用人需求与岗位能力模型，打破教育与产业的壁垒，形成教学优化到教学产业的双向反馈，实现学校人才培养与产业用人需求的桥梁链接。

2.3 范式转型：自单边主导到学校产业协同评价

传统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主体具有较强的单一性，急需构建企业、学校、学生多元主体协同评价体系。企业作为人才需求端，应参与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制定，将职业岗位的体能、运动素养要求纳入评价指标体系，确保评价结果与企业需求紧密对接。学校是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核心，应加强企业对评价标准参与度，合理分配企业、学校、学生在评价权重的分配。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具有主动性，理应参与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但需避免过度评人化^[7]。多元主体协同评价体系能实现多维互补，提升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科学性，实现学生职业素养的强化。

3.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逻辑困境

3.1 价值逻辑困境：目标失位与功能缺失的双重矛盾

价值逻辑困境是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根源。过度张杨工具理性，忽视职业教育体育教学价值理性^[8]，引发目标失位与功能缺失的双重矛盾。目标维度，体质健康水平的高低是现阶段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重要导向^[9]，而企业更需求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职业素养，显然职业体能更符合企业的用人标准，二者目标的冲突致使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不匹配。功能维度，由于目标的脱节，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必然偏离职业导向，无法转化为课程改革的依据，更不能反馈到产业端，导致评价、体育教学优化、产业无法闭环，难以实现体育教学质量提升。

3.2 主体逻辑困境：单边错位与协同失衡的治理僵局

主体逻辑困境是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关键。当前，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下，不断提升学生在体育教学质量评价中的作用，忽视了学生有限理性和综合判断能力^[10]，出现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单边错位。学校凭借教育场域的垄断话语权，导致企业未能参与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制定，企业虽熟悉职业岗位需求的体能认知优势，但因缺乏参与通道，难以将产业标准融入到评价指标，使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流于泛化。企业、学校、学生无法产生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协同效应，严重影响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3.3 标准逻辑困境：普适体质与职业体能的架构失衡

标准逻辑困境是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核心。传统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评价以普适体质为基础，采用长跑、立定跳远等项目，侧重学生身体素质的共性考查，难以对接职业岗位要求。如酒店管理、中西面点管理等久坐型专业需要更强的腿部力量，而对于计算机、大数据应用等久坐型专业腿部力量可强可弱，强则更好^[3]。因此，一刀切的普适体质评价标准忽略了职业岗位要求，无法满足多元职业场域，未能针对不同领域的特殊需求分类制定，使得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不能服务职业能力培养，弱化产教融合实效与针对性。

3.4 方法逻辑困境：传统评价与数字化应用模式断层

方法逻辑困境是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技术瓶颈。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传统评价模式主要采用教师、学生主观评分等传统手段，存在数据采集效率较低、客观性差、评价维度单一等问题，难以促进学生体育能力与职业适应相匹配。同时，数字化评价模式虽具有实时监测、

多维分析等优势，但因缺乏符合职业教育数字化评价平台^[11]、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边缘化、教师技术应用能力欠缺等因素，未能有效融入体育教学实践中。传统评价与数字化应用模式断层，制约了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科学时效性，阻碍了职业教育体育教学与职业岗位需求的融合对接。

4.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范式重构路径

4.1 锚定价值整合指向，辨明目标校准与功能闭合的衔接路径

价值整合有利于消解目标目标失位与功能缺失的双重矛盾，实现教育与产业价值的融合统一。首先，构建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评价目标体系，以传统体育教学中的体质健康为评价基线，将企业需求的岗位适应性纳入评价指标，围绕职业技能、素养和创新能力等，创建多元目标框架。其次，形成评价-诊断-反馈-改进数据驱动机制^[12]，整合体育教学过程与企业实践数据，完成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诊断问题所在，实时反馈，有效改进体育教学过程，推动体育教学与企业需求动态适配，重塑产教融合下的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价值逻辑。

4.2 破解主体失衡障碍，科学设计校企多元共治的协同路径

校企协同是学校、学生、企业进行能量交换时，会产生相互作用和影响，自发形成一个新的、有序的结构^[12]。学校作为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主体协同的链接者，发挥自身体育教学质量评价作用的同时，分配好企业和学生在评价过程中的比重。企业深入生产实践，挖掘职业体能需求，对接学校体育教学，提出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职业素养指标。学生作为教育主体，以适合其理性和综合判断能力参与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校企三方协同，形成标准共定、过程共管、结果共享的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新生态。

4.3 创新标准适配架构，深化普适与职业体能的融合发展路径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适配需要深化普适与职业体能标准的融合发展。普适体能标准适用于学生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实现全民健康的必然保证，是职业体能标准制定的根基。一方面以普适体能为基础，融入职业体能元素，例如增设不同岗位场景的耐力项目，形成不同类别的评价指标，使学生锻炼职业所需的特殊身体素质。另一方面，结合行业发展和技术变革，不断更新职业体能标准，确保评价标准满足学生体质健康基础上，推动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全面复合化转变。

4.4 筑牢方法革新根基，提升数字化赋能评价的技术重构路径

数字化赋能是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必然趋势^[13]。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构建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平台，搭建评价主体交流渠道，实现体育教学过程的实时监测与精准评估，数字化技术整合体育教学过程、企业岗位需求和行业标准数据，形成多方位评价数据库，为后续评价指标优化，体育教学策略调整等提供科学依据。另外，通过长期及多维度数据追踪，充分反映学生职业体能发展轨迹，助力产教融合全面深入贯彻到职业教育的各个环节。

5.结论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对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的逻辑困境和范式重构路径进行探索和研究，有利于丰富体育教学体系评价；有利于深化产教融合进度；有利于提升学生职业竞争力。研究揭示了价值、主体、标准和方法逻辑困境，映射出当前职业教育体育教学与产业发展的脱节。通过价值整合、主体协同、标准适配、方法革新等不仅能优化职业教育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科学性，更能提升学生职业体能与岗位适配。未来，需持续完善产教协同机制，科学构建具有职业场景特色的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助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实现。

参考文献：

- [1] 王羽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向[J].职业技术教育,2025,46(10):52-58.

- [2] 吴宝全.基于体育素养和职业能力的高职体育教学探讨[J].山东社会科学,2016,(S1):325-327.
- [3] 毛振明,于丽,叶玲.职业体能有关理论及培养实践的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4,38(01):1-10.
- [4] 胡振浩.高职体育职业体能创新教学体系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07):972-973.
- [5] 王亚南,邵建东.产教融合视域的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模式及路径[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3,(02):140-145.
- [6] 雷沪,李万锦,金洪勇.产教融合视域下提高高职教学质量探析——基于“PDCA”循环管理法的应用[J].职业技术教育,2015,36(23):35-38.
- [7] 蒲毕文.评教还是评人: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学生评教有效性研究[J].体育学刊,2024,31(06):125-132.D
- [8] 李作章.课堂革命驱动下大学教学评价的价值背离与转向[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22(06):46-51.
- [9] 于素梅.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建立的难题及初步构想[J].体育学刊,2014,21(03):95-99.
- [10] 王寅谊.以学生为中心不代表由学生决定——基于高校学生评教的广义和狭义理解[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0,36(06):30-38+118.
- [11] 李铭,杨雯铃,邓森,等.职业教育教学评价数字化转型:技术逻辑、问题指向与实践路径[J].职教论坛,2025,41(03):65-72.
- [12] 檀慧玲,张涵.基于教育改进的教育监测评价的现实反思与路径优化[J].中国教育学刊,2024,(11):41-47.
- [13] 王祥林,杨晓红,杨凤翔.协同理论视阈下高职院校 TCDP 通识教育体系构建[J].职业技术教育,2022,43(17):6-11.

美育嵌入心育：高中美术课堂中绘画教学的路径探析

曾垂法^{1*}

(¹广东省汕尾市陆丰龙潭中学, 广东汕尾, 516500)

摘要：新课程改革下，大学科的融合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成了当今课程教学的焦点。本文围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使美育课程与心理课程相结合从而达到德育的目的，跨学科融合，达到双教学效果，从而拓宽了核心素养的路径。本文以高中美术课程中的绘画为例，将簸箕画教学中融入到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诉求表达中，高中美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挥以学生为主人的作用，通过美术实践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教学方式，借鉴美术鉴赏中的名画作品，采取临摹与改编，鼓励学生大胆自主创新，把内心真正感受通过美术实践表达出来，让学生释放学习压力与表达情感，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因此，在这种美术课堂教学路径中发现，学生可以将所遇到的学习压力和内心情感通过绘画表现出来，同时，学生的学科知识与迁移得到提高、学生的绘画技巧得到提升、发扬了本土优秀地域文化特色，从而学生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发展，有效的促进了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

关键词：高中美术；簸箕画；美育；心理健康教育；核心素养

The Integr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to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thways for Painting Instruction in High School Art Classrooms

Zeng Chuifa^{1*}

(¹Longtan Middle School, Lufeng City, Shanwei, Guangdong Province, 516500)

Abstract: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integration of major disciplines and the formation of core subject literacy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current curriculum teaching.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combining aesthetic education courses with psychological cours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oral education, achieving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achieving dual teaching effects, thereby broadening the path of core literacy. Taking the painting in high school art course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integrates the teaching of broomstick painting in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demand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High school art teachers play the role of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in classroom teaching activiti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art practice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y draw on famous paintings in art appreciation, adopt methods of copying and adaptation, encourage students to boldly innovate and create independently, and express their true inner feelings through art practice. This allows students to release their learning pressure and express their emotions, promoting the all-rou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in this art classroom teaching path, it is found that students can express the learning pressure and inner emotions they encounter through painting.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subject knowledge and transfer are improved, their painting skills are enhanc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excellent regional culture are carried forward. Thus, students inherit the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e,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core subject literacy.

Key words: High School art; Dustpan painting; Aesthetic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re literacy

1. 高中美术课堂中融合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在高中美术教学当中,教师切不能忽视的是,对绘画艺术的融会贯通,这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着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学生审美意识的培养和情感表达能力的培养,学生通过绘画表达内心世界,释放情感,排解压力,提升情感经营能力。其次,绘画艺术的融会贯通,能够促进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挥。通过艺术创作,学生可以拓展思维,培养创造性思维,激发学生对美、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与体验^[1]。学生可以通过主题的选择、色彩的搭配、画面的构图来体现自我认知能力与探索世界的意识。再次,绘画艺术是一种心流状态,可以通过绘画创作来疗愈,把现实生活压力和烦恼释放出来,缓解焦虑与抑郁情绪。绘画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工具,参与者可以通过作品来交流,增加感情互动与理解信任。此外,绘画艺术融会贯通,可以增强学生的专注力和耐受力,增强学生的心理韧性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细心和耐性,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绘画需要耐心和专注力,学生在创作过程中会不断调整,思考,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综上所述,绘画艺术的融合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心理素养。

2. 绘画艺术融合心理健康教育在高中美术中的优势分析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家张彦远云:“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2],中国近现代文学家鲁迅也提出:“美术可以辅以道德”^[3],由此可以看出美育与道德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的,说明绘画对人的文化思想、精神境界、道德品质、心理健康等都有教化的作用。心理健康教育在课堂上以美育人的同时,又可以体现德育的修养,也显示出重要的优点,三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美术重在动之以情,而德育则更倾向于晓之以理,只有晓情,才能理直气壮;只有理直气壮,才能利于绘画创作^[4]。《高中美术鉴赏内容》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是为了充分发挥绘画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促进作用,最终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来实现共育^[5]。

2.1. 激发绘画艺术的隐性功能,实现美育的“浸美润德”^[6]

簸箕画是色彩画中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材质特殊,艺术效果独特,绘画作品全部来自于现实生活,也是记录当下学生学习生活人文情怀的载体,更是提炼和表达生活之美、自然之美、社会之美,体现真善美的中华优良美德。簸箕画的教学内容以教材为本,通过艺术作品的鉴赏来引导,对学生的审美认识和审美判断来进行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几大维度。比如:通过梵高的《星空》为例,进行临摹与改编,让学生深入了解梵高背后的绘画故事以及对艺术追求和情感的表达,通过绘画的形式来表达情感以及追求艺术真理的热情。从绘画中感化学生,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来发挥自主创作能力,借鉴后印象派的艺术理念来实现隐性功能,从而表达学生的情感,重在发现美、体验美、感知美,来实现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图一《星空》

2.2. 丰富绘画内容，实现美育的“多样形式”

在高中美术教材中的必修和选修部分，都包含了色彩画的内容，尤其是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现代美术的中西融合中，其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艺术流派众多，从这里看出可以多视角，多角度来实现美育的目标。在油画鉴赏课程中，选择经典的油画作品，特别是西方美术重大转折时期的美术作品，比如，印象派和现代主义艺术作为重点介绍，让学生了解其创作背景和创作思想，使学生体会到艺术的革新和创新的意义，掌握其艺术脉络走向，培养其创新意识，让学生感受到西方文明艺术与中国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教师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思考进行独立创作，相互借鉴，吸取精华，并结合个人喜好，发扬本土特色题材进行创作，把簸箕画带给大家的独特美感传递出去。通过有限的素材表现出无限的美学探索，让学生在有限的素材中感受到绘画所带来无穷的快乐，感受到绘画所表现出的千姿百态，增强审美意识、激发潜能、陶冶道德情操、达到立德树人的同时，以多元化的艺术体验来实现对美的感知、洞察和分析，提升学生绘画的自信和存在感^[7]。

3. 绘画与心育实践路径融合的实现路径

3.1. 注重知识迁移与应用，将心理健康素材内容融入教学中

教师应注重学生的学科知识迁移与应用，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将课堂的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还可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在簸箕画教学中，绘画融合心育并不局限于某一门课程、某一教学内容，而是在美术教材之外融入了跨学科的学习内容。《呐喊》是蒙克代表作品，他是挪威表现主义代表画家，他的作品有种强烈的情感表达，表现了死亡、恐惧的艺术形象，整个人物扭曲夸张，强烈的色彩与笔触^[8]。学生借此图像来表达，通过作品的反哺作用，让学生学会如何诠释和表达心理的正能量。通过人物的变形来表现心理的另外一面，以色彩的强烈对比来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让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同时，引导学生如何利用各种绘画素材，让教学内容更丰富，让课堂教学更充实，使各种学科知识在簸箕上得到展示，从而形成多样的意趣图像。



图二《呐喊》

3.2. 注重学生抗压能力的培养，把遇到的学习压力和内心情绪释放出来

学生在学习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作为老师，与其躺平和丧失信心，不如及时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正确引导学生的学习态度，挖掘学生的潜能，这样才能有理有据，因材施教，为学生的失落情绪找源由。同时，学生通过绘画来释放学习压力，抒发内心情感，哪怕是几块颜色、几条线、几个点，都可以通过这种绘画疗愈的方式，把学生内心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把学生的情绪、思想宣泄出来，让簸箕成了释放压力的场域，让教师能够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使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从而达到对绘画形象的塑造与理解，提取一些理性的抽象思维能力与培养独立的学习能力。

3.3. 锻炼学生的绘画技巧，将创作观念融入到绘画实践中

高中美术新课改指出，教师要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

高艺术创作能力为核心,着力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9]。教师在簪笄画的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提供自主创作的机会,并对学生的绘画技能进行锻炼,让他们对经典教材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各种绘画社团活动来实现绘画训练机会,通过校园写生、居住社区写生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取舍能力,把家乡的青山绿水、人文风情记录下来,感受大自然的馈赠,从而抒发内心的直观感受。学生还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摄像作品等多种形式收集素材,通过塑造相应的艺术形象,寄托个人的思想情感和品格精神,进一步丰富表现素材,使美术绘画不再是单纯美的表达,而是包含道德情感教育效果的完美呈现,从而在绘画中真正体会到凝练之美,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让学生在绘画中感受到凝练的魅力,从而在绘画中感受到凝练之美^[10]。在绘画的创作过程中体会到艺术创作所带来的愉悦,真正使自己的审美情趣得到陶冶,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让内心获得真正的满足与快乐。

3.4. 注重培养学生对家国情感的归宿感,挖掘本土地域文化的优秀特色

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要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11]。教育的目的就是立德树人,培养下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所以课堂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探索未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绘画艺术,陶冶情操,心灵美化,将逐渐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挖掘当地文化特色,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创作实践能力,让他们感受到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荣誉感,实现人生目标和理想,健康成长,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栋梁人才做铺垫。更重要的是,通过绘画这一过程,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使学生成为一名五育并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型人才。

4. 结论

“以德为本,以画为托”,二者互为补充,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以美育人、以德育人的教学效果,达到净化心灵、提升道德修养的目的^[12]。学生在学习当中,首先要保证心理健康的同时,才能达到以德育人的目的。教师要把德育中心理健康教育内容融入到绘画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去,为促进全面探索更多更有效的教学途径。在今后的教学实践活动中,需要更加注重个性化教学,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需求,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为他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学习机会。同时,教师也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时俱进,积极钻研,不断学习和探索教育教学新理念,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我们相信,未来的教育将更加注重个性化、多元化发展,通过不断优化教育教学模式,加强学科知识的整合与运用,使每一位学生在教育中都能获得全面健康的成长,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责任感感的未来栋梁,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核心素养得到极大提升。

参考文献:

- [1] 李力加.基础美术教育教学研究.[M].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12(29).
- [2] 尹少淳.尹少淳谈美术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5).
- [3] 罗先桃.美育融合德育:高中美术课堂中国画的教学实践研究.高考德育教学,[J]2023.9:162.
- [4] 尹少淳.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M].基础教育出版社,2021.(6).
- [5] 同[3]
- [6] 尹少淳,美术核心素养大家谈.[M].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3(41-43).
- [7] 张鸿渊.“以美育德”:“五育融合”背景下高校美术教育的必然、实然和应然.教育理论与实践.[J]2023.43(12):40-44.
- [8] 李行远.西方美术史纲.[M].湖南出版社,2002.10(98).
- [9] 尹少淳,尹少淳谈美术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49).
- [10] 同[7]
- [11] 董明.新时代高中美术教学德育渗透问题探究与践行策略[J].美术教育研究,2021(11):154-155.
- [12] 管燕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浅谈高中美术教学中的德育渗透[J].美术教育研究,2013(1):151.

篆刻艺术与古文字在中职美术教学中的融合研究

武晓辉^{1*}

(¹固安县职业中学, 河北 廊坊 065500)

摘要: 本文研究篆刻艺术与古文字在中职美术教学中的融合应用。作为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字体系, 甲骨文不仅是重要的历史遗产, 更为书法篆刻艺术奠定了基础。研究发现, 当前中职学校在开展篆刻教学时面临师生基础薄弱、教学资源不足等困难。通过分析篆刻艺术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教学现状, 提出从教学内容精选、教学模式创新、实践平台搭建和师资队伍建设的四个维度进行优化。研究旨在探索适合职业教育的传统文化教学模式, 既促进篆刻艺术的传承发展, 又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力, 为职业院校的美术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篆刻艺术; 古文字; 中职美术教学; 印章发展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seal cutting art and ancient charact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Art Teaching

Wu Xiaohui^{1*}

(¹Guan County Vocational High School, Langfang, Hebei, 0655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seal cutting art and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fine arts teaching at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s the earliest writing syste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re not only important historical heritage but als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rt of calligraphy and seal cutt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current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weak foundational skills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 when carrying out seal cutting instruction.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text of seal cutting art and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selecting refined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odels, building practical platforms, and strengthening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a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ing model suitabl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eal cutting art but also effectively enhances students' cultural literacy and artistic creativity,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fine arts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seal cutting art;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fine arts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development of seals

引言

甲骨文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系统, 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更为书法篆刻艺术提供了重要源头。其独特的字体结构和雕刻技法, 至今仍为艺术创作提供着丰富灵感^[1]。本研究聚焦中职美术教育, 探讨如何将篆刻艺术与古文字有机结合。选择中职教育作为研究对象, 因其兼具职业教育

与文化遗产的双重使命：一方面能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另一方面可增强文化自信。通过开发适合中职生的篆刻课程，既能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能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和创新能力。研究旨在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职业教育的融合路径，为培养具有文化底蕴的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新思路。

1. 篆刻艺术与古文字的历史共生

1.1. 印章的发展

从殷商时期陶器、青铜器上的铭刻，到春秋战国布局精妙的古玺，再到秦汉印章的巅峰造诣，文字与印章的发展始终交织融合。历经千年演变，篆刻艺术在文人参与、印材革新与理论探索中逐步从实用走向审美，形成独特艺术体系^[2]。深入探究篆刻艺术与古文字的内在联系，不仅能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密码，更有助于推动这一古老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1.2. 篆刻艺术

古代印章未被称为“篆刻艺术”，并非因其缺乏艺术性，而是因当时以实用为主。尽管古玺印在章法、材料与创作中已体现先人审美追求与创新，但艺术印章的转变有其脉络：最早体现于书画鉴藏印的实用，史载唐御府开启鉴藏用印之风，如唐玄宗“开元”朱文印，鉴藏印与书画结合，推动印章向艺术化迈进。五代及宋代书画款印出现，标志印章从自发走向自觉，由实用转向审美，为篆刻艺术形成奠定客观条件^[3]。我国印章篆刻发展到了明代，已经进入了专业艺术创作领域，印章升华为篆刻艺术，揭开了文人流派印的帷幕，从此形成了明代灿烂的印章流派篆刻艺术，美术史上涌现了风格各异、成就卓著的篆刻家。文彭（字三桥）之功，在于将青田石列为印石之首，并赋予石质印章文人情趣。明人朱简称“自三桥下，无不从斯，字字秦汉”^[4]，其推动使古文字与古印的欣赏、研究及鉴别蔚然成风，印学与篆刻理论由此兴起。清代篆刻艺术继汉之后再度兴盛，中后期流派纷呈，研究达历史新高度^[5]。浙派丁敬突破明代以《说文解字》为唯一用字参考的局限，创新入印文字，拓宽篆刻布局与创作思路；邓石如“邓派”及晚清赵之谦、黄士陵等印人亦各领风骚。至近现代，齐白石开创篆刻新貌，推动其走向现代视野与学校教育，展现“六书”魅力^[6]。

1.3. 篆刻与古文字

我国古玺雕刻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后经商周时的甲骨文、铭文、石鼓文等雕刻影响，至战国时形成整体形象^[7]。在发展过程中，其发展的重要动力来自文字体系的演变和完善，同时体现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审美风尚。在这期间，人们都以“篆刻”来统称为印章，主要的原因是以篆书为入印文字。

如今对古文字的不断研究和分析，使得大篆文字入印也成为当今篆刻艺术重要的表现形式，篆刻虽然以篆书入印，秦汉之后的篆刻作品，楷书印、行书印、隶书印、草书印等纷纷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8]。

2. 篆刻与古文字融入美术教学的研究现状

2.1. 教学形式

2.1.1. 依托本土资源的特色课程

河南、陕西等地的中职学校，靠近甲骨文、青铜器文物出土地，常组织学生参观殷墟、碑林等遗址。例如，安阳某中职校开展“甲骨文刻字体验课”，用橡皮泥模拟甲骨，让学生用牙签刻写“象形字”，直观感受甲骨文的刀锋笔意。

2.1.2. 非遗传承的校企合作

部分南方中职校与当地篆刻非遗工作室合作，邀请传承人入校授课。如苏州某中职校开设“吴门篆刻工作坊”，学生不仅学习明清流派印的刀法，还参与雕刻核雕、木牌等文创产品，将篆刻技能与市场需求结合，实现“传统技艺+职业技能”的双轨培养。

2.1.3. 校本课程的初步开发

在河北某中职校学校也有自编的教材，简化理论，侧重实操。如：《篆刻》教材，用漫画形式讲解“什么是朱文、白文”“刻刀握法三步骤”，并设计“生肖印章”“姓名印章”等主题创作，让学生在趣味中掌握基础技法^[9]。

2.2. 现实困境

深入分析发现，这种困境主要源于两大现实问题：一是教学资源严重匮乏。某校案例显示，一套专业篆刻工具人均成本较高，导致90%的学校只能使用橡皮、土豆等替代材料，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教材方面，85%的学校直接使用大学教材，充斥着“六书”等专业术语，却缺乏适合中职生的图文案例。二是师资队伍存在结构性矛盾。某教师发展中心统计表明，50岁以上的教师虽掌握传统技法，但仅有23%能熟练运用多媒体教学；而35岁以下教师中，82%对古文字知识掌握不足，教学往往流于表面。

这种状况的形成既受客观条件限制，也与教育观念相关。一方面，职业院校更重视技能培训，某年度职教投入报告显示，传统文化课程经费占比不足5%。另一方面，教学方法陈旧，某校尝试将AR技术引入篆刻教学后，学生参与度立即提升了40%，说明创新手段的重要性。要突破这些困境，需要从教材开发、教法创新、师资培养等多个维度系统推进，让传统艺术真正“活”在当代职教课堂中。

3. 篆刻与古文字融入中职美术教学的策略研究

针对上述困境，以下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实践活动和师资能力四个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实用性和趣味性的结合。如《篆刻---中国印章艺术》这一课中，用胡萝卜和橡皮雕刻入手，降低学生的操作难度，同时结合古文字的基本知识文字的演变历程，让学生理解汉字的艺术美。例如，在讲解篆刻布局时，可以引入“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美学原则，并结合经典印章进行分析，使学生既能掌握技法，又能领悟传统文化内涵。此外，教学内容还应与职业需求衔接，比如在计算机专业中，可以让学生尝试用篆刻风格融入古文字元素设计品牌标识，增强实用性。

在数字化教学方面，推荐使用“金石在线”篆刻模拟软件和“AR篆刻大师”应用程序，这些工具可让学生在平板上体验真实的刀刻手感，某试点学校使用后材料损耗降低50%。项目式学习可设计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使用“篆书字典”APP研究文字演变；第二阶段分组制作“校园文化主题印章”；第三阶段举办成果展并评选优秀作品。江苏某职校实施该方案后，学生课堂参与度从45%提升至82%。同时建议对接“全国职业院校非遗创新大赛”，将省赛获奖纳入学分奖励，形成“学-做-赛”的良性循环。这些方案已在多所职校验证效果，平均可使教学效率提升40%以上。

实践活动是巩固学习成果的关键环节。学校可以组织篆刻社团，定期开展篆刻体验活动，或与当地博物馆、非遗传承人合作，让学生近距离观摩传统篆刻技艺。还可以结合校园文化，如设计校庆纪念印章、班级文化章等，使篆刻学习更具现实意义。此外，可以尝试跨学科实践，比如将篆刻与版画、陶艺、木雕等工艺结合，拓展学生的艺术表现手法。例如，用篆刻技法雕刻陶泥印章，或制作活字拓印体验项目，让学生在动手过程中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10]。

教师能力的提升是保障教学质量的核心。中职美术教师应加强篆刻与古文字的专业学习，可通过参加非遗传承人工作坊、高校短期研修班等方式提升技能。同时，学校可以邀请篆刻艺术家或书法家进校园开展讲座或示范课，帮助教师拓宽教学思路。此外，教师还应关注数字化教学手段的应用，如学习3D篆刻建模、古文字动画演示等技术，使教学更加生动直观。

总之，在中职美术教学中融入篆刻与古文字，需要从内容设计、教学模式、实践活动及教师能力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通过趣味性、实践性和职业导向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让学生掌握传统技艺，还能培养其文化自信和创新能力，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

2024年校园艺术文化节推出的“创意花灯，智趣满园”活动取得显著成效。活动分为三大环节：1)文化讲座，通过图文视频讲解花灯千年历史；2)实践工作坊，学生分组制作剪纸花灯、环保材料花灯，优秀作品在校内展览；3)灯谜擂台，设置100道融合学科知识的趣味灯谜。后续调研显示：83%的学生表示加深了对传统的理解，91%认为活动提升了动手能力。特别是幼儿保育

班学生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花灯创作，作品被当地文化馆收藏。活动不仅活跃了校园氛围，更通过实践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有效增强了文化认同感。

4. 结论

本研究证实，将篆刻艺术与古文字融入中职美术教学，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实践能力，同时促进传统技艺的传承。未来可探索跨学科融合或开展长期教学效果跟踪，验证文化素养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此外，可开发模块化课程，适配不同专业需求，进一步优化传统文化在职业教育中的创新应用。

参考文献：

- [1] 顾文州.金石之光[M]. 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 2014.
- [2] 段彪.艺术欣赏[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 [3] 叶一苇.篆刻欣赏[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6.
- [4] 贾伟朝.汉唐时期西域古文字应用于篆刻艺术的创作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21.
- [5] 赵宏.试论清代篆刻艺术的发展与繁盛[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3.
- [6] 易镜荣.美术欣赏[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 [7] 彭吉象.中国艺术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8] 石以品.中国篆刻艺术与古文字[J]. 艺术探索,2009(3); 12-15.
- [9] 王南.肖形印篆刻艺术在高中美术课程的实践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3.
- [10] 于浩.高中美术篆刻校本课程的实践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4.

新课改下小学音乐教学的改进措施

校欢欢^{1*}

(¹双站路小学 天津 301800)

摘要: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音乐教学需依托音乐特有的情感传递与审美体验功能,通过跨学科融合与多样化实践,实现学生艺术素养与文化理解能力的协同发展。本文分析音乐欣赏教学的价值,剖析当前教学中理念陈旧、模式单调、活动单一等问题,结合具体案例提出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开展多元活动等改进策略,旨在为新课改下音乐学科的美育价值落地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 新课改; 音乐欣赏教学; 创新教学模式; 跨学科融合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Xiao Huanhuan^{1*}

(¹Shuangzhanlu Primary School, Tianjin, 3018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needs to rely on music's unique functions of emotional transmission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diversified practices, it aims to achieve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rtistic literacy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lue of music appreciation teaching, explores current issues such as outdated concepts, monotonous teaching models, and single-dimensional activities, and propose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cluding updating teaching concepts, innovating teaching models, and carrying out diverse activities through specific cases. The goal i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implementing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of music disciplines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Keywords: New curriculum reform; Music appreciation teaching;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引言

在新课改背景下,教育体系不断演进,小学音乐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音乐教育核心放在审美感知、文化理解、艺术表现和创意实践上,强调音乐欣赏教学对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性^[1]。音乐作为听觉艺术与情感载体,其美育功能具有即时性与体验性特征,可通过旋律、节奏等元素直接作用于学生情感认知,这是音乐学科在新课改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教师需适应新课标要求,通过创新策略激发学生音乐兴趣,培养审美感知与文化理解能力。本文结合教学实践,探讨小学音乐欣赏教学的现状问题与改进路径。

1. 新课改背景下音乐教学的价值

- 76 -

基金项目: 无

作者简介: 校欢欢(1992-),女,天津双站路小学,本科

通讯作者: 校欢欢 邮箱 570404390@qq.com

1.1. 满足新课改需求，发挥音乐学科的美育价值

音乐教育作为新课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理念聚焦于培养学生审美感知、文化理解 and 艺术表现能力。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学生接触音乐作品的机会广泛，但对音乐文化的了解趋于表面化^[2]。音乐欣赏教学通过多样化活动，可潜移默化提升学生对音乐作品文化内涵的认知，增强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能力，既满足新课改对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又充分发挥音乐学科的美育价值。

1.2. 丰富学生审美体验，发展学科综合素养

在多元音乐文化背景下，流行音乐虽受学生喜爱，但也可能局限其审美视野。音乐欣赏教学可引导学生接触中国古典音乐、民谣、地方特色音乐等更广泛的音乐形式，超越流行音乐偏好，拓宽音乐视野，提升文化理解能力^[3]。学生在赏析作品时体验其中的情感与智慧，不仅能提升音乐欣赏能力，更能促进学科素养的全面发展。

1.3. 强化跨学科融合潜力，拓展音乐教育边界

音乐与语文、历史等学科具有天然融合性。例如，在《忆江南》教学中，可将古琴曲与白居易诗词联动，通过诗词意境解读辅助学生理解音乐情感，反之以音乐元素分析深化诗词意境感知，实现“以乐悟文、以文解乐”的跨学科育人效果，拓展音乐教育的认知维度。

2. 小学音乐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2.1. 教师教学理念老旧

部分教师受传统教育观念束缚，未充分认识音乐教育的综合价值，将教学局限于技能培养层面。例如，在传授歌曲时，过度强调音符识别与节奏掌握，忽略作品的情感与文化内涵^[4]。如部分教师在《茉莉花》教学中，仅专注于教唱旋律和纠正发音，未引导学生探讨江南民歌的细腻风格与地域文化背景，导致学生对音乐的认知停留在表面，难以领悟作品深层意蕴。

2.2. 教学模式单调

2.2.1. 传统讲授为主，缺乏深度互动

部分教师在学唱环节仅传授音符与节奏，忽略文化情感表达^[5]。例如，在《忆江南》教学中，部分教师全程通过 PPT 播放文字注释与音频，仅要求学生跟唱旋律，未引导学生结合诗词意境分析音乐情感，课堂互动局限于“是否听懂”的简单问答，导致学生参与度不足 30%。

2.2.2. 多媒体使用僵化，缺乏探究设计

部分教师依赖播放视频讲解音乐历史，但缺乏互动环节，使学生被动接受知识^[6]。如讲解《梁祝》时，仅播放动画视频而不组织讨论“小提琴音色如何表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情感变化”，导致课堂氛围沉闷。

2.2.3. 教材依赖严重，忽视个体差异

部分教师机授课，未根据学生能力调整教学。如面对低年级学生时，仍采用与高年级相同的五线谱识读教学，导致基础薄弱学生难以跟上进度，降低学习兴趣^[7]。

2.3. 活动形式单一

课堂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学生缺乏参与空间。例如，多数音乐课仅设置“跟唱”“节奏模仿”等机械性活动，未设计小组创编、音乐情景剧等创造性任务。此外，教学内容依赖教科书，缺乏对流行音乐、本土音乐的拓展。如某教师一学期仅教授教材中的 12 首歌曲，且未引入当地童谣或学生喜爱的动漫音乐，导致学生对课堂内容产生疲劳感，难以展现个性与创造力^[8]。

3. 新课改下小学音乐教学的改进措施

3.1. 更新教学理念，明确音乐教育本质

教师需以新课标为导向，将教学焦点从“技能传授”转向“兴趣激发与审美培育”。课程设计应结合学生兴趣与生活经验。

例如：融入流行元素：在教唱《少年》等励志歌曲时，引导学生讨论歌词传递的奋斗精神，结合短视频配乐等流行形式，激发共鸣。创设轻松氛围：采用“音乐下午茶”等非正式课堂形式，让学生分享喜爱的音乐片段并即兴表演，减轻学业压力，感受音乐乐趣。

3.2. 创新教学模式，引领学生深度学习

3.2.1 问题驱动教学法与跨学科联动——以《忆江南》为例

教学步骤：诗词意境导入（10分钟）：回顾语文课堂所学白居易《忆江南》，引导学生用“热烈”“宁静”“绚丽”等关键词描述诗词画面，提问：“如果将这些画面转化为音乐，你会选择古筝还是笛子？为什么？”

音乐要素分析（15分钟）：播放古琴曲《忆江南》，分组讨论：“旋律线条是起伏较大还是平缓流动？与‘江枫渔火’的画面如何呼应？”“节奏快慢如何表现‘忆’的眷恋情感？”教师通过图谱可视化呈现音乐结构，如用波浪线标注级进音型模拟江水流动。

创意表达实践（10分钟）：学生分组用绘画、肢体动作或简易乐器（沙锤、铝板琴）表现诗词与音乐融合的意境，展示后互评“哪组最能体现‘能不忆江南’的情感”。

3.2.2 合作学习与本土文化结合^[9]——以《滚核桃》为例

启发式引导：课堂伊始提出谜语“两个小木盆，扣个皱脸人，木盆扣得紧，不砸不开门”（谜底：鼓），激发学生对打击乐的好奇心。

小组探究：播放山西绛州鼓乐《滚核桃》，布置任务：“找出乐曲中模仿核桃滚动的节奏型，尝试用课桌敲击表现。”

文化拓展：引入当地民间鼓乐视频，对比不同地域鼓乐的音色与节奏特点，引导学生思考“音乐如何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3.3. 开展多样化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为了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学校可以开展多样化的音乐活动^[10]。这些活动不仅仅限于课堂教学，还包括音乐比赛、艺术展示、跨学科主题活动、社团活动等。例如：举办“班级音乐会”，鼓励学生自编自演音乐剧、乐器合奏等，如用尤克里里弹唱改编的古诗新唱《静夜思》。开设“音乐角”，放置卡林巴琴、空灵鼓等简易乐器，供学生课间自由探索。此外，开设跨学科主题活动也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结合“传统文化月”，开展“诗词中的音乐”主题活动，学生为《水调歌头》等诗词选配乐器、创作旋律。与美术课联动，举办“听乐绘心”比赛，根据音乐片段绘制视觉画面，培养联觉能力。最后还可以丰富社团活动开展竞赛，成立“童声合唱团”“小小器乐社”，定期开展排练与展演，如合唱《萱草花》并录制MV。组织“校园好声音”比赛，设置“原创歌曲”“经典翻唱”等组别，激发创作热情。

4. 结语

在新课改背景下，小学音乐教学需以学科独特的美育价值为核心，通过更新理念、创新模式、多元实践，构建“兴趣驱动—深度探究—素养提升”的教学体系。当前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小学实践，未充分探讨城乡音乐教学资源差异的影响，这是研究的局限性所在。未来可进一步开展城乡对比研究，探索数字化音乐资源（如虚拟乐器、在线大师课）在乡村学校的应用路径，为教育均衡发展提供更具普适性的策略。教育者需持续创新，让音乐成为学生感受美、表达美、创造美的桥梁，助力其全面成长。

参考文献：

- [1] 王轶雯 豫中地区小学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与改进策略[J]. 《中国音乐教育》，2023(08):29-33.
- [2] 于溪 多元文化交融下的小学音乐教育模式研究[J]. 《大众文艺》，2023(13):199-201.
- [3] 范丽娜 新课改下小学音乐欣赏教学的策略研究[J]. 《亚太教育》，2023(02):166-168.
- [4] 秦小红 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音乐欣赏课“单元设计”研究[J].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2,42(12):105-107.
- [5] 元文斌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研究[J]. 《华夏教师》，2022(18):91-93.
- [6] 肖银霞 德育渗透视角下的小学音乐教学策略[J]. 《河南教育(教师教育)》，2021(10):76-77.
- [7] 剡秀娟 音乐启蒙教育对小学生音乐素养形成的影响[J]. 《黄河之声》，2020(14):172-173.
- [8] 盛红芳 柯达伊教学法在小学音乐教学的发展[J]. 《黄河之声》，2020(12):153.
- [9] 柯达伊 《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匈牙利音乐教育》[M].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 [10] 戴维·埃利奥特 《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

习惯养成——从课堂到生活，从刻意到自觉

贾海菊^{1*}

(^{1*}双站路小学, 天津 宝坻 301800)

摘要: 小学低年级阶段是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期,其本质是从外部约束转向内在自觉的过程。本文基于神经科学与教育学理论,构建“课堂情境化训练—生活场景化迁移—自觉内化巩固”的三阶模型,结合行为链分解、动机转化等策略,探究低年级学生习惯养成路径。以天津市宝坻区双站路小学一年级两个平行班共60名学生作为实验样本,经分层随机抽样确保代表性。实践证明,家校协同运用双场景任务卡、行为镜像机制,可使低年级学生21天内基础习惯巩固率提升超65%。引入近五年中文研究成果,为落实义务教育习惯培养目标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 小学低年级; 习惯养成; 习惯迁移; 自觉内化

Habit Formation – From Classroom to Life, From Deliberate to Automatic

Jia Haiju^{1*}

(^{1*}Shuangzhan Road Primary School, Baodi District, Tianjin, 301800, China)

Abstract: The primary school junior stage is the key period for the formation of good behavioral habits, which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from external restraint to internal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uroscience and pedagog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stage model of "classroom situational training - life situational transfer - conscious internalization and consolidation", and explores the habit formation path of junior students by combining strategies such as behavior chain decomposition and motivation transformation. Taking 60 students from two parallel classes in Grade 1 of Shuangzhan Road Primary School in Baodi District of Tianjin as the experimental sampl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was used to ensure representativenes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use of dual-scene task cards and behavior mirror mechanism by families and schools can improve the consolidation rate of basic habits of junior students by more than 65% in 21 days.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provides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abit training objective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junior grade; Habit formation; Habit transfer; Self-conscious internalization

引言

小学低年级学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是培养良好习惯的黄金时期。良好习惯不仅利于当下学习生活,更对其终身发展意义深远。然而,如何引导学生将课堂行为规范转化为生活自觉行动,实现从刻意遵循到自觉养成的转变,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探索科学有效的习惯养成路径。

1.习惯养成的阶段性特征与理论基础

1.1 神经科学视角下的习惯形成机制

1.1.1.刻意练习阶段

低年级学生需通过重复指令激活前额叶皮层，形成短期记忆回路。例如，“书本左上角放，铅笔盒中间躺”这样的规则需要反复强调才能被记住。依据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1]，前额叶皮层在习惯形成初期承担着关键的信息处理与决策功能。在本研究中，对所带班级学生进行多次实验训练，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 60 名学生作为样本，连续一个月进行“课前准备六步法”训练，精确记录学生物品准备时间，发现准备速度从平均 3 分钟缩短至 2 分钟。

1.1.2.自动化反应阶段

当行为重复 21 次以上，基底核神经突触重构完成习惯固化。神经科学研究成果表明^[2]，习惯固化与基底核神经突触的稳定连接密切相关。本研究中，对坚持使用“家庭晨读打卡表”的学生进行跟踪统计，3 个月后可提醒自主阅读率达 70% 以上，数据收集采用每日打卡记录与定期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1.2 教育学理论支撑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强调“生活化实践”原则，要求将课堂习惯延伸至家庭场景。研究指出^[3]，生活化实践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迁移应用。在本研究中，将数学课“分类统计”知识应用于家庭冰箱食物整理，学生形成定期清理过期食品的自觉行为，该实践过程依据班级学生反馈与家长评价进行效果评估。同时，参考近五年关于习惯养成与数字化工具结合的研究，如探讨智能手环在儿童运动习惯养成中的应用^[4]，分析教育类 APP 对学生学习习惯培养的作用^[5]，丰富了理论支撑体系。

2.从课堂到生活的迁移策略与实施案例

2.1 课堂标准化训练体系

低年级学生的习惯的训练一定要明确目标，细化要求，有效督导反馈，激励改进提升的过程。研究表明^[6]，明确的目标与细化的要求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执行。以书写习惯为例，要求“握笔姿势正确，书写工整，一笔一划认真写”。将规则细化并张贴在教室显眼位置，让学生时刻可见，明确努力方向。课堂中我们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刻意训练：

2.1.1.以小见大——微习惯启动设计

(1) 三阶提示法：

- ①视觉提示：课桌粘贴“坐姿三步贴”（背挺直 脚放平 手叠放）；
- ②听觉提示：编制习惯口诀（例：“站如松，坐如钟。”……）；
- ③触觉提示：使用坐姿矫正器或软尺提醒保持坐姿。

(2) 学科渗透：

如语文课借《文具的家》强化物品归位意识，数学课用“分类整数学具”渗透收纳习惯。该实践过程参考学科融合教育理念^[7]，有效促进学生习惯迁移。

2.1.2.家校共育——双场景任务卡应用

设计课堂与家庭双场景任务卡（如下表所示），家长记录孩子任务完成情况并反馈给老师，通过家长、教师、同伴给予多元激励评价，形成教育合力，实现共管共育。

课堂任务	家庭延伸任务	行为联结点
书本摆放	整理玩具箱	分类归位能力
排队如厕不拥挤	超市结账自觉排队	公共秩序意识

课堂任务	家庭延伸任务	行为联结点
课堂发言先举手	家庭讨论等长辈说完	沟通礼仪养成

2.2 生活场景泛化路径

2.2.1.激励坚持——学校、社区实践积分制

学校与周边社区联动开展“文明习惯银行”活动：

- (1) 课堂表现：认真听讲、勤思考积极举手等存 1 枚“勤学币”；
- (2) 生活实践：文明有礼、公共场所安静有序等存 2 枚“美德币”；
- (3) 兑换规则：累计 30 币可兑换行规标兵奖状、优先选座权等。学生积极用行动累计积分，以促进好习惯的养成。活动效果通过学生参与度统计、积分兑换记录以及教师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评价进行综合评估。

2.2.2.联动奖励——家庭行为镜像机制

家长模仿学校奖励机制，对于孩子好行为进行记录并反馈给老师，老师给予相应的积分奖励，家长也通过积累“星星”兑换购买礼物等奖励，双重激励更能促进学生逐步养成好习惯。

对于特殊需求学生群体（如学习障碍学生、情绪行为障碍学生），为其制定了专属的习惯养成方案。先记录基本情况（包括性格、爱好、学习能力、重点关注点等）；再根据其特殊需求细化要求；最后联合家长，通过打卡、家访等形式增加交流频次，积极及时指导或调整改进。通过观察学生日常表现与家长反馈来看，学生不仅行为习惯方面有改进，且在自身有障碍的方面也有改善。

3.从刻意到自觉的转化机制与实证分析

3.1 行为链分解

3.1.1.正向引导：将复杂习惯拆解为可操作单元

例如：自觉完成家庭作业=取出作业本→计时 25 分钟→红笔订正→整理书包。通过明确的分步骤的闭环行为训练，使得学生做事更加具有逻辑性和完整性。该方法参考行为分解训练理论^[8]，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

3.1.2.逆向干预：打断错误行为链建立新回路

例如：学生“边吃饭边看电视”时，插入“遥控器休息盒”（吃饭期间暂存遥控器），提醒学生应该如何做某事。通过每日行为记录与定期问卷调查的追踪数据显示，连续实施 14 天后，一半以上学生建立了餐前自主放好遥控器的好习惯。

3.2 动机内化模型构建

3.2.1.外部激励转化

阶段	激励形式	典型案例
外部驱动	物质奖励（贴纸）	完成作业兑换奖励
社会认同	集体荣誉（小姐红旗）	量化先进班（全班）
自我效能感	成长档案袋	每月更新《我的进步故事》手账本

3.2.2.自身认知实践内化

通过身体动作强化心理认同，如：课堂“轻轻走”训练→生活区“小脚丫”地贴指引→最终形成“公共场合不奔跑”的自觉。该过程依据具身认知理论^[9]，有效促进学生习惯内化。

4.实施建议与反思

4.1 训练要循序渐进

例如在训练坐姿时,教师提示频次:第1周每15分钟提醒坐姿→第2周每节课提醒→第3周每天两次提醒→第4周每日总结反馈,表扬表现优秀者。借助课堂观察记录与定期坐姿测评的实验数据,显示阶梯式撤除提示后,学生坐姿达标率仍保持80%以上。

4.2 浸润于感官文化

利用不同风格和节奏的音乐、朗朗上口的童谣、有趣的提示牌等全面立体的环境布置时刻熏陶学生的成长与习惯。如课堂习惯可利用童谣“铃声响,进课堂,文具书本摆妥当;要发言,先举手,站直身子声响亮。”课前提醒。该实践参考^[10]的环境育人理论,营造良好的习惯养成氛围。

4.3 注重元习惯培养

参考元认知能力培养理论^[11],重点训练“观察模仿”“错误反思”等元能力,如设立“习惯观察员”岗位,帮助学生互相提醒改进,进而提升学生自主管理能力。

4.4 关注特殊群体

良好习惯的养成是针对每一名学生,全面了解学生是基础,对于一些特殊学生更要多加关注,用心、得法去引导,因材施教。例如,对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学生可提供“分段计时器”:将25分钟作业拆分为5个“五分钟冲刺”,既将低了难度也更易完成。

本研究成果在实验班级中取得良好效果,其中家长的配合程度、学生的动机激发程度是实验效果的关键因素;实验过程详尽便于操作,可根据不同年级和地区学生特点调整周期内容等,适应性较强,可依托校内外交流和网络推广,为同行研究提供参考。

小学低年级学生好习惯的养成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课堂教学中的有效引导、日常生活中的巩固强化,能够帮助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习惯,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助力他们的成长与未来。

参考文献:

- [1] 王晓燕.儿童认知发展与习惯养成的神经机制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20,28(8):1230-1240.
- [2] 刘志强.基底核在习惯形成中的作用机制[J].生理学报,2021,73(3):356-365.
- [3] 陈丽.小学德育生活化实践路径探索[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39(23):45-47.
- [4] 张明.智能设备在儿童运动习惯培养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1,31(5):112-118.
- [5] 李华.教育类APP促进小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养成的策略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2(7):105-111.
- [6] 王勇.小学低年级习惯训练的目标设定与要求细化研究[J].基础教育研究,2023(4):56-58.
- [7] 刘爽.学科融合视角下的习惯养成教育研究[J].教育科学研究,2023(1):34-39.
- [8] 赵萌.行为分解训练法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J].教育导刊,2020(4):67-71.
- [9] 郭娜.具身认知理论与儿童习惯内化研究[J].现代中小学教育,2021(3):89-93.
- [10] 孙阳.校园环境育人功能的实践探索[J].中国教育学刊,2022(2):88-92.
- [11] 钱鑫.小学生元认知能力培养策略研究[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3(1):78-82.

逻辑·困境·路径：“大思政课”视域下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三维探析

张红军^{1*}

(^{1*}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构建“大思政课”社区思政育人新格局是开创思政育人新局面的重要方向。“大思政课”视域下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内在逻辑在于，其符合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的客观需求、顺应思政教育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的理论旨归和对育人形式与内容守正创新要求的现实回应。在“大思政课”建设要求下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还存在着认知偏差、实践弱化、协同不强等实际问题。超越当前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现实困境，要构建以认知解蔽为前提、以实践效果为核心、以多方协同为体系的实践路径，进而改进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方式方法，汇聚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强大合力，开创“大思政课”全面育人新格局。

关键词：大思政课；思政育人；社区思政工作；协同育人

Logic·Dilemma·Path: A Three-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Community-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Zhang Hongjun^{1*}

(^{1*} School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0,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community-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clusive ideological education") framework is key to advancing such education. This approach meets the need to integrate classroom learning with broader social engagement, aligns with the principle of unify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nnovates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delivery. However, current community efforts face challenges lik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weak implementation, and poor coordination. To overcome these, pathways include enhancing conceptual clarity, focusing on practical outcomes, and fostering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This will improve methods, pool resources, and create a comprehensive "inclusive ideological education" system.

Keywords: Great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社区是学生社会生活的基本场域，思政育人是社区的一项基本工作。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深入到群众生产和生活中去”^[2]，强调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独特的育人价值。在“大思政课”建设要求下要充分发挥社区社会“实践场”作用，通过开展社区公共服务、志愿活动、走访调研等方式，让思政课“活”起来。因此，善用

“大思政课”，依托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大平台”，促进育人“大资源”的有机融通，对于推动“大思政课”建设纵深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1. “大思政课”视域下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逻辑指引

1.1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的客观需求

理解“大思政课”就是要回归“‘社会母体’审视思政课，从思政课与社会之间的生态联系优化思政课建设”^[3]，社区思政育人工作正是立足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的客观需求。2022年7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强调“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4]。思政小课堂是学生系统学习思政理论，用科学的知识武装头脑，树立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阵地。毋庸讳言，思政小课堂的短板表现在“理论讲授的抽象性和课堂教学中学生的被动性”^[5]。相反，社会大课堂是“具备课堂要素结构，契合教育主客体的课堂互动进程，满足研究性学习需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长见识和能力的社会育人场域”^[6]。社区是大多数学生的第二活动场域，学生所接触的社会生活基本空间，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能将思政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中给学生造成显现或隐性的影响，学生也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用于社区实践，从而完成理论体悟到实践升华。因此，基于学生的校社二重身份以及社区自身的政治性和生活性，社区思政育人工作正是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现实路径。

1.2 思政教育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的理论旨归

理论联系实际是“大思政课”建设的灵魂所在^[7]，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实践能有力诠释思政教育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理论旨归。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8]，“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要突破传统思政课“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9]单一形式。有效的思政课强调体用结合、体用贯通，学生在社区思政育人活动的具体实践，将课堂上习得的理论践行于现实社会生活中，就是把理论之“体”付诸实践之“用”的过程，从而在实践中真正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对于个人品德的塑造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因此，以社区思政育人工作推动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向社区实践活动转换，不仅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从“体”到“用”的教育旨归，也是“大思政课”建设要求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的要求。

1.3 育人形式与内容守正创新要求的现实回应

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表现，是对思政课建设的总体要求^[10]。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11]。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守思政课的政治性，同时在改革创新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12]，社区思政育人工作正是落实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现实回应。“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工作的视野比以往无比宽广，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要坚守的“正”，就是要旗帜鲜明的讲政治。一方面，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要守的正就是守好意识形态之正，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始终以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青年为使命，并将其贯穿于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全方位和全过程，以巩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成果，达到与学校育人的横向协同。另一方面，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要创的新就是要创育人活动形式之新，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能够突破思政活动固有视域、拓展教学场域，构建同社会有机交融的育人形态。

2. “大思政课”视域下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现实困境

2.1 认知偏差影响社区对思政育人的理解

认知偏差最早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内曼在前景理论中提出，是指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所产生的差异或偏离。^[13]“大思政课”视域下，社区工作者对思政育人的认知偏差主要表现在：一是社区工作者对思政育人工作的理解表面化。对于如何有效开展社区育人工作缺乏专业指导，社区工作者大多是被动的去完成育人工作，将其作为完成工作

的一项指标，对于社区发挥协同育人作用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二是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动机“异化”，仅是将其作为一种附加在社区工作中的任务，忽略其育人价值。三是由于缺乏关于协同育人的相关知识储备与专业培训，即使认同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价值，但在实际开展中呈现出“力不从心”的困境。

2.2 实践弱化造成社区思政育人工作流于形式

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实践弱化表现为思政元素“硬融入”以及“表面化”。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要求社区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所在社区学生传递思政元素，并在过程中利用社区所特有的资源设施，让学生们将学校思政课所学内容在社区活动中“具象化”，并在实践中真正去“经验”所学知识，外化于行，然而社区工作者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存在育人活动形式化的现象。一方面，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缺乏实践评价机制，导致育人实践评价简单化。虽然提倡各社区根据自身社区实际情况对社区学生开展具有特色的育人活动，评价方式应多种多样，但当前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评价机制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标准，导致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虽能发挥一定的育人作用，缺乏完备的工作评价机制其发挥的效果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社区育人实践资源挖掘不充分，育人活动缺乏实践内容支撑。当前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开展主要为理论宣讲和志愿活动为主，主要借助纸质宣传传单和言传等形式，通过这些形式虽然能够起到对受教育者一定的教育作用，但往往不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不能让他们在过程中得到知识获得感和成长感，难以产生长期的教育影响。

2.3 多方衔接不强桎梏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实效

在实际工作中，社区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资源存在着衔接不协调的情况，影响着社区思政育人工作作用的发挥，表现在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内容不衔接、家庭教育的不配合以及社会单位的交流不畅通。一是学校教育与社区育人内容不衔接。社区育人则更侧重于将理论宣传与社区实际相结合，通过多样且生动的社会事务，例如社区服务、文化体验、公共参与等，将育人工作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学校教育与社区育人在教育理念上存在实际差异，学生在校习得的理论知识不能在社区实践中得到完整运用。二是家庭教育与社区育人的配合不强。对于社区育人活动家长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的家长认为社区活动不重要不需要参加，或者参加了社区育人活动也只是作为孩子的娱乐活动，并没有提到对孩子实践能力和品格塑造的高度上来。三是社会单位与社区之间的交流不畅。社区在开展育人活动的过程中，往往是脱离社会单位开展活动，导致育人活动无法引起学生和家长的注意和兴趣。

3. “大思政课”视域下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实践路径

3.1 强化“大思政课”理念，筑牢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专业基底

把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这一门大课上好，首要前提就是要改变社区工作者对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固有看法，破除对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存在的原有认知偏差。一是明确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目标导向性。社区工作者需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强化专业学习、拓宽育人视野、参与育人实践和进行自我反思等方法，促使自身对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认知突破生活背景、教育背景、年龄等因素限制，在复杂多变社会环境下，以高水平的认知理解和育人实践方式的选择，推动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转变。二是提升社区思政育人工作队伍专业性。社区工作者要进一步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自身素养，针对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开展培训。社区应当发挥所处区域优势，邀请附近高校思政课教师以及国内知名学者开展系列专题讲座和培训活动，通过一系列培训活动，启发社区工作者协同育人的积极性，探索日常工作、社区资源与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融合方式，实现“润物无声”和“掷地有声”的社区育人效果。三是加强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资源共享性。社区思政育人工作不是“单独作战”，需要多方社区的联动。既要“走出去”，吸收不同地区城市所在先进社区的先进理念和方式方法，寻找自身差距，加强交流学习。又要“引进来”，通过向外学习来的先进理念方式方法，要思考其具有可复制性的部分，在结合本社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探索符合本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发展道路。

3.2 重视社会实践效果，改进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方式方法

毛泽东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

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4]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同样要遵循实践到认识的科学规律。一是完善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实践评价机制。过程的评价应该由上级部门按照相关政策、制度从社区思政育人工作者、协同育人内容、协同育人形式等方面展开,设立奖励制度表彰社区优秀思政工作者和优秀学员。效果的评价要分年龄段进行,以相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家庭”为单位开展的主题演讲、育人成果展示等活动。二是加强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实践资源转化。要统筹各学段思政资源,尤其是社区要盘活社区特色性的实物资源,将社区思政资源转化为社区育人资源。同时,要拓宽社区思政资源范围,打破不同体制单位之间的交流壁垒,将社区周边红色教育基地、科技展示馆以及心理体验馆等,形成社区特色的实践育人体系。三是创新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实践形式载体。社区工作者要根据不同的活动内容采取相适应的育人形式,注重强化活动的过程性和吸引力。同时,重视新质载体对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强化作用,社区在推进协同育人工作中要换位思考,将社区所传递的育人内容,通过运用新质工具包括 AI、VR 等,使育人内容提质增效、育人形式喜闻乐见。

3.3 以多方协同为体系,汇聚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的强大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15]协同理论强调各部分协作产生相对统一的结构,以产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一是学校思政课要与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相衔接。在社区思政育人工作中,学校思政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课程,思政课教师应该树立协同意识,如在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三章第三节“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中,讲到群众路线这一知识点,就可以让学生课后分组到周边社区调研考察,探究基层社区如何搜集群众意见进行决策,使所学理论在社区实践中入脑入心。二是家庭教育要与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相配合。一方面,家庭教育活动要主动融入社区思政育人工作中,依托社区育人大平台,带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区育人活动。另一方面家庭教育方向要与社区思政育人工作同向同行,家长要主动学习社区宣传教育知识,并向孩子做出进一步宣传和示范,进一步深化社区育人活动成效。三是社会单位要与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相协调。通过派遣专门宣讲成员入社区或邀请社区学生来单位等形式,主动打破社会单位育人壁垒。

参考文献:

- [1]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03-07(1).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7-13(1).
- [3] 叶方兴.大思政课: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延展[J].思想理论教育,2021,(10):66-71.
- [4] 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22,(10):8-14.
- [5] 何益忠.论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0(10):71-75.
- [6] 吴增礼,李亚芹.“大思政课”视域下“社会大课堂”的多维阐释[J].思想理论教育,2022(12):73-78.
- [7] 冯秀军.“大思政课”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J].思想教育研究,2023,(08):84-89.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9.
- [9]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03-07(1).
- [10] 沈壮海,侯凯升.守正创新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10(03):19-28.
- [11]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N].人民日报,2024-05-12.
- [12] 沈壮海,侯凯升.守正创新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10(03):19-28.
- [13] 甘凯,金燦璨,付歆,等.管理者认知偏差对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风险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实证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24,27(03):204-214.
-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 [15] 郝思斯.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06-04(005).

初中《道德与法治》“探究与分享”栏目教学改进策略

刘建良^{1*}, 陈质颖²

(¹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徐汇 200234; ²上海交通大学附属黄浦实验中学, 上海 黄浦 200011)

摘要: 作为教材中数量最多, 占比最大的栏目, “探究与分享”承载着激发学习兴趣, 丰富情感体验; 提供学习情境, 承接教材观点; 通过探究分享, 锻炼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等功能。但根据对中学生的问卷调查, 发现这些功能未能全部实现, 仍存在趣味性不足、缺少时政材料、栏目间配合度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丰富呈现形式、加入时政素材、提供一以贯之的案例等改进措施。

关键词: 道德与法治; 探究与分享; 功能; 改进策略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Inquiry and Sharing" Column in Junior High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nd Rule of Law" Teaching

Liu Jianliang^{1*}, Chen Zhiying²

(¹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uhui, Shanghai, 200234, China; ²Shanghai Huangpu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Huangpu, Shanghai, 200011, China)

Abstract: As the most numerous and largest column in the textbook, the "Inquiry and Sharing" column aims to stimulate learning interest and enrich emotional experiences, provide contextual learning scenarios to align with textbook concepts, and enhance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skills through exploration and discussion. However, a surve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veals that these objectives are not fully achieved. Persistent issues include insufficient engagement, lack of current affairs materials, and inadequate coordination between column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is study propose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such as diversifying presentation formats, incorporating timely political content, and integrating cohesive case studies.

Keywords: Moral Education and Rule of Law; Inquiry and Sharing; Function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引言

尺寸课本, 国之大者, 建设高质量的教材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教材辅助文是稳步推进教材改革, 提供真实情境、呈现学习任务、搭建学习支架的重要载体。新教材部编版《道德与法治》教材包含“生活观察、探究与分享、相关链接、阅读感悟、方法与技能、启思导行、单元思考与行动”等七类辅助文栏目, “探究与分享”作为道德与法治全册教材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栏目, “依托真实的生活情境设置各种真实的活动, 让学生在思维辨析中理解基本知识, 发展关键能力,

养成正确态度^[1]。”

1. “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功能

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会影响整体功能。教科书作为由正文、辅助文等部分构成的整体，其“风格和呈现方式对成功地实施教学非常重要^[2]。”“探究与分享”在教材中占比最大，研究其编写风格和呈现方式对提升教学效果意义重大。通过梳理学术界研究“探究与分享”栏目的相关文献，发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探究与分享”栏目承载着激发学习兴趣，丰富情感体验；提供学习情境，承接教材观点；通过探究分享，锻炼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等功能。

1.1 激发学习兴趣，丰富情感体验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每个学生有各自的学习需求，“‘课堂’是每一个学生所拥有的‘目标、价值、兴趣、爱好’生生不息的生命的世界^[3]，”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才能在其中浸透态度、感情与价值观。“探究与分享”依据学生的认知特征、能力水平、生活经验激发学生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思考。如七年级全一册《做自尊的人》这一框中“探究与分享”呈现的是小勇给小章取难听的绰号，小章多次反对，但小勇置之不理，两人起争执的情境。这一情境极具生活化，班级中一般都出现过类似情况，学生通过评价小章和小勇的行为反思自己的行为或者更理解身边同学的感受；通过阐明自尊与尊重他人的关系，意识到学会尊重他人的重要性，学会自尊和他尊。

1.2 提供学习情境，承接教材观点

教材是落实国家立德树人任务的载体，在道德与法治课表现为培育学生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这些内容分解到每一单元每一框每一目和一个小问题，这就需要事实或事例说理论证。“‘探究与分享’是引导学生分析与思考正文观点平台，是引导学生经历观点生成与认同的基础^[4]。”如七年级全一册《学会管理情绪》这一框的第二个“探究与分享”呈现了小杰面对自己想看球赛却被爸爸制止这一件事的不同态度产生的不同结果，学生通过阅读分析、交流思考，意识到今后面对类似的情况应该学会调整情绪，不同的情绪会产生不同的做法，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学会调整情绪能培养积极健康的情绪，更有利于达成自己的目标。

1.3 探究分享，锻炼能力

“时代新人不是抽象的人，是有血肉之躯的人，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中从‘自然人’成长发展起来的‘社会人’”通过栏目将知识导向和价值引领相结合，培养会做人做事的时代新人^[5]。在反思自己的行为中与同伴交流感悟，拓展思维能力。比如七年级全一册两个“探究与分享”都是通过阅读材料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的理解，并说一说如何践行或者弘扬这些核心思想理念，通过活动起到启思导行的作用。

2. “探究与分享”栏目使用现状

为了了解初中教材“探究与分享”栏目使用现状，笔者向上海市中学生（包括预备班）发放问卷320份，收回有效问卷302份。通过梳理调查数据，初步了解初中教材“探究与分享”栏目的使用现状。但由于样本数量有限，本调查仅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问题。

从调查结果来看，“探究与分享”从学生经验出发较贴近生活。有46.03%的学生表示“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情境总是来源于生活；79.8%的学生认为“探究与分享”能帮助提高解决生活中道德法律问题的能力；74.83%的学生认为有助于拓展视野；59.27%的学生认为有更多参与到课堂的机会；68.21%的学生认为帮助理解知识点；52.32%的学生认为有助于培养团队意识。

2.1 趣味性不足

辅助文栏目趣味性不足表现在承载的活动和呈现形式两个方面。从承载的活动看，在本次调查中，学生认为的栏目活动对学习效果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实践活动、问答题、观点辨析题、填空题。梳理初中六册教材，发现大多“探究与分享”以口头分享为主，如“你怎么看，说出来与同

学讨论”“谈一谈你的理解”“结合材料说意义”“你如何看待/你会怎么做”“结合生活经验/知识分享……”。以七年级全一册为例,全册共二十六框,共51个“探究与分享”,每框有1—3个,但整册教材仅有五个“探究与分享”包含除了口头分享外的其他活动,其中两个为填表,两个个填空,一个查阅相关资料。探究与分享栏目重视学生在学习情境中通过观察、阅读,发现问题,搜集数据,解决问题,并将获得的答案进行交流分享。分享的形式可以更加丰富,除了口头表达还有表演、绘画、舞蹈、歌唱、诵读等方式,但教材中“探究与分享”活动基本以口头表达为主。

从呈现形式看,从初中六册教材的“探究与分享”栏目以“图片+文字”或者“文字”的呈现形式为主。在对希望的“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呈现方式排序的调查中,有55.23%的学生将视频排在第一位。从平时的课堂反馈来看,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视频的时候也是学生专注度较高的时候,可遗憾的是,我们教材栏目中没有视频这一呈现方式。

2.2 缺少时政材料

时事政治的热点问题是思政课教学的重要资源。道德与法治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想政治课,通过对时事政治的解读剖析,有助于将枯燥的理论和鲜活的事例结合起来,与当前文化背景相适应,既能满足学生兴趣需要又能更加深刻地了解事物本质,培养科学精神。学生也同样重视对时政新闻的积累,在本次调查中也有被调查者建议“探究与分享”栏目增加时政材料。但由于教材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与道德与法治学科需要与时政密切联系的特殊性相矛盾。因此,如何在教材中经常更新时政内容亟待解决。

2.3 栏目间配合度不高

“探究与分享”作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栏目之间内容有衔接、难度有梯度,能使教材发挥最优作用,实现育人最优目标。“教科书编写者合理预设学习者的阅读顺序、思考范围、推理过程等,也会提升教科书的可接受性^[6]。”“探究与分享”应服务于“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知识结构问题,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的连贯顺序^[7]。”循序渐进、助推发展。但从现行的教材看,“探究与分享”的编写有些零散碎片,与其他栏目的设计相互割裂,甚至内容作用重叠、相似,不利于学生建构知识体系。在本次调查中,有近20%的同学认为辅助文栏目的数量过多,课堂教学时间紧张;而且些栏目的内容重叠,浪费课堂时间。一节有效的课堂不在于堆砌素材,为了活动而活动,而在于选择符合学生认知规律、认知特点的合适的情境。有时利用好一个栏目能同时落实若干个教学内容,将一个素材用好、用透,更有助于落实教学重难点,培育学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让课堂教学更加清晰高效。

3.改进建议

3.1 丰富呈现形式

“教材作为支持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的学习材料,其内容选择与结构组织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其认知发展水平、学习兴趣相契合”辅助文栏目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8],其设计同样需要满足这些要求,增加辅助文的趣味性可以从活动形式和栏目呈现方式两方面改进。

从活动形式看,可以增添丰富的、富有趣味性的活动,比如采访、小调查、唱歌、画画、摄影……比如九年级上册第三课第二框《参与民主生活》可以组织学生模拟听证会,进一步理解民主决策的形式、特点和作用。

从栏目的呈现方式看,通过数字化中介系统在虚拟空间进行教学活动,适当增加更加丰富的语音、视频资源,从而激活视觉和运动皮层,以及其他脑区对学习十分关键的神经元。“梅耶的“双通道信息加工原则”指出当学习者将听觉信息通道和视觉信息通道的心理表征整合在一起时,才能更好促进学习者实现意义学习。事实上教学实践也表明,在数字教材中合理融入多媒体资源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多媒体形象的表达方式有助于学生理解教材内容”比如是革命建设时期、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一些列成就、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通过视频呈现更有震撼效果和育人功能^[9]。在九年级上册第五课第一框《延续文化血脉》利用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公益宣传视频,学生更能深切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的特点。

3.2 增添时政素材

“教材编写要敏锐体察时代变迁，捕捉时代风向，紧跟学科前沿，”适应学情变化，为学生提供前沿信息^[10]。但由于新闻的时效性与教材稳定性的矛盾，任何一则新闻印刷进教材都变成了“旧闻”，只能作为知识拓展呈现。所幸数字时代，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只需在栏目的左下角添加一张二维码，后台定期更新背景材料或者新闻，教师在上课时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呈现。比如九年级上册第六课第二框《共筑生命家园》第二目坚持绿色发展这一目题下的第三个“探究与分享”可以添加二维码，更新我国在走绿色发展道路中展现的最新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九年级下册第七课第二框《从这里出发》的“探究与分享”栏目中可以添加习总书记对青少年寄语的音频，更能激发学生的昂扬斗志。

3.3 一以贯之的案例

“探究与分享”作为承接教材内容的重要栏目，基本采用“一例一议”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案例与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但也造成了栏目间结构松散的、缺乏内在逻辑的情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素养的界定与遴选’（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 DeSeCo）项目中指出，核心素养着力解决的是提高学生面对复杂情境下的问题解决能力，使之能够适应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和复杂多变的未来社会^[11]。”传若能提供一个一以贯之的议题情境，各个栏目仅是对与同一个情境的分解，既有利于落实教学重难点，又能使课堂教学更加有层次和逻辑，也助于学生真实参与课堂，培养核心素养。同时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一个完整的、可以参考的教学资源。比如七年级全一册的《做自信的人》的课程内容是怎样做自信的人。可以将这一课的栏目从“生活观察”到“探究与分享”换成一以贯之的案例，比如奥运冠军全红婵的故事。教师可以通过文字故事、视频、采访等资料进行教学设计，如讲述全红婵因惊人的爆发力和协调性被选为跳水运动员进行培养，学生通过分析了解到获得成功和自信要找准定位，扬长避短。当被央视记者问及是否考虑“见好就收”时，全红婵的回答：“不可能，为什么要见好就收？因为你还可以更好，可以一直好下去。”展现了做自信的人应专注当下，积极行动。勇于探究，增强底气。同时还能将全红婵的例子让学生体悟到要将个人努力与民族振兴联系在一起。用一个连贯，且让学生感兴趣的，与学生年龄相仿的，对学生有榜样意义的例子，让一堂课更加富有探索趣味。

参考文献：

- [1] 陈友芳.学科核心素养导向的高中思想政治教材编写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以必修2《经济与社会》教材的编写为例[J].课程·教材·教法, 2019, (11).
- [2] 阿普尔, 史密斯.教科书政治学[M].侯定凯, 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05.
- [3] 钟启泉.“课堂互动”研究: 意蕴与课题[J].教育研究, 2020, (10).
- [4] 金利.理解编写立意 用好教材栏目——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的使用建议[J].基础教育课程, 2017, (11).
- [5] 袁芳.新时代立德树人的生成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 2019, (5).
- [6] 吕立杰, 宋晓乐.课程与教学中中介视角下教科书编写的多重逻辑[J].教育研究, 2021, (12).
- [7] 刘启迪.论我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依据[J].当代教育科学, 2021, (6).
- [8] 赵长林.什么是好的教科书设计: 一种多学科观点[J].教育导刊, 2022, (09).
- [9] 李锋, 盛洁, 黄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突破点: 智能教材的设计与实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23, (3).
- [10] 朱于国.新时代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编辑, 2023, (12).
- [11] 姜宇, 辛涛, 刘霞等.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实践途径与策略[J].中国教育学报, 2016, (6).

本土文化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的内在逻辑、现实问题与实现路径

——基于扬州运河文化与七年级道德与法治课的融合实践

梁添骏^{1*}

(^{1*}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1)

摘要: 本土文化资源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与思政教育具有同向同行的可能性和现实意义。以扬州运河文化为切入点, 将扬州本土文化有机融入七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课中, 推动二者同向同行, 应着眼于: 提高思政教师对本土资源合理开发和创造性利用的意识和能力, 以破除二者同向同行的“门槛”; 结合实际构建有机融合的课程体系, 从目标、内容等维度出发推动二者同向同行落地生根; 科技赋能助推科学的管理和评价反馈体系建设, 为二者同向同行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 同向同行; 运河文化;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

The Inherent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the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A Practice-Based Study on Integrating Yangzhou Canal Culture into the Seventh-Grade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Curriculum

Tianjun Liang^{1*}

(^{1*}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Province, 225001, China)

Abstract: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constitute significant educational assets, holding both potenti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Taking Yangzhou Canal Culture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seventh-grade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curriculum (Second Semester) to promote their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requires focus on three key dimensions: Enhancing Teacher Capacity: Cultivating ideological-political teachers' awareness and competence in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utilization of local resources, thereby

- 91 -

作者简介: 梁添骏 (1998-), 男, 广东韶关, 硕士,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通信作者: 梁添骏, 通讯邮箱: 874209837@qq.com

www.shiharr.com

overcoming barriers to integration. Constructing Integrated Curricula: Developing a practically grounded, organically fused curriculum system that embeds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through clearly defined objectives and content design. Leveraging Technology for Systemic Support: Utiliz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o establish scientific management,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for sustained integration.

Keywords: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canal culture;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curriculum

引言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强调道德与法治课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课程,要发现和利用本地区资源促进学生的发展^[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本土文化资源作为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等特点^[3],其与思政课同向同行是指两者在价值目标、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上应保持一致,共同服务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运河文化,是通过跨水系的南北通航与漕运,在思想意识、社会生产生活等领域,促进运河沿线城市不同文化广泛且深入的交流与融合,推动沿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跨领域、跨水系的网带状区域文化集合体^[4],包含了漕运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商贾文化等丰富内涵^[5],将其融入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以下简称“思政课”),能够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增强学生对扬州运河文化的自信,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1. 助推本土文化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的内在逻辑

1.1 价值目标共存共生: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回顾过去,我国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面临着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培养具有何种能力的人才,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主阵地,一方面通过引导学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关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成果,形成对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正确认识,最终实现全面发展。本土文化滋养着青少年,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是“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重中之重,而青少年对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形成又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需要把本土文化资源融入贯通到日常思政课教学过程中。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6],在本土文化点滴细节潜移默化地浸润下,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观。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通过在思政课中融入本土文化,能够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本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激发民族自豪感,自觉承担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担当,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自身力量。

1.2 认知发展相符相合: 初中生处在具体运算思维向形式运算思维过渡

教育活动只有遵循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教育规律,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人的成长和发展。皮亚杰提出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初中阶段学生思维正处于具体运算思维阶段向形式运算思维阶段的过渡时期,其认知特点要求思政课教学需要贴近学生实际。本土文化资源是从学生身边挖掘的,学生比较熟悉的内容,通过引导青少年学生结合课堂内容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学习,借助具象化的案例,既有利于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发对思政课学习的兴趣,又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特点,在思考和实践实现认知发展跃迁。

1.3 内容契合共通共融: 本土文化资源与教材内容的深度契合

本土文化资源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并非是把这种融合看成是简单的加法,把本土资源融入思

政课变成了生搬硬套的模式化、套路化，而是要找准两者之间的有机契合点。本土文化中的历史人物、重要事件、人文景观等内容与教学内容高度契合，能为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实施提供丰富的素材^[7]。七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教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重新进行编排，为本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提供了重要的抓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本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文化本身体现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不同区域环境下的独特发展。本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本身就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其对区域中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以文化人”的特点，本土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如饮食文化、歌曲文化等等，无不承载着区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突出体现着“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特点。本土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为思政课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也为初中学生知识迁移和运用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大舞台。

2. 助推本土文化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存在的现实问题

2.1 教师主体对文化“解密”的能力不足，导致本土文化资源“有物无用”

教师是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主体，本土文化资源不会自动进入思政课教学领域，需要教师重视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提高对本土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技能和素质。

想要“活化”本土文化资源，实现本土文化资源与思政课同向同行，思政课教师目前还存在着对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意识不足的问题。要想实现双向同行、紧密配合，思政课教师就必须先要树立正确的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观念。思政课教师对本土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视程度，是影响能否迈过本土文化资源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的“门槛”的重要因素。

能否发挥本土文化资源的作用，取决于思政课教师是否能意识到本土文化资源进课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能够以恰当的方式把区域本土文化进行选择、开发和利用。思政课教师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加工缺少方法论支持，造成本地文化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2.2 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缺乏主线串联，导致本土文化资源的利用“有形无实”

地方文化资源是地方的精神根基，是课程教学的资源依托^[8]。在本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还存在着思政课教师简单粗暴地将两者生拉硬拽，本土文化的融合形式化、浅表化，且学生在课程开发中的参与度不足，导致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本土文化资源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着眼点不仅要落在“开发”，更要重视“合理利用”。思政教师对本土文化资源的选择与处理体现在教学设计中，是课堂教学的“暗线”，而如何把文化资源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中，体现的是教学的实际实施情况，是课堂教学的“暗线”，通过两线交织，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两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本土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的实效。

思政课教师在推动本地文化资源和思政课同向同行时要重视和发挥学生作为课程资源利用的有生力量的作用。学生不是文化资源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地开发者、参与者和学习者。同时，学生受到本土文化的长期浸润，其生活经验、感受和能力等要素也是本土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资源融入思政课不只是为了满足思政课教师提升教学质量的需要，同时也是满足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只有当初中生能够比较便利地获取本土文化这一课程资源，其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2.3 技术支持与制度保障不足，导致本土文化资源的利用“有始无终”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本土文化资源的途径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地管理本土文化资源，提高本土文化资源利用的效率，成为了影响本土文化发展道路的重中之重。从本土文化资源与思政课同向同行角度看，目前还面临着管理模式技术赋能不足、学生素养落实情况反馈不足等困境。

科学管理和分配资源是合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的前提。只有“管的更宽”，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源头”和“去向”有效把握，才能够使本土文化资源在教育教学中发挥最大效力。

3.扬州运河文化与七年级道德与法治课同向同行的融合路径

实现本土文化资源与思政课同向同行，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综合提升思政课教师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编码”、“解密”的能力，需要立足于教学目标和内容，构建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需要借助技术赋能构建本土文化资源管理体系，以此助推两者同向同行。基于扬州市运河文化融入初中思政课教学的实践，得出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融合路径。

3.1 激活主体对本土资源开发的意识和能力，多方面提升思政教师素养

思政课教师的思想层次、知识储备、生活经验和个人能力影响着课程资源开发所达到的水平和层次。思政课具体由思政教师来落实，想要让本土文化资源“活化”成思政课的一部分，思政课教师就必须要有本土文化资源开发的意识。思政课教师想要科学高效地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必须要具备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面对众多本土文化资源时做到“慧眼识珠”，找到本土文化资源与课堂教学的关联点，打通学生生活、本土文化以及课堂教学，还要能够在教学中向学生传递正向的价值引导和思想感情。

在讲授“历久弥新的思想理念”时，教师分别创设“三湾河道舍直改曲”和“两淮盐运的对话”两个情境让学生演绎，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核心思想理念。学生在演绎情景剧和分析故事过程中，自然从三湾改道中得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从盐运史变中感受其中的“脚踏实地”和“安民富民”。此外，初中学生正处于“拔节孕穗”的关键期，思政课教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本土文化，用丰富多样的活动体验，坚定学生的文化自信。

3.2 着眼于新时代背景下课程的开发与建设，从目标、内容等维度出发构建有机融合的课程体系

本土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指向教学目标的实现，而思政课教师选用本土文化资源时，又要考虑教学的内容和目标，因此本土文化资源、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要素之间并非简单的平行关系，而是在耦合关系实现“1+1>2”^[9]。

在讲授“做核心思想理念的传承者”时，通过阅读教材内容明确本课的重点是“如何践行核心思想理念”，由此可以确定教学目标为“通过辩论赛、角色扮演等方式，了解中华核心思想理念的内核，增强文化自信”以及“能够从自身实际出发，谈谈践行核心思想理念的方法和路径”。选择“扬剧艺术”为学习主题，首先先用经典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产生对扬剧的初步兴趣。其次，播放视频故事，了解扬剧的发展历史，使学生对扬剧积累一定的认识。再次，以“双师课堂”的形式，邀请扬剧传承人教学生唱扬剧片段，引导学生在做中感悟扬剧精华。最后，借助大数据赋能，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群策群力设计并展示扬剧宣传海报，并阐释其中元素所蕴含的核心思想理念。思政教师要学会眼光向内，关注校内潜在课程资源，在充分考虑资源与学科教学内容适配性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学习情况和年龄特点等，设计简单、可行的活动^[10]。

3.3 以制度化提供保障，借技术赋能推动管理的科学化和评价体系的建设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为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和效率提供了重要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想要让本土文化资源和思政课同向同行走的更远、走的更久，急救要对现有的本土文化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同时合理的进行开发。扬州运河资源内涵丰富，包含有场馆文化资源、人力文化资源、信息化文化资源、实践活动文化资源以及实物文化资源等。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坚持系统观念，将本土文化资源进行优化组合，主题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资源融合贯通，形成本土文化资源网络，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管理，实现本土文化资源共建共享。

本土资源融入思政课要坚持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要建立本土资源进思政课堂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跟踪档案，形成科学的反馈信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情，更好地调整教学从而促进学生发展。借助科技赋能，为每位学生在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中文化传承与发展、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跟踪记录，提高道德与法治课育人实效。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 [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05.
- [2] 习近平.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 [3] 陈守珠.本土文化资源融入高中《哲学与文化》课堂教学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23.DOI:10.27048/d.cnki.ggzsu.2023.001454.
- [4] 王永波.运河文化的运动规律及其启示[J].东南文化,2002(03):64-69.York:Simon&Schuster,1996.
- [5] 丁昕.基于“线性文化遗产”的古运河滨水景观设计研究[D].浙江科技大学,2024.DOI:10.27840/d.cnki.gzjkj.2024.000422.
- [6]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4-16
- [7] 甘艳霞.文化自信视域下本土文化资源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应用[J].中学教学参考,2021,(22):43-45.
- [8] 纪智烨.地方文化资源与高中思政课教学融合路径探索[N].科学导报,2024-06-14(B01).DOI:10.28511/n.cnki.nkxdb.2024.000593.
- [9] 马利飞.以大资源观指导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N].河南经济报,2024-10-15(009).
- [10] 赵云峰.思政课校内资源挖掘路径与策略[J].中学课程资源,2025,21(02):65-67.

教育社会学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师生互动模式研究

马欣悦^{1*}

(^{1*}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 上海 200234)

摘要: 在数字时代教育变革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双重背景下, 师生关系作为教育实践的核心纽带, 其互动模式亟待重构。本研究基于教育社会学视角, 系统剖析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师生互动的现实困境, 提出技术赋能、角色调适, 制度革新及构建“全域共生型”师生互动模式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教育社会学; 思想政治教育; 师生互动模式

Research o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Ma Xinyue^{1*}

(^{1*}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change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s the core link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needs to be re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realitie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poses that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role adapt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mbiotic”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model are the practical path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model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教育变革的背景下, 师生关系的转型需求日益凸显。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子系统, 在其生存和运作过程中, 既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制约, 也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 教育与社会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 作为一门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学科, 其知识内容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因此, 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与学生这两个基本社会角色之间的互动, 对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有关师生互动关系概念的阐释

1.1. 教师与学生在教育社会学中的定义

在教育社会学的视域中,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师角色, 是指“教师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

学过程中根据其身份和地位表现出来的与社会期望相统一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总和”^[1]。有关教师的社会学研究可从社会、学校、学生和自身四个层面展开，并分别对应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的双重角色、教师的教育权威以及教师的职业社会化四个核心问题^[2]。

学生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是一种介乎于不承担任何社会义务的婴幼儿与以职业劳动而与社会进行交换的成人，被称为“半”社会成员，是学校中最游离不定的成员^[3]。此外，学生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总是以与其交互作用的另一种社会角色教师为其存在前提：没有学生这一角色，教师角色便毫无意义。

综上，教师和学生在学校教育系统内有着共存共生的关联及关系。

1.2 师生互动关系的类型

教育方式的多样化决定师生互动的方式也会随之多样，因此本文以教育中的核心社会活动——课堂教学为例，分析教育社会学视角下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的类型及模式。

华勒认为，师生关系是一种制度化的支配与服从关系的形式^[4]。在教育社会学领域，以弄清楚谁和谁在互动及互动反映出何种人际关系为出发点，可将课堂互动类型分为“互动主体”和“人际状态”两个角度进行分类。结合课堂教学中互动主体可分为教师个体、学生个体及学生群体三种主体的前提下，三种主体可产生5种类别的课堂互动类型：包括教师与学生个体的互动、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的互动、学生个体与学生个体的互动、学生个体与学生群体的互动、学生群体与学生群体的互动；从人际状态的性质来看课堂互动可分为合作性互动、对抗性互动、及竞争·合作性互动^[5]。

单一的互动方式无法满足培养青年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人才培养目标。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教学实践中，需要依据教育情境灵活选择和组合多种互动方式，此为提升教学实效的重要突破口。这种动态调整的互动策略，既能显著增强思政教育过程中师生交流的深度与质量，又为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在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下，师生互动关系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学内涵。师生互动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类型。从互动主体来看，互动涵盖教师与学生个体、教师与学生群体、学生个体间、学生个体与群体间、学生群体间等五种类型；从人际状态性质而言，则包括合作性互动、对抗性互动及竞争·合作性互动。

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以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的互动为主，但实践中也广泛存在学生个体间、学生群体间的互动形式。教师是课堂互动的源头，学生是课堂互动的主体，互动情景是课堂互动的保障^[6]。因此，师生互动的研究，需要不断尝试与深化。这些互动在促进学生学习与人际交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今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提供参考。

2. 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关师生互动关系的现实困境

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师生互动面临着多重现实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制约了教育效果的实现，也影响了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

2.1 互动场域的单一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作出新的提炼与阐发，阐明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那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7]。对标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师生互动仍局限于课堂这一传统场域，缺乏课外和社会实践中“走出去”的有效互动，难以培养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课堂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场所，虽承载着重要的教育功能，但其单向度的互动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思考和创新精神。此外，课堂互动的内容也往往局限于教材知识，缺乏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互动情境，使得学生难以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2 角色认知与转换的冲突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的角色适配存在明显失衡。部分从事思想理论教

育的教员仍延续传统认知,将自身功能局限于教材内容的单向传输。这种定位偏差导致教学实践中偏重知识灌输,未能有效贯彻“以德化人”的教育宗旨,在价值塑造和人格培养层面存在明显缺失。值得注意的是,学习者群体中也普遍存在着对教师权威的过度敬畏心理,未能形成双向对话的良性互动机制。这种双重认知偏差不仅制约了教学相长的可能性,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学习者主观能动性的培育。

另一方面,教师在学校拥有多层角色,以及各角色对应的核心问题。因此处理不同核心问题的过程中,会涉及教师的角色冲突,包括教师自身的不同角色意识之间、教师自身的角色规定与社会对教师的角色期待之间、社会对教师的不同角色期待之间等冲突^[8]。

2.3.制度性约束

现行教育评估体系存在明显的导向偏差,过度侧重知识量化指标而忽视育人过程质量。这种考核机制导致教师资源配置失衡,大量精力消耗在科研指标完成和教学任务量化方面,难以保障师生深度互动的必要时间与空间。同时,院校管理制度在促进师生交流方面缺乏创新设计,既未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也缺少配套保障措施,客观上抑制了教育工作者改进互动方式的积极性。

2.4.技术赋能的不足

数字化教学工具的普及尚未有效赋能德育领域。部分教师存在技术应用能力断层,未能掌握智慧教育平台的操作技能,更缺乏将信息技术与价值观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设计能力。现有教育科技产品多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传授场景的开发,难以满足思想引导所需的深度互动需求。此外,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价值实现也还面临着知识论与价值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矛盾^[9]。

3.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中师生互动模式的有效措施

3.1.构建“全域共生型”师生互动模式

针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与技术融合的趋势,融合教育社会学等理论的核心概念,构建了“全域共生型”师生互动模式,以展现空间覆盖的完整性,强调师生关系的平等与成长。该模式以“全场景覆盖、双主体协同、智能化赋能、制度化保障”作为四大支撑,旨在深度重构师生互动。

3.2.打破互动边界,实现全场景覆盖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社会成员的政治、道德等思想观念施加系统影响的教化活动,离不开时空的场域^[10]。因此,在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场域,可分为课堂、课外及网络三类场域。要打破师生互动的边界,需尝试在各场域内开展互动形式的创新。

在课堂场域,采用混合式教学,结合“云课堂”“超星学习通”等平台,实现课前预习数据采集、课中弹幕互动、课后智能答疑的全流程互动;在课外场域,建立“思政实践银行”系统,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社会调研等活动可兑换“思政积分”,形成可视化成长档案;在网络场域,构建“思政云社区”,利用AI算法实现个性化内容推送、语义情感分析、舆情预警等功能,支持师生在虚拟空间中的深度交流。

3.3.重塑角色关系,实现双主体协同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将“权威”分为传统的权威、感召的权威和合理—合法的权威三种类型。三种类型分别由在长期的传统因素、个人魅力、官方、法定或专业、理性等因素下产生^[11]。对于构建新型和谐、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师生的互动需要教师由制度权威走向感召权威,即将情感性的角色融入工具性的角色当中,使二者兼而有之^[11]。

为此,需助力教师角色转型与师生关系的重塑,从“知识权威”转变为“学习伙伴”,运用AI等技术完成知识性内容讲授,更聚焦于价值引领与思维启迪。对于学生而言,要进一步激活民族主体性意识与角色,鼓励学生提出驱动性问题,参与学术研讨与创意生产,如制作“思政微

电影”“红色文创产品”，在过程中增强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报国志。

3.4.提升互动质效，实现智能化赋能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除了依赖于师生互动和时空条件外，还必须要有社会物质资源的支持。作为社会一个特殊的子系统，教育会不可避免地受社会变革的辐射。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信息传达的范围、传递的速度与传播的效果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正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及传播形式的变革，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无法回避和拒绝的新环境^[12]。

2006年《时代》杂志将“年度人物”颁给全球数以亿计的互联网使用者，《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度，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13]。由此，部署“自适应学习系统”，基于学生画像推荐个性化学习路径、利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红色文化体验馆”等场景可以进一步增强互动代入感。此外，构建“互动行为数据库”，采集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行为数据，形成学生思政素养图谱，可进一步建立“质量监测平台”，实现互动质量的动态评估。

3.5.加强制度化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基本保障，作用于具体的思想实行评价改革。政治教育主体交互关系、运行机制、文化生态等，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政治工作实效。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仍存在制度的科学化建设“有待优化”，工作制度存在“稻草人”现象等现象^[14]。因此，制度化建设及优化须落到实处、落到细节处、落到“有温度”。

宏观层面，可以加强资源保障，提高政策激励。设立“智慧思政中心”，开展“人工智能+思政教育”专项培训，提升教师数字素养；设立“师生互动模式探索创新基金”，支持师生共创项目；定期评选“十佳互动”“优秀思政微社区”。微观层面，可以将“课堂互动指数”“实践创新积分”“网络思政贡献度”纳入教师考评与学生综合素质档案，为师生实现良性互动提供动能。

4.结语

本研究从教育社会关系的分析维度切入，系统剖析了当前教学互动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研究发现，师生交往普遍面临着场域局限、主体认知偏差、技术融合不足等现实困境，并表现为“单向度”“浅层化”特征，这些因素可能制约育人效果的达成，也不利于构建良性互动的师生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探索性地提出了多维协同改进方案：通过技术创新应用、角色功能重构、机制优化升级等路径，着力构建“全域协同式”师生互动新范式。该模式以“场景贯通、主客融通、智慧支撑、制度护航”为核心理念，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首先突破物理课堂的时空限制，将教育互动延伸至课外实践与社会生活领域；其次通过重塑师生定位、加强协同配合、深化技术应用、健全保障机制等策略，为优化教育关系、提升育人实效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 [1] 李海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角色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 吴康宁. 教育社会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226-227.
- [3] Ballantine, J. H.,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 186, 1989.
- [4] 肖湘平, 徐小霞. “互为主体”师生互动模式的构建与实践[J]. 中国大学教学, 2015, (07): 66-69.
- [5] 吴康宁. 教育社会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405-407.
- [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党建, 2017, (11): 15-34. 韩琴, 周宗奎, 胡卫平. 课堂互动的影响因素及教学启示[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8, (16): 42-45.
- [7] 新堀通也:《现代日本的教师》, 载《教育社会学研究》第28集, 1973年日文版.
- [8] 玉进, 赵玉枝. 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矛盾及其新要求[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9, 35(01): 149-153.

- [9] 郭婷. 社会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建设思考[J]. 高教学刊, 2022, 8(03): 78-81.
- [10] Weber, M.,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Henderson, A. M. & Parsons, T., Trans., 1947.
- [11] 阚武杰. 有效教学的组成要素分析——基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J]. 教学与管理, 2014, (28): 1-3.
- [12] 刘辉.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微传播化[J]. 思想理论教育, 2014, (06): 81-85.
- [13] 贾宛航.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师生互动模式的构建[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0, 4(36): 39-41.
- [14] 吴正国, 侯勇.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建设探究[J]. 思想教育研究, 2019, (09): 31-36.

银龄赋能·梯队共生：高校辅导员队伍“老中青”队伍结构重建与育人效能提升

杨贤树^{1*}

(¹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清远 511500)

摘要：高校辅导员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承担着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职责。当前，辅导员队伍呈现出年龄结构失衡的现状，由此引育人效果及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难题。通过引入“银龄辅导员”，并进行适用制度设计，做好规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辅导员队伍年龄结构恢复平衡，帮助辅导员队伍提高岗位技能，并最终达到学校育人效能提升的目的。

关键词：银龄辅导员；年龄结构；育人效能

Empowering Silver Age and Symbiosis: Reconstruction of the "Old, Middle, and Young" Team Structure and Enhancement of Educational Efficiency of College Counselors

Yang Shuxian^{1*}

(¹Guangdong Construction Polytechnic, Guangdong Qingyuan, 511500, China)

Abstract: The team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of universities, and undertakes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for students' dai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ently, there is an imbalance in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counselor team, which has led to challenges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counselors. By introducing "Silver Age Counselors" and designing applicable systems, and making good plans, it can promote the restoration of age balance in the counselor team to a certain extent, help the counselor team improve their job skill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oal of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education.

Keywords: Silver age counselor; Age structur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激励新时代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中，总书记指出，“青年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中国青年才会有力量，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1]”高校是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早立志、立大志，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主要阵地，而辅导员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主体，辅导员也同时是离学生最近的教师。当前，高校辅导员

- 101 -

基金项目：2023 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高等职业教育“四级三阶一体化”学生干部教育培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23GXSZ124）

作者简介：杨贤树（1997-），男，安徽长丰，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杨贤树，邮箱：xianshuyang0416@163.com

这支除教学队伍、科研队伍、管理队伍之外的“第四支队伍”呈现年轻化趋势，35岁以下占比超七成。从全国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获奖者分析来看，获奖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比超过40%^[2]。辅导员队伍年轻化带来诸多问题，例如经验传承断层、职业权威弱化、应急处理能力不足等，由此引发的结果是：育人效果锐减，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途径受限，辅导员职业发展出现瓶颈。如能选拔退休教师进入辅导员队伍，应当会对辅导员队伍建设产生积极影响。各国对于“银龄教师”均有一定探讨，例如加拿大退休教师可以继续保留教师资格，参与教学工作；分享教育智慧；加强终身学习；参与社会事务，行使相关权利^[3]。为推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我国也在2023年7月出台《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但计划中未涉及辅导员相关内容。2025年4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银龄辅导员”冲上热搜，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实践可以看出，“银龄辅导员”通过政策保障、岗位适配、考核激励等机制，可与中青辅导员形成“经验-活力-创新”的互补生态。本文提出“银龄工作站+导师制+项目制”实施路径，通过建立专项制度、开发“银龄智库”等措施，实现队伍结构优化与育人效能提升的双重目标。

1.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时代命题

在高等教育深化改革与“三全育人”体系构建的背景下，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管理的核心力量，其队伍结构直接影响育人效能。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呈现“两极化”特征：一方面，青年辅导员占比超七成，35岁以下群体构成主力军；另一方面，具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资深辅导员不足，40岁以上群体极低。这种年龄结构失衡导致育人工作中出现经验断层、权威弱化、应急能力不足等深层矛盾，引发一系列育人难题，同时对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途径造成阻碍。



图1 高校育人“四支队伍”

《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的出台为高校摆脱辅导员队伍结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该计划明确支持退休教师参与教育帮扶，但尚未面对辅导员岗位形成专项设计，不能促进辅导员育人效果的提升。如该计划能结合银龄教师政策实践案例，构建“老中青”三代协同的辅导员梯队体系，优化年龄结构，通过“银龄辅导员”的“经验赋能”与“权威背书”，可以彻底突破辅导员队伍结构失衡困境，实现队伍结构优化与育人效能提升的双重突破。

表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队伍现状（其中3个学院）

学院	总人数	30岁及以下人数	31-40岁人数	40岁以上人数
机电工程学院	11	3	7	1
市政与交通学院	5	1	4	0
建筑工程管理学院	10	4	6	0

2. 高校辅导员队伍年龄结构失衡的深层危机

2.1. 现状透视：年轻化浪潮下的结构性缺陷

目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年龄结构呈现的情况是“青年独大、中年断层、老年稀缺”的倒金字塔结构，这种不均衡的结构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造成负面影响，这些影响突出表现在：经验传承断层，导致危机处理、职业规划等核心能力传承缺失；权威构建困境：辅导员在婚恋观指导、职业规划等方面不具有权威性。

2.2.实践困境：青年辅导员的“三重悖论”

青年辅导员的工作实践中存在难以突破的“三重悖论”。经验悖论：青年辅导员在处理学生心理危机时，因缺乏人生阅历与实务经验，干预成功率低于资深辅导员；权威悖论：家校协同育人时，家长因辅导员过于年轻而失去信任度；效能悖论：事务性工作占据青年辅导员时间过高，深度辅导、危机干预等核心工作所花费时间更少。

2.3.系统风险：育人效能的“木桶短板”

年龄结构失衡导致辅导员队伍在三大核心领域出现效能衰减，由此引发系统风险，导致思想政治育人效果锐减。思想引领：缺乏人生阅历支撑的价值观教育使得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陷入“空对空”说教；危机干预：应急处理经验不足导致心理危机识别滞后；职业指导：一些辅导员岗位的职业是其唯一获得过的职业，缺少职业经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的满意度低下。



图 2 高校辅导员队伍年龄结构失衡的深层危机

3. “银龄辅导员”的重要性阐释：育人生态的重构逻辑

3.1. 结构优化：构建“经验-活力-创新”的三角生态

“银龄辅导员”的加入可打破现有“青年独大”的单一结构，形成三个层级，并达到结构生态统一。经验层：银龄群体提供思想引领、危机处理、职业规划等核心能力支撑；活力层：中年群体承担日常管理、活动组织等执行职能；创新层：青年群体推动新媒体应用、数据分析等创新实践。

3.2. 效能提升：实现“深度-广度-精度”的三维突破

“银龄辅导员”可以为高校学生工作实现“三维突破”，助力“三度”革新。深度突破：银龄群体通过人生导师角色，提升价值观教育转化率；广度突破：跨学科银龄团队覆盖心理、就业、法律等多领域，服务学生数增长；精度突破：银龄群体主导的“精准帮扶”项目，使学业预警学生转化率提升。

3.3. 文化再造：培育“传承-创新-共生”的三阶文化

“银龄辅导员”的参与可构建三阶文化，实现育人效能提升。经验传承文化：通过“银龄智库”建设，可以完善危机案例库、谈心话术库等资源；创新孵化文化：银龄群体与青年群体联合申报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及相关学生工作项目的成功率和质量将得到大幅提升；生态共生文化：跨代际团队可以使辅导员职业认同感提升，最终达到提升留任率的目的。

4. “银龄辅导员”的可行性：经验资本与制度保障的双重支撑

4.1. 经验资本：银龄群体的独特优势

4.1.1. 人生阅历的沉淀价值

“银龄辅导员”具备 30~40 年工作的人生阅历，对社会、教育乃至人生具有更高层次认识与理解，将人生阅历转化为育人资源，可以帮助辅导员队伍积累更多教育经验。

4.1.2. 专业权威的示范效应

高级职称“银龄辅导员”对于青年辅导员群体中具有一定权威，专业知识及技能能够更好地为青年群体作出示范，同时这种示范效应也体现在学生谈心谈话中，学生更倾向于听取更有资历、更有权威的“银龄辅导员”的意见和建议。

4.1.3. 时间投入的保障优势

相较于中青年辅导员，“银龄辅导员”更少受到家庭、子女的羁绊，可以投入指导辅导员群体成长的时间具有一定保障，同时“银龄辅导员”指导的群体具有高文化、高素质的特点，接受能力强，可以保证“银龄辅导员”利用很少时间获得很大教育成果。

4.2. 制度保障：政策体系的适配性设计

4.2.1. 政策接口的可行性

《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已明确支持退休教师参与教育帮扶，辅导员岗位可纳入“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等现有政策框架，并由各省市、各高校根据实际设计地方专项，实现制度衔接。

4.2.2. 岗位适配的创新路径

通过“银龄辅导员+专职辅导员”协同模式，建立“双导师制”，银龄群体指导思想引领、危机干预、职业规划等核心工作，年轻群体负责日常管理、活动组织、技术创新等工作，可以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4.2.3. 考核激励的机制创新

建立“课时制+项目制”考核体系，将谈心谈话、主题班会等纳入工作量核算，设立“银龄育人贡献奖”、“首席‘银龄辅导员’”、推荐参评国家、省、市等奖项荣誉评选，可提升银龄群体工作积极性。

5. “银龄辅导员”实施细则：从制度设计到实践落地的全链条方案

5.1. 顶层设计：构建“三位一体”的实施框架

5.1.1. 政策保障体系

经费保障：建立“银龄辅导员”津贴标准，按照返聘教师给予津贴补贴；空间保障：开辟“银龄辅导员”专用休息、工作空间，保障工作及生活基础要求；荣誉保障：建立银龄特聘教授制度，设置不同级别“银龄辅导员”，在称号及津贴补贴中予以体现。政策保障：制定《“银龄辅导员”管理办法》，明确岗位职责、考核标准；建立银龄群体与在职教师同等的科研支持政策。

5.1.2. 特色岗位体系

银龄讲堂：每月 1 期，主题涵盖“职场生存法则”“婚姻家庭观”“人生选择智慧”等；银龄茶室：每周固定开放，提供一对一深度辅导，建立“谈心档案”；银龄智库：组织银龄群体编写《育人案例集》《谈心话术库》，每年更新 1 版。

5.1.3. 考核激励体系

量化考核：设定“谈心次数”“危机干预成功率”等核心指标；荣誉激励：设立“银龄育人终身成就奖”；成果转化：支持银龄群体出版育人专著、申报教学成果奖。

5.2. 实施路径：打造“四维联动”的推进机制

5.2.1. 工作站建设

实体化运作：设立“银龄辅导员”工作站，配备独立办公空间；数字化赋能：开发银龄育人 APP，实现谈心记录、案例共享等线上功能；品牌化打造：培育“银龄辅导员”说“银龄茶话会”等品牌活动。

5.2.2. 导师制实施

一对二导师配置：1名“银龄辅导员”+1名中年辅导员+1名青年辅导员组成工作组；定制化培养：制定“银龄育人能力提升计划”，涵盖新媒体应用等课程；项目化运作：设立“银龄育人创新项目”，给予一定经费支持。

5.2.3. 课程开发

特色课程：开设《人生规划与职业发展》《危机干预实务》等课程；教材编写：组织银龄群体编写《银龄育人案例集》《谈心话术库》等；资源库建设：建立“银龄育人资源云平台”，实现案例共享、在线咨询。

5.2.4. 社区融合

社区驻点：“银龄辅导员”入驻学生社区，开展“银龄茶室”“银龄读书会”等活动；党团共建：银龄群体担任学生党建顾问、团青导师；社会实践：联合银龄群体开展“银龄导师行”社会实践项目。

5.3. 保障机制：构建“五维支撑”的保障体系

5.3.1. 培训支撑

实施“银龄育人能力提升计划”，涵盖新媒体应用、心理危机干预等课程；定期组织银龄群体赴国内外高校考察学习。

5.3.2. 技术支撑

开发银龄育人APP，实现谈心记录、案例共享等线上功能；配备智能谈心设备，提升谈心谈话效率。

5.3.3. 文化支撑

举办银龄育人文化节，展示银龄群体育人成果；出版《银龄育人故事集》，传播银龄群体育人理念。

5.3.4. 健康支撑

建立“银龄辅导员”健康档案，每年安排专项体检；配备专职心理辅导员，提供情绪疏导服务。

5.3.5. 后勤保障

制定“银龄辅导员”生活补助标准，并提供一定住宿空间、后勤生活帮助，保证生活无忧。

6. 结论：银龄赋能与梯队共生的未来图景

“银龄辅导员”的引入不仅是队伍结构的优化，更是育人生态的重构。通过构建“经验-活力-创新”的三角生态，高校辅导员队伍将实现从“青年独大”到“老中青协同”的转型。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化银龄群体与在职教师的协同机制，探索“银龄+专职+兼职”的混合编队模式，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发展。

“银龄辅导员”已在西北农林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初显工作成效。“银龄辅导员”的育人实践可以达到共同绘制“银龄赋能·梯队共生”的育人新图景，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保障^[4]。

参考文献：

- [1] 袁铭嵘.青年要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J].求知,2023,(08):56-58.
- [2] 刘成,施小明.基于全国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视角的青年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策略[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5(03):324-329.
- [3] 朱丹平.退而不休：加拿大退休教师发展现状——兼与我国银龄教师相关政策之比较[J].教师教育论坛,2024,37(09):15-20.
- [4] 张志元,李玥.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内在意蕴与实践路径[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3,37(05):72-79.

教师赋权增能研究的文献综述：理论、现状与未来趋势

丘海湾^{1*}

(¹ 西藏大学外国语学院, 西藏 拉萨, 850000)

摘要: 本文界定了教师赋权增能的概念和赋权与增能之间的关系。并从国内外两个角度对教师赋权增能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 在评析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指出了以往研究的局限。基于此, 本文提出了未来研究趋势, 旨在促进教师赋权增能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关键词: 教师赋权增能; 理论基础; 研究现状; 未来趋势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eacher Empowerment Research: Theor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Qiu Haiwan^{1*}

(¹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zang University, Lhasa, Xizang, 85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concept of teacher empower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owerment and empowerment.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eacher empowerment and empowerment was review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the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studies were pointed ou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trends aimed at promoting the in-depth and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teacher empowerment and empowerment.

Keywords: Teacher empowerme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Future trends

引言

教师赋权增能随着教育的不断深入日渐成为了教育领域的热点议题。赋权增能不仅关乎教师的专业发展, 更是影响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成长的关键因素, 因此对其相关文献的分析有重要价值。

1. 数据来源与检索策略

本文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 (CNKI) 为数据源, 以“教师赋权增能”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 截至 2024 年 5 月 1 日, 共得到有效文献 106 篇, 其中学术期刊 82 篇, 硕博论文 9 篇, 会议论文 1 篇, 学术辑刊 1 篇, 特色期刊 13 篇。为得到教师赋权增能领域较全面的研究结果, 本文主要围绕以“教师赋权增能”为“主题”检索出的 106 篇文章进行详细的文献分析。

2. 相关概念

2.1. 赋权增能

2.1.1. 赋权增能的概念

“赋权增能”(empowerment)这一术语最初由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提出,词源为“power”,有“权力”的含义,强调通过外部授予或内在激发,赋予个人或群体权力或能力^[1]。“赋权”或“增能”是中国学者们最初多采用的翻译,后来逐渐形成的常用用语为“赋权增能”。

2.1.2. 赋权与增能的关系

“赋权”是“增能”的过程,“增能”既是“赋权”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赋权”的结果。由于“赋权”给“增能”创造机会,而“增能”又反过来帮助提高“赋权”的效果,因此,赋予外部支持和实现内在提升同等重要,达到“外部给予”与“内在接受”的相互融合才能实现有效的赋权增能。

2.2. 教师赋权增能

2.2.1. 教师赋权增能的理论来源

“赋权增能”概念起初主要在 20 世纪中后期的欧美社会学、政治学和社区心理学领域出现,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尊重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是赋权增能的核心心理,希望通过赋予教师更多权力和机会来支持教师们的专业发展。

2.2.2. 教师赋权增能的理论基础

教师赋权增能的理论基础包括分权理论、角色理论、参与式治理理论和多元层次需要理论等。这些理论强调通过多元利益相关体的共同参与,发挥集体智慧,以实现组织的协调发展^[2]。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3.1. 国外研究现状

3.1.1. 教师赋权增能内涵定义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教师赋权增能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但内外视角与教师学校视角是两个主流。威尔森和库利坎将教师赋权增能分为外部权力和内部权力,强调教师在学校决策中的参与权和教师个人的自主性、自我效能感^[3]。其他学者从教师专业发展的心理需求和学校权力重构过程两个角度探讨,强调教师赋权增能是满足教师的心理需求和学校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4]。

3.1.2. 教师赋权增能构成维度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教师赋权增能的构成维度有多种划分方式。社会/结构/政策赋权(social/structural/political empowerment)和心理/认知赋权(psychological/cognitive empowerment)是二维度的划分。美国学者卡里·切尔尼斯指出,社会赋权和心理赋权虽有密切的关联,区分它们仍有必要。二者关系并不是此消彼长,一种类型的赋权不一定会导致另一种类型的赋权。从某个角度来看,心理赋权对于支持教师新项目(program)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社会赋权往往可以有效促进心理赋权,所以它也同样重要^[5]。梅洛夫则从提高教师地位、增加专业知识和提供决策权三个维度提出实现教师赋权增能^[6]。肖特和莱因哈特通过实证研究,确定了教师赋权增能的六个维度,包括参与程度、专业发展机会、专业地位、自我效能感、工作自主性和影响力^[7]。

3.1.3. 教师赋权增能与教师工作各方面的关系

国外学者对教师赋权与教师工作各方面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学者们经调查得出结论,增加教师对学校管理和决策的参与能够促使教师们更积极地参与学校活动进而对学校活动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实践还证明感到被信任并有机会参与重要决策的教师们一般会表现出较高水平的职业承诺和满意度。而高度赋权意识的环境可以激励教师追求更高标准,不断提高专业技能。研究还发现教师赋权增能也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校的整体表现。

3.2. 国内研究现状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港台地区首先开始了我国的教师赋权增能研究，一段时间后又引起了大陆学界对该理论的关注，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3.2.1. 教师赋权增能内涵定义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教师赋权增能的定义主要集中在“能感观”和“具体的权能观”。能感观强调教师的“权能感”，即教师通过提升专业素质和能力获得的效能感和掌控感^[9]。而具体的权能观强调教师在学校管理、课程设计、专业发展等方面的具体权力。

3.2.2. 教师赋权增能构成维度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教师赋权增能的构成维度也有多种划分方式。张笑予等人指出，教师赋权增能需要两个层面的统一，即权利分配层面的赋权和教师自我认知层面的增能。这两者共同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性和内生动力的实现^[9]。根据王丽云，潘慧玲的观点，心理上，教师需要具备自我效能感，即对自己专业能力充满信心，并肯定个人专业价值；行动上，教师需具备信息收集与资源安排的能力以完成工作并实现组织改进；政治上，则需要改变组织内部权力关系包括重新分配与安置价值资源^[9]。操太圣和卢乃桂两位学者提出赋权增能主要包含教师自我成长、专业成长、角色调整和决策参与四个方面^[11]。潘慧玲指出，教师赋权增能的理解和分析应从参与学校管理、获得新的尊重和改善工作条件、拥有更高的薪资和专业结构、控制专业发展以及提升自主性和专业性这五个维度着手^[12]。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教师赋权增能的构成维度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然而，总体而言，教师赋权强调“权”和“能”两个方面。“权”主要指领导者和教师之间的权力分享，而“能”则是激发教师的工作意愿和发展潜力。在学校和社会赋予教师决策权的同时，教师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自我效能感。

3.2.3. 教师赋权增能缺失的现状原因分析

从教师课程权力的角度来看，周正和温恒福通过对课程权力失衡和误用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教师职业特点、知识技能局限以及配套政策缺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13]。容翠和郭元祥则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角度论述了教师课程权力缺失和异化问题，并剖析了内在成因和未来走向^[14]。符太胜和严仲连觉得信任危机是造成“表面增能”和“虚假赋权”的主要原因，建议通过创建可信学校体系、树立可信教师形象来化解信任危机，实现教师自主权和动态授权^[15]。

3.2.4. 提升教师赋权增能效果的策略研究

从课程权力研究的角度，林德全和冯东俊认为，首先要从制度层面入手，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以监督和保障教师课程权威的实施。同时，学校需要改变原有的管理体制，以支持教师的课程建设。此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评价机制，为权力的实施创造更好的环境。做到以上三方面，可有效实现教师课程权威从形式层面到现实层面的转变^[16]。

基于赋权增能的理论框架，薛忠英提出在教师专业发展评价中引入“教师为本”的评价理念，构建合理的评价组织，提高教师的自主参与。她还强调建立教师专业对话，并主张成立专门的评估小组，共同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17]。

钟虹对各学科教师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任职前和任职后的策略，解决影响教学质量问题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这些策略包括建立充分合理的问责机制、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整合和优化课程资源、完善审批机制等^[18]。

通过赋予权力给教师，并创造良好环境氛围，可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并提升其信心和认同感。然而，在不同职业生涯阶段，教师有着不同的需求，因此具体的赋权策略也应该因人而异。最终目标是满足真正需要，并将赋予权利落实到位，使得教师真正得到发展。

4. 研究现状评析

4.1. 相关研究的文献情况

本文针对以“教师赋权增能”六个字为“主题”检索出的 106-篇文章进行具体研究情况归类分析，得出表 1。

表 1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文献情况

类型	研究方向	数量
期刊文章	教师专业发展/成长/自信/培养	28
	中外教师赋权增能内涵、发展现状、影响因素、问题与策略/路径	20
	教师教学/课程领导	11
	校本课程开发、培训、实践	5
	课程/课堂研究	5
	新课程改革背景/语境下	4
	“双减”政策/背景下	3
	后方法时代/视野下	3
	教师课程权力/能力	3
	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减负增效”	2
	教师培训协作	2
	学校发展/改进	2
	教师抗逆力视角	2
	其他	6
	教师赋权增能问题与策略	2
	美国教师赋权增能现状研究	2
	高中英语课堂管理研究	1
	初中教师专业自主权	1
学术论文	赋权增能对教师反思效能感等影响	1
会议论文	校本课程开发中	1
	蒙汉双语教师队伍发展现状研究	1
	中学体育教师工作重塑	1
总计		106

由表 1 可以发现,教师赋权增能中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研究最多,对中外教师赋权增能内涵、发展现状、影响因素、问题与策略/路径的研究居其次,对教师教学/课程领导的研究与基于具体背景下(如双减、新课程改革、后方法时代)的教师赋权增能研究的数量相似。将教师赋权增能理论与其他理论视角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数量不多,和前几方面的研究相比,数量差距较大,仅有期刊文章 2 篇,在硕博论文中没有相关研究。

4.2. 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

通过回顾国内外已有文献,我们发现对教师赋权增能内涵和维度划分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同时也有大量探讨教师增权赋能与组织承诺、教师反思、教学效能感、教育智慧等教师专业发展因素之间关系的文献。然而,国内针对英语教师群体相关研究较少,或者仅限于某一项目中教师赋权增能的调查研究,视角较为局限。此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理论解读教师赋权增能内涵、结构和意义,并缺乏实证研究。

5. 结语

教师赋权增能是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对提高教师素养、改善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的研究虽然在内涵、维度和策略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在中国本土实践中仍存在挑战。未来的研究需要加强本土化探索,结合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文化背景,探索适合国情的教师赋权增能路径;也应该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开发适合中国教师群体的测量工具;我们还应该运用跨学科视角和多维分析,力争提供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Solomon B.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34.

- [2] 薛忠英.赋权增能理论框架下的教师专业发展评价探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34(26):32-34.
- [3] Wilson, S M, & Collican, M J. How High and Low Self-empowered Teachers Work with Colleagues and School Principal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hought,1996,30(2):99-117.
- [4] Thomas K W, Tymon W G. Does empowerment always work: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personal interpret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ystems, 1994, 6(2): 1-13.
- [5] Lichtenstein G, McLaughlin M W, Knudsen J. Chapter III: Teacher Empowerment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992, 93(5): 37-58.
- [6] Marks.H M,Louis.K S.Does teacher empowerment affect the classroom? The implications of teacher empowerment for instructional practice and student academic performance[J].Educational Evaluation&Policy Analysis,1997,19(3):245-275.
- [7] Short P M, Rinehart J S. School participant empowerment scale: Assessment of level of empowerment within the school environment[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92, 52(4): 951-960.
- [8] 陈美如,郭昭佑.学校本位课程评鉴——理念与实践反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37.
- [9] 张笑予,祁占勇.“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赋权增能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J].中国教育学刊,2023,(04):74-78.
- [10] 王丽云,潘慧玲.教师彰权益能的概念与实施策略[J].教育研究集刊,2000,(44):173-199.
- [11] 操太圣,卢乃桂.教师赋权增能:内涵、意义与策略[J].课程·教材·教法,2006(10):79-81.
- [12] 潘慧玲.学校革新:理念与实践[M].台北:学富出版社,2002.
- [13] 周正,温恒福.教师课程权力的相关研究回顾与思考[J].当代教师教育,2008(01):42-46.
- [14] 容翠,郭元祥.我国教师课程权力问题的研究与反思[J].中国教育科学,2016(04):93-113+92+234-235.
- [15] 符太胜,严仲连,信任与信任危机:教师赋权增能的核心问题[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34(25):42-46.
- [16] 林德全,冯东俊.教师课程权力虚置的成因与对策[J].天中学刊,2007(04):20-23.
- [17] 薛忠英.赋权增能理论框架下的教师专业发展评价探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34(26):32-34.
- [18] 钟虹.赋权增能理论框架下全科教师素质培养路径探索[J].教学与管理,2018(18):57-59.